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社长社导正

邮发代号：82-507

刊号 CN11-2211

# 炎黄春秋



一个贴身卫士眼中的毛泽东

徐水：

梦幻的天堂

刘传新：为四人帮

殉葬的公安局长

李宗仁“逼宫”始末

作曲家付林谈歌星素质

1  
'94

第 21 期



一九五七年，周总理访问重庆钢铁厂的一个工人家庭

## 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克

曾任空军司令的刘亚楼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将军，他去世已近30年，然而在空军部队，在他当年的部属中，仍有不少美谈盛传……

## 济南车站血案

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又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在济南车站被为父报仇的义士枪杀的一幕，读来动人心弦。

## 李宗仁“逼宫”始末

1948年底，蒋介石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奸诈的蒋介石以退为进，与此同时，与其勾心斗角的李宗仁亦想取而代之，以挽救危局，于是台前幕后，演出了一场“逼宫”好戏。

## 徐水，梦幻的天堂

1958年，默默无闻的徐水县，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在那里演出了一桩桩荒唐的人间闹剧，既触目惊心，不可理解，又确是活生生的事实……

## 京城神秘“炒”房人

“炒”房地产的狂潮在京城掀起，各式人物纷纷登台表演，不见经传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濒临破产的企业领导又靠出卖房产企图起死回生，……作者是行家里手，深入内幕几年，写出了这篇生动的特写。

## 刘传新，为“四人帮”

### 殉葬的公安局长

刘传新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他在“文革”中多行“不义”，对广大公安局的干部，对广大人民群众大打出手，死心踏地为“四人帮”效犬马之劳，结果落得个自杀身亡。

# 编者寄语

《炎黄春秋》创刊已近三载。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文化市场，《炎黄春秋》在资金极为窘迫的情况下，坚持高雅严肃的办刊风格，不被时尚的潮流所左右，不因一时的挫折所踌躇，将历史烟云、时代浪花融于尺幅之间，补正史之遗阙，校传闻之谬误，力求为读者奉献出一份精美的精神食粮。两年坎坷路，甘苦自知……

所幸，我们的劳作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本期发稿之际，从邮局传来信息，在期刊订数普遍大幅度滑坡的情况下，《炎黄春秋》刚交邮局发行，订数就相当令人振奋。我们所有的苦累，都在那一张张订单中稀释了。尽管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少人乐于追随未来而淡忘既往，各种时尚左右人们的感受方式，“瞬间的辉煌”成为快乐的顶点，许多人在“无历史”的状态中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并不寂寞。因为仍有那么多真挚的读者，在充斥着色情、凶杀和明星秘闻的书摊上选择了我们。前不久，一些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还专门派来秘书或警卫到编辑部订阅本刊，更使我们感到肩负的责任。

何以告慰千千万万热爱、关心本刊的读者，唯有继续努力而已。

1994年第1期刊物摆在您的面前了，它编得是否符合您的心意，我们期待着您的批评。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铨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 100802  
印刷: 北京密云体校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 20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价: 3.20 元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石福生

<h2>古镜台</h2>	<h2>文萃苑</h2>	<h2>赤子心</h2>	<h2>耻辱柱</h2>	<h2>人海浪</h2>
<p>90</p> <h3>清代廉吏于成龙</h3> <p>王俊义</p>	<p>70 72 27 45 41</p> <p>张作霖赞赏常荫槐铁面无私 梅兰芳和小凤仙 陈布雷收集民间叙事诗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以后 蒋介石踢足球</p> <p>石林 石林 石林 石林 瞿书惠 瞿书惠 瞿书惠 瞿书惠</p> <p>文彬</p>	<p>77</p> <h3>华侨领袖陈嘉庚</h3> <p>刘正英 黄顺通</p>	<p>80</p> <h3>刘传新，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h3> <p>蔡明忠</p>	<p>75 78 66</p> <h3>作曲家付林谈歌星素质</h3> <p>他拥抱泰山 一个历史学教授的人生</p> <p>银珠儿 李南友 王方越</p>



# 目 录

时代风	求实篇	春秋笔	英杰谱
<p>52 京城神秘「炒」房人</p> <p>刘长华</p>	<p>28 徐水,梦幻的天堂</p> <p>薛京 辛平</p>	<p>16 李宗仁「逼宫」始末</p> <p>王朝柱</p> <p>12 我驾机秘密转移张学良夫妇去台经过</p> <p>王赐原稿 方雅南整理</p> <p>22 济南车站血案——「三不知」将军张宗昌之死</p> <p>黄国平</p> <p>15 毛泽东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的前因后果</p> <p>邓加荣</p>	<p>71 陆定一与前妻唐义贞的生离死别</p> <p>赵友慈</p> <p>58 一个贴身卫士眼中的毛泽东</p> <p>荒坪</p> <p>10 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剋</p> <p>刘荣林</p> <p>1 国画大师与一代伟人的友谊交往</p> <p>赵友慈</p>

态案点件  
动谜热事  
层史会大  
高历社重  
注露导踪  
关披报追

《炎黄春秋》1994年第2期

## 目 录

- 英杰谱
  -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 春秋笔
  - 于光远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
  - 侵华日军投降内情揭秘
  - 血染居士林
  - 军阀孙传芳之死
  -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 人海浪
  - 晚清名妓赛金花
  - 我的父亲李文达怎样走上被告席?
- 求实篇
  - 向最高决策层上书
  - 文革怪胎: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 古镜台
  - 功成身退的乱世谋臣李泌
- 文萃苑
  - 郭沫若与牛肉馆
  - 帝王画家赵佶
  - 张作霖杀内弟
- 古今谈
  -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

曾任空军司令的刘亚楼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将军，他去世已近三十年，然而在空军部队，在他当年的部属中，仍有不少美谈盛传……

□ 谷 雨

# 刘亚楼发火与

“今天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有一年，刘亚楼将军奉命偕同许光达大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刘亚楼将军看到了苏联国内的各种变化，感慨万千，访问结束归来后，便不顾鞍马劳顿，意欲为空军机关做访苏见闻和国际形势报告。以往司令员做报告，都是先高级干部后普通干部，有时战士和职工

也参加；但刘亚楼这次却想掉个个儿，先给战士和职工传达。管理局接到通知后，便按照司令员的意图，用有线广播通知了下去，时间是当晚七点，地点在司令部大会议室。

政治部间接地得到消息后，觉得这么重要的报告高级干部们应当去听，于是在未请示刘亚楼的情况下，电话通知到每一位大校以上军官的家里，要他们立即去听报告。

时针刚指七点，刘亚楼

同往常一样，身着便服，随身夹了个笔记本，准时走进会场。

同往常一样，他没有先落座，而是习惯性地环视了一下会场。但这一环视不要紧，他的眉头立刻皱了开来，原来，他发现前几排都坐满了大校以上的军官，而他今天主要邀请的对象——战士和职工们，却被挤到了后排，许多人甚至没有座位，只好倚着墙根站着。

刘亚楼越看越火，眉头拧成了一团。

# 吴法宪挨克

图为刘亚楼上将



这时，坐在最前排的将、校们首先注意到了司令员面部表情的变化，根据经验判断，肯定出了什么事情。但谁也猜不透到底因为什么。

不出将校们所料，刘司令员果然开口如炸雷，他抡起了一条胳膊，伸出食指戳点着将、校们的鼻子厉声质问，“嗯？——，是谁叫你们来的？啊？——是哪个请你们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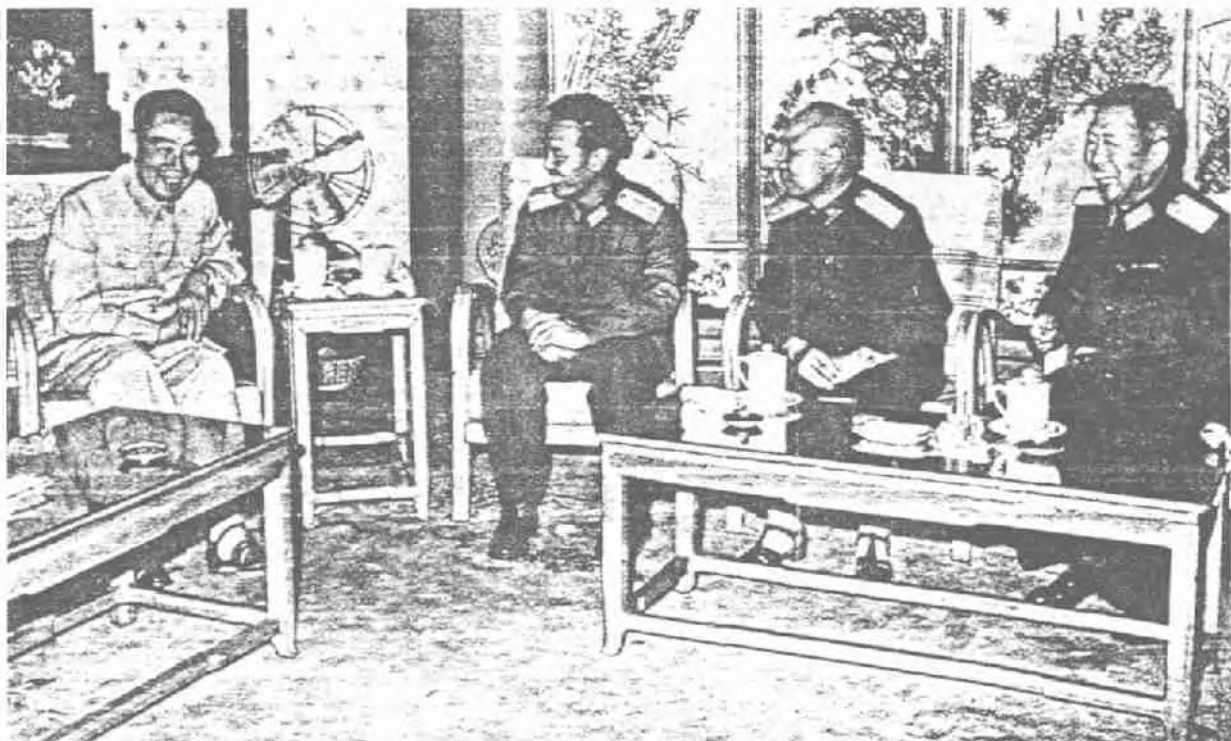
将、校们面面相觑，如坠雾里云中，谁也不知该

怎么回答。这时，政治部的一名负责人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是我们政治部通知大家来的。”然后赶紧解释报告如何如何重要、高级干部们先听一步如何如何必要等等，刘打断他，说道：

“我对你们讲过多少次，我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掺水分；今天说请战士职工就是战士职工，哪个叫你们自作主张，自作多情扩大到高级干部们，啊？你们自己回

头看一看，象什么话嘛！就这么大点一个场子，你们一个一个大校、少将都把座位占下了，那么多战士职工往哪里坐？今天的事情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按军规从事。现在，我命令你们都站起来，向后转，目标，通通回家去！”说着，用手臂由里向外挥，那意思分明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刘亚楼的命令一下，将、校们都合起了笔记本，纷纷站起来，一声不响地低



刘亚楼陪同周总理接见徐廷泽(右一为刘亚楼, 右二为肖华, 右三为徐廷泽)

着头从战士职工当中鱼贯走了出去,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 直至最后一位大校走完。才听身后突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掌声鼓了很久很久, 显然发自普通战士和职工们的内心, 为司令员的惊人举动, 也为自己受到这么特殊的待遇和尊重, 有的人竟激动地哭了起来。

扩音器里传来刘司令员洪亮的声音: “战士职工同志们, 你们好! 现在由我给大家做一次访苏归来话形势的报告!”

事后, 一位曾亲自经历过此事的苏北籍大校回忆说: “我们接到电话通知, 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完, 就匆匆地赶去了。走进会场时, 看到有战士还不奇怪, 以为是执勤的; 可是又看到来了好多炊事员、司机, 就发觉可能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搞错了地方。我们当中还有人笑着让他们问清楚是不是进错了门, 结果闹了半天, 还是我们这些老头子搞错

了。虽说责任在政治部, 可我们确实也都很尴尬, 来的都是大校以上军官哪, 连上校都没资格参加, 就那么灰溜溜地全部被轰出来了。说句老实话, 从战士职工中间穿过去时, 我的脸都羞红了, 以后事情过去了很久, 我们都还拿这件事当笑谈, 说起当年的事, 这位大校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怨言。

### “你不服气, 到中央告我去呀!”

刘亚楼治军极严, 一般说来, 对干部严而对战士宽, 而对高级干部尤其严格。当时空军中传说有“苦不怕, 死不怕, 就怕刘司令员找谈话。”因为刘亚楼对军事业务工作一丝不苟, 他自己又很在行, 找干部了解情况时经常问到点子上, 有的干部准备工作不充分或干脆工作没做好, 那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了, 传说有

一位少将向刘亚楼汇报工作, 竟紧张得两腿发软, 浑身象打摆似地直打哆嗦。

其实, 要摸透刘司令的脾气, 就会发现他并不是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 关键看你工作做好没做好。做不好, 岂止是挨骂, 严重的还要撤职查办; 而做好了, 司令员便给奖励, 有时还会得到重用或提升。

对干部不论你职务大小, 关键看你的表现。

吴法宪挨刘亚楼的骂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因工作不得力又被刘亚楼骂了几句, 他便大胆地顶撞了几句, 无非是指责刘亚楼“不民主、独断专行、家长制、一言堂”等等, 刘亚楼听了正眼都不瞧他一瞧, 只是轻蔑地奚落他说: “我是不民主, 我是家长制, 空军就是我说了算! 可你也不想想, 你连个飞机型号都搞不清楚, 我不搞独断专行, 还能让你胡来? 你要是不服气, 你尽可

以上中央告我去，能把我告下来，我这个司令让你当。”吴法宪也自知理亏，挨了刘亚楼一通奚落，只好暂时隐忍着，但心里说，“等着瞧，以后有算总帐的时候。”果然在刘亚楼逝世不久，吴法宪把空军大权抓到手后，就开始秋后算帐，迫不及待地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所谓“纠偏”，大批特批刘亚楼的“家长作风、军阀主义、一言堂”，还加上个莫须有的罪名“单纯军事路线”。

对于吴法宪掀起的大批刘亚楼将军的做法，空军中很多正直的干部们都挺身而出进行了抵制。当时的参谋长张廷发就不理睬吴法宪那一套，照样按刘亚楼在世时制定的办法去办；而时任司令部军务部部长的邢永宁大校，则站出来：“刘亚楼同志是有一些缺点、错误，但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委员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文革初期，吴法宪便翻出老帐迫害张廷发和邢永宁，说张廷发是“二月兵变”在空军的“代理人”和“黑干将”，说邢永宁是张廷发的“狗头军师”和“帮凶”，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吴法宪还唆使坏人对他们进行殴打，邢永宁的脊椎骨都给打断了。

邢永宁，是刘亚楼亲自选拔培养的领导干部苗子。邢永宁原在空军一航校当政委，他算是老干部中较年轻又有文化又吃苦耐劳的干部。刘亚楼把他从哈尔滨调到北京，先是在司令部当军务部长，准备过渡一下后再提升为司令部副参谋长。可惜刘亚楼身染重病，直至逝世也未来得及付诸实施。

**“你不懂，就不要乱讲嘛！”**

身为空军司令，刘亚楼非常熟悉空军的一切，大到部队编制、武器装备、性能、空军各部队的战斗力和部署，小到各场站番号、各师、团乃至飞行大队的状况，他都一清二楚。而对于敌我空军的态势、力量对比和防空、制空战略，那更是知根摸底、胸有成竹。在他领导空军的年代里，不断传来打下入侵之敌的飞机的捷报，既有蒋军的各种飞机，也有美军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和超低空全天候侦察机。

一次，参战部队又打下架美制蒋军入侵飞机，中央军委电令嘉奖后，部队驻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当地联合举行隆重庆功表彰大会，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

当时主持大会的是地方一位负责同志。这位负责人显然不熟悉空军，更弄不清各类飞机的型号，所以在致贺词时，经他那么颠三倒四张冠李戴的一说，听起来竟成了敌方的飞机打掉了我方的飞机，台下听众一片哗然。此时的刘亚楼如坐针毡，脸色变得铁青。一忍再忍实在按捺不住了，便急步走上前去一把夺过话筒说：“你不懂，就不要乱讲嘛！”

## 放肆的中校

1955年9月，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大将、上将授衔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刘亚楼同志授上将军衔。中央军委授衔过后，同年11月开始，驻京各总部、军、兵种首脑机关也都相继开始为干部授衔。

空军的授衔仪式在什坊院举行。当天晚上，由空政文工团为

大小军官们表演精彩的歌舞节目。

刘亚楼也出席了晚会。但他今天与众不同，一是未穿上将戎装而只穿了身便装；二是未在首长席就坐而坐到了普通席位上。在众多肩扛军衔的军官们中间，刘亚楼的这身打扮不但不起眼且显得有些寒酸。

晚会高潮迭起，掌声阵阵传来……军官们无不沉浸在欢乐的喜悦气氛中。刘亚楼将军同大家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不时为演员的精彩表演鼓掌。

正当将军看得入神时，忽然，他感觉肩头两侧有两个黑乎乎的东西伸过来。开始他以为是手，便一摸，不对！硬梆梆的，回头一看，是皮鞋。这两只皮鞋来自坐在将军身后一位年青中校的脚步，那小伙子正乐滋滋地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地紧盯着舞台，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脚应当放在哪里，他只顾高兴了。

刘亚楼没有声张，只是幽默地弹了弹那只皮鞋帮，并轻轻地“哎”了一声。小伙子没太在意地收回了脚，仍是乐滋滋的冲着台上笑。过了没两分钟，竟又将脚蹬到了刘亚楼的椅背上。

刘亚楼心中有些不悦，但仍未动怒，再次容忍了这个下级军官的放肆，只是语气稍微加强些地告诫说：“把脚放回去，不要再上来了。”没想到这中校以为丢了面子，竟冲着刘亚楼恶狠狠地说：“你管得着吗？乡巴佬！”话音未落，就觉旁边有人猛地拽了他一把，并附耳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中校闻言脸色大变，昏暗中看得见他眼中露出惊恐的目光。他急急忙忙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就向外挤，一溜烟似的逃出了大门，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连大盖帽丢在座位上



都顾不得了。刘亚楼苦笑着摇了摇头，又接着去看戏，事后，也没再追查这中校是谁。

## “给我超过去！”

刘亚楼将军拥有一部国产“大红旗”高级轿车。当时只有高级领导人才能坐这种轿车，所以在普通群众的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就连交警部门都有内部规定：凡是红旗车通过，都要禁止各种车辆穿行行为红旗车让路。交通警察在红旗车经过时，往往把四个路口的红灯全部打开，并举起“通天棒”，以使红旗畅通无阻。

刘亚楼身为职业军人，坐汽车也显现出鲜明的军人特征。一是喜欢快，快到上车时前脚刚迈上车门，后脚尚未收进时，车子就得跑出去；待到后脚收进车中，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时，汽车已经全速前进了。

刘亚楼的这种乘车习惯，可给不少司机出了难题。几乎老一点的司机，都不敢给他开车。一是适应不了这么快的节奏，二是精神压力太大，怕万一哪回失了手，摔了司令员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有几任老司机为刘亚楼开了一段车后，便借口心脏病要求调换工作，怕的就是时间长了神经受不了。而刘亚楼也绝少挽留。

但也有一个是例外，那是一个自告奋勇要求为司令员开车的年青战士。他本来就好好开个“英雄车”，既然司令员喜欢快，那他正是如鱼得水、求之不得。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不了搭上自己一条小命，也不能伤着摔着司令员哪。看起来还真是个楞头青，可楞归楞，技术还挺

高，给刘亚楼开车还真没出过事。

当时刘亚楼的车烧的是未过滤的航空油，燃点极低，一打火就着，一踩油门就能轰出去老远。原先刘亚楼嫌老司机们反应太迟钝，自从换上这个楞头青以后，很是满意，一个劲地夸他，“开得好，像个当兵的，就这么开！”楞头青被司令夸得眉飞色舞，决心“士为知己者死”，车也就越开越快了。

刘亚楼坐车二是喜欢超车，但他只喜欢超别人的车，却不喜欢别人超他的车。

传说有一次，刘亚楼乘这辆大红旗外出开会，司机也是这个楞头青。汽车刚一驶出什坊院，向右一拐，就开上了复兴门外大街。

楞头青把车开上快行线后，一路畅通无阻、风驰电掣，“刷刷刷”地超过了一辆又一辆胜利、华沙、伏尔加等各种小车，很快进入了长安街。

就在这时，前方出现了一辆同向行驶的苏制大吉姆车，这种车的级别虽然比大红旗低，但也是高级领导人乘坐的专车，而且速度还比国产大红旗略胜一筹。

此时，吉姆车正以中速行驶，所以红旗车毫不费力地就赶上并超了过去。但好景不长，吉姆车显然加了速，重新赶上并超过了红旗，而红旗不甘落后又一鼓作气再次超过了吉姆。就这样，两辆高级轿车一前一后有意无意地在长安街上追逐，竞相超越对方以抢在前面领先。最后国产红旗斗不过苏联吉姆，还是让它占了上风。

刘亚楼坐在车里不高兴了，紧盯着前面的吉姆就象是紧咬住一架敌机，他拍打着椅背大声命令楞头青：“我就不信国产车开

不过苏联车，给我马上超过去！”

命令一下，楞头青一脚将油门踩到底，汽车象一头猛狮般向吉姆车直冲过去，吉姆车司机从后视镜中见到红旗车来势凶猛，连忙向右急打方向盘让路。但是事情并没到此结束，就在红旗车贴着吉姆车左侧擦身而过时，刘亚楼突然大声命令道：“停车！”

楞头青完全是条件反射踩住了刹车，红旗车在咆哮中嘎然停住，车身不禁上下剧烈地颤了几下。后面的吉姆车始料不及，手忙脚乱中险些撞到红旗车屁股上。

吉姆车显然愤怒了，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并向红旗车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其中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大叉着腰，厉声责问道，“你们怎么搞的，有你们这么开车的吗？你们是哪家的车子，简直太霸道了！”

刘亚楼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鲁莽，光顾赛车，而忘记了安全和影响。他坐在车里下也不是不下也不是，一时不知该怎样处理才好。

这时楞头青倒摇开了车窗，探出头去满不在乎地回敬说：“没长眼？这是空军上将刘亚楼的车，没撞上今天算便宜了你……”，他还打算继续奚落人家几句，刘亚楼立即制止了他，低声命令：“开车”。楞头青缩回头，吐了吐舌头，一蹬油门，便箭也似的开走了。甩下大吉姆车的司机和他的主人面面相觑，做声不得。但也无可奈何，后来据知情人透露，那辆吉姆车的乘车人，也是个大干部，说是某省的一位书记来京开会的。楞头青报出刘亚楼的大名，人家还能说什么？

## “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刘亚楼的坐车虽属首长专车，但身边的干部们有急事时，只要刘亚楼不用，谁都可以坐。平时刘亚楼不外出时，他的专车就停靠在司令部首长办公楼大门外的操场边上。每逢空闲，楞头青就在那里仔细擦拭车身，有一句没一句地同前来围观的其他人侃大山。

有一次可出了个意想不到的事。那天楞头青仍旧在擦车闲聊，正说到热闹处，警卫营有个农村入伍的小战士下了哨路过，便凑上前来指手划脚的评头品足了一番，然后还忍不住信口开河地说了一句，“要是能叫我兜上一圈，那这辈子也没白活了。”无巧不成书，话未说完，恰被走出大门的刘亚楼听见了。刘亚楼被这个憨厚的农村娃娃逗笑了。竟真的一把拉过这个小战士就往车里送，一边还热情地说。“一圈就够了？今天我请你兜三圈。”说着，吩咐司机开车。

楞头青跟了刘亚楼几年，了解首长的脾性，知道不是开玩笑，便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拉着这名警卫战士围着大操场整整绕了三圈，然后返回原地。

许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汽车有点晕，亦或是被突如其来好运吓坏了。那名小战士竟

呆坐在车上哆哆嗦嗦怎么也下不了车。

刘亚楼将军亲自把他搀扶下来，临上车前还不忘说，“小鬼以后还想坐，你就来找我，只要我不用，管你坐个痛快！”说完，溜烟似地开走了，留下一群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说，“刘司令就是豪爽！”有的打趣说，“下回你也跟司令申请申请兜一圈！”还有一个自以为诸葛亮的干部指着小战士的鼻子说：“这下你可闯了大祸了，司令员的车子也是你能乱坐的吗？”直弄得小战士虽坐了回高级轿车，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过后刘亚楼将军早把这件事给忘了。可刘亚楼的秘书却没忘。他一个电话就要到警卫营，披头盖脸就把警卫营长臭骂了一顿，批评他“管束部下不严”，“造成恶劣影响”云云。最后要警卫营从思想上找根源，严肃整顿部队纪律，并对那名“不知天高地厚”的战士进行严肃处理。

司令员的秘书在大院里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地位绝不低于任何一个二级部长，而在警卫营长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司令代表了。

电话里挨了一顿骂，警卫营长也暴跳如雷，从连长一直骂到排长、班长，最后下令给那个战士记大过一次并关禁闭三天。

“整顿”完之后，警卫营长

觉得还得把结果向首长汇报，于是又绞尽脑汁写检讨和处理报告，什么“查事故、找根源、堵漏洞、防事故”写了一大堆，亲自给刘亚楼秘书送了过去。

刘亚楼的秘书收到警卫营的材料，他及时转给司令员过目，并在一旁简要的解释了几句。

刘亚楼刚开始并不在意，后来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便压不住心里一团火，拍着桌子大骂秘书是“胡来！”是“小题大作”、“乱弹琴！”最后指着秘书的鼻子大声命令说，“马上把人给我放了！叫警卫营给那个小鬼炒个鸡蛋压压惊。”

秘书听了哭笑不得，也不敢拖延，立即通知警卫营放人，并说司令让给战士炒个鸡蛋吃，告诉警卫营长“别再吓着他了！”

警卫营长被前后不同的电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命令文书“马上通知放人”，又追加了一句“晚上告诉伙房给他单炒一盘鸡蛋。”文书莫名其妙通知去了。那个小战士正在禁闭室里哭鼻子，听见放他出来才破涕为笑。晚上比别人多了盘炒鸡蛋，边吃边心里犯嘀咕：今天是遇见鬼了！稀里糊涂被关进去，又稀里糊涂被放出来！看来这大红旗还真不是咱农村兵可以随便乱坐的，以后打死也不坐了！”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并没闲着，三下五除二把鸡蛋都吃光了。

## 邮购启事

本刊创办两年来，所刊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华龄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将其中的部分精彩篇什汇编成《高层纪实》一书，分上下两卷，计20余万字，已于最近出版。所收文章史料翔实，文字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收藏价值，凡欲邮购此书的读者可写信给我社发行部办理邮购。每卷3.20元，一套6.40元，另加收邮费百分之十。邮购10套以上者免收邮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联系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郭小姐，电话：6016633-227

刘荣林

# 一个贴身卫士

## 眼中的毛泽东



图中戴草帽者为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张天义



张天义 20 来岁，细高个儿。他 15 岁那年，在河南老家参加了李先念的部队，随部队到了延安。他说，我的顶头上司是胡乔木、冯文彬。他们在中央开会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讲了，目前怎么办？一个是跑，一个是饿死，一个是自己动手大生产，三条由大家挑。”挑的结果是大生产，自己养活自己。

我被编在中央办公厅，每人发一个镢头，当官的和当兵的全一样，有种谷子的，有种菜的，纺棉织布，干什么的都有。我们办公厅在枣园种菜，见效快，时间不长就吃上了。粮食也多起来，吃不了。大白馒头随便吃，几个人围着一大盆菜，蹲着一块吃。一次毛泽东走过来，微笑着问我：“小鬼，你吃几个馒头啊？”我连忙站起身，伸出四个手指头，没敢说话。主席点一下头，抚摩着我的肩膀，说：“好小鬼，身体壮！”

我们那顿饭还没吃完，敌人的飞机就在空中嗡嗡地叫唤起来，大伙挺稀罕的，全朝天空仰望，窑洞里的人，听到声音，也忙跑出来看热闹，飞机越飞越低，看得很清楚。

突然，哗哗落下几个炸弹，人们也哗啦啦钻进了窑洞。随后炸弹像雨点似的，狂轰乱炸起来。窑洞上边都是高山，当然不怕炸了。

头一次敌人飞机轰炸，没伤着人。但敌机越飞越低。中央发给一些人枪支，飞机来了，开枪就打，不管打着打不着，反正一开枪，敌机害怕了，打这儿就不敢低飞了。地面上的情况看不清了，投弹不少，只是乱炸。

中央搬到杨家岭，杨家岭这地方不算大，但很有名气。

1947 年初，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包围着延安，企图把共产党困死在这儿。我们中央办公厅，组成基干民兵，配合部队与敌人斗争。

张天义被编入基干民兵，发给一支长杆枪。1947 年 2 月，从基干民兵里挑了几名年轻力壮的小战士——张天义、杨战精、孟国保和王根虎等人组成担架队。若毛泽东走累了，又不便骑马，就用担架抬他走。

可是，毛泽东一次也没让抬过，他喜欢骑马。

毛泽东的身体很好，在平地行军，他喜欢和大家一起步行，随地捡根木棍拄着，一路上谈笑风生，挺提精神的。于是，只好把担架队取消，张天义被调到警卫班，警卫班直属中央办公厅管。张天义和主席朝夕相伴，就和家里人一样，伺候主席和江青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中央进驻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的窑洞建在北山坡，向阳，门前是个宽绰的大院，平时很肃静，遇上好天气，院里洒满阳光。

1947 年深秋，一天午后，张天义端一盆洗脸水，涮一把手巾，拧了拧，递给毛泽东，随后又沏上一碗茶，放在桌子上，主席伏案工作起来。

陕北的风沙很大，树叶子、黄土，刮了一院子。张天义抄起一把扫帚，拾掇起来。过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里来回散步。主席来到张天义身边，问：“小张，听说你还不是共产党？是不是？”

张天义腼腆地“嗯”了一声，脸“唰”地红了，很不好意思呢。

“你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嘛，没什么问题嘛。”主席向前挪动一步，又询问说：“你对共产党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意见。”张天义斩钉截铁地回答。

毛泽东临走了又说：“你和江青是一个党小组，找她们谈谈嘛。”

“嗯，嗯！”张天义手里使劲攥着扫帚，心情激动。

傍晚，张天义照旧给江青端上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上，她在看报，没抬头，本来想向她说说入党的事，一见她那严肃劲儿，话到嘴边没敢说。

张天义把主席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排长阎长林，又告诉给李银桥。阎、李二人很热心，帮助张天义写了份自传，并做他的介绍人。翌年 6 月 6 日，在米脂县杨家沟的窑洞里，召开支部大会，批准张天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央卫队随同毛泽东来到王家坪。大家都没歇过劲来呢，突然，来人报敌情：

“敌人到十里堡了。主席，走不走？”

“不走！”主席镇定自若。

“敌人到七里堡了。主席，我们走不走？”

“不走！”主席的口气坚定不移。

毛泽东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聚精会神地在上边找来找去，不时地拿起铅笔，在纸上又写又画。

张天义端来饭菜，放在桌子上，又斟上一小杯白酒，然后侍立在门口。

“主席，你吃饭吧。”

“好，好。”毛泽东只应声，但顾不上拿筷子。张天义一连催促几次：

“主席，饭菜快凉了，先吃了再工作吧。”

毛泽东抬头瞅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微微点下头：

“好，好，这就吃。”

张天义又沏上杯茶，说：“主席你先喝茶，我把饭端去热热。”

这时，又有人来报敌情：“敌人到宝塔山了。”

毛泽东“嚯”地站起身，左手叉腰，右手拿一支红铅笔，不慌不忙地说：“卫士，你把周副主席、任弼时请来。”



“好了。”张天义快步跑去。

周副主席，任弼时很快来到主席处。

张天义一看表，已是夜8点10分了。

中央卫队连夜出发。张天义为主席背上书和文件，他还特意背上两铁筒自制白酒。他想大家走累了，喝两口提提精神。再说，要是有个磕磕碰碰的，擦上点酒，还能消肿呢。

毛泽东骑马，张天义随卫队步行。

傍晚，中央卫队随从毛泽东来到田次湾。

敌人的三个半旅，追上来了。他们是从瓦窑堡那里来的。瓦窑堡本是中央驻地，这里曾有电台，发电文称中央叫邯郸电台。敌人也不傻，分析出共军电台决不会在河北的邯郸，而在陕北，而且测定出在瓦窑堡，于是倾其全力大举进攻，不料扑个空。

天下起了雨，阴沉乌黑，在雨幕里行走，更难了，领路人又迷失了方向。

周恩来面对毛泽东说：“我们设了三道岗，但是，我们冲出去也有困难。”

敌人在山根扎营了。

周恩来说：“我们无处可走了，等待一拼吧。”

毛泽东望望眼前的山，很坦然地说：“上山打游击！”

中央卫队人不多，被逼到山顶上去了，山上的雨下得更大，衣服都浸透了，气温骤然下降，黄豆粒大的雨点，打得睁不开眼。大伙儿紧紧地围坐在毛主席身边，两个卫士给毛泽东和其他首长撑起雨伞。毛泽东淋湿的衣服，拿到老乡家去烘烤。

毛泽东关心地问：“大家冷不冷？”

“不冷！”大伙儿一齐回答。其实真冷，谁也不说冷。

天黑了，敌人不敢动了。

敌人兵临山下，把个大山死死地包围住。

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新兵比老兵多，一个连才有一架机枪，子弹也不多。

周恩来说：“新兵胆小，老兵多虑。”

“明天天亮把胡儿子打跑！”毛泽东成竹在胸的说。

山上的中央卫队才有多少人，比山下敌人少多了。

毛泽东望望山下，敌人还没动。他原地走了几步朝周恩来、任弼时说：“今天就唱个空城计。”

天亮了，雨住了，太阳出来一曝晒，又特别热，身上穿的湿衣服，连晒带焙全干了。

是固守还是冲下山去？

“冲，就暴露了我们的目标，不如吓跑敌人。”毛泽东问，“我们有多少架机枪？”

“12架。”周恩来说。

“好，12架机枪，环山分布，不要同时打，分散打，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倒底有多少军队，多少武器。”山上的机关枪响了。

敌人误认为进了八路军的窝子，遇了大部队了。再说共军善于声东击西，不如及早撤退。果然，没打几枪，敌人狼狈逃窜。

“空城计唱完了，准备下山。”毛泽东微笑着说。

6月天，脚下的黄土都是热的。

与敌人整天价山里转，毛泽东骑马，王振海马前拉缰绳。江青骑一匹大青马居后，张天义拉缰绳，步行在毛泽东右侧马镫下，跟卫队徐徐前行。

中央卫队开到小河驻下，准备渡黄河，提前5天离开这里。刘戡的三个半旅，追到了小河，不料又扑个空。敌人没停脚步，紧追不舍，向黄河方向追过来。

来到黄河边，河水陡涨，惊涛骇浪，奔腾咆哮。毛泽东站在黄河边上，只听得涛声灌耳。

“报告，后卫部队和敌人拼上刺刀了，离这里不过三五里地……”

毛泽东一听大怒道：“不叫老子过黄河，老子不过了！逼到‘茶壶把上’了。”

黄河过不去；敌人又步步紧逼。

“走！绕道打敌人的屁股！”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掉转马头。

敌人果真追到黄河边上，一个人没见到。

“河水暴涨，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的！”敌人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他们断定毛泽东没过黄河，便调头追赶。

我们来到白龙庙，身上带的干粮吃的也差不多了，战士们采集了不少山上的野果充饥。

在这里没驻几天，闻讯敌人大部分又开过来。敌人是黑天和下雨天不敢动，我们就利用敌人的弱点而行动。

从白龙庙渡河到两家岔，途经一条河，没桥，又无船，当地人过河便泅渡。毛泽东与卫队怎么过去？

“搭桥！”谈何容易，时间不等人。

当地老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搭桥。

战士们站在水里，肩扛门板，搭成临时“软桥”。毛泽东与中央卫队脚踩“软桥”顺利渡河。

1948年3月的一天，大队人马开到黄河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卫士共20人乘坐一条大木船。船工有50多岁，他在黄河边长大的，这次渡河，是他选择的航线，他选了条顺水流势的斜线，非常顺利达到彼岸。

毛泽东坐在船中，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卫士。船工立于船头划桨，船行速度不快，飘然地渡到东岸。

渡河时出了点意想不到的岔儿，有一条载马的船，行至黄河中心，遇上几个大浪，船被白浪拍打得东倒西歪。几匹老马站在船上不动。可是李纳骑的那匹小红马，被吓惊了，它一紧张“扑通”掉水里去了。“哎哟！”渡河的人们看到小马被淹了，不由得大吃一

惊。水势这么大，小红马还不淹死啊！嘿，真没想到，小红马会浮水，只有脑袋高高地露出水面，身子飘浮在水中，像小鸭子似的，扭头美美地往西岸游去。人们在船上议论开了：“小红马不愿意离开陕北，又回娘家去了。”

小红马上了岸，使劲抖擻抖擻身上的水珠儿，站在岸上，一动也不动，哪儿也不乱跑。

因等小红马回来，我们就在岸边找了一块洁净的沙滩，铺上一条绿军毯，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江青等人坐在上边。这时已到下午四点钟了。

后勤部负责号船的贾润堂同志，蹲下身来，给毛泽东讲述今天过黄河的故事：

上午我来号船，老船工给我说，今天一清早儿，飞来一队白鸟（海鸥），从西岸一口气飞到东岸，这是奇迹，多少年来没有见过。白鸟是神鸟，就着神鸟的飞行线行船，准没错。今天坐船的准有大人物，神鸟是来给大人物引路的。

老贾刚说到这里，毛泽东、周恩来便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贾润堂接着说：“我没把秘密告诉他，他还不知道是给毛主席开的船呢。”

正在欢笑声中，把小红马接回来了。我们披着夕阳的余晖又起程了。

1948年冬天，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只用了两间房子，一间宿舍，一间办公。放了一张木床，还有桌、椅和箱子什么的，就满满的了。

房子里边很冷，冻得伸不出手来。房子的地下安有地炉，是一条火洞，但没感觉出有热气儿。

一天夜里，张天义刚进门，毛泽东站起身来说：“你给我找个木桶来，桶里放上热水，取暖。”

张天义从伙房提来一桶热水，毛泽东挽起裤腿，双脚浸入水桶里。朝卫士说：“这办法好，不冷了。”

睡觉前，毛泽东就用泡脚的水洗脸，用擦脚的手巾擦脸。

张天义忙说：“洗脚的水，怎么洗脸呢？手巾擦过脚，也不能擦脸呀！”

毛泽东笑笑说：“脚不脏，脚和脸是平等的”。

临到吃饭，主席光答应着吃，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笔，等着时间长了，饭菜都凉了，卫士又端回伙房去热。就这样，热了凉，凉了再热，一顿饭折腾好几次才顾上吃。

在餐桌上，毛泽东吃着饭也休息不下来，一边吃，一边想问题，有时端着碗，却忘记夹菜。遇到这情况，江青在一旁提醒。她用筷子点点菜，朝主席说：“这个菜今天做得很好吃，多吃点吧。”

有时，江青把看过的报纸、刊物和资料，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在饭桌上给主席说说。1948年秋

日的一个傍晚，在干校学习的孟国保回来了，他提溜着一桶鱼。进门就问：“天义，主席在不？”

“出去散步了，你怎么这样晚了才来？”

“今天休息，起了个早儿，在水沟里捞点鱼，给主席送来，吃个鲜吧。”

张天义一看，桶里有鱼有水，鱼都活着，欢蹦乱跳的。

“嚯，还有元鱼哪！”

“我知道主席爱吃才送来了。”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张天义告诉他：“孟国保来啦。”

“来了好嘛，你赶紧把他找来谈谈。”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毛泽东和卫士坐在院里的大树底下，攀谈起来了。

孟国保送鱼的事儿，张天义还没来得及向主席说。江青看到那桶鱼，挺喜欢，张天义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她告诉张天义，“赶紧把鱼送伙房，叫大师傅周绍林和高全文快点做，做熟就吃。”

毛泽东问孟国保：“学文化困难大不大？”

孟国保说，“我们的文化底子太薄，很吃力。”

“吃力也要坚持下来，学文化不是轻松事，将来没文化不行。”毛泽东很严肃地说。

伙房把做熟的鱼端上来了，孟国保要走，毛泽东说：“一块吃了晚饭再走吧。”

大家就在院里，围着石板桌坐下，吃着鲜美可口的鱼。

毛泽东驻西柏坡。正酝酿进京。

张天义在党小组会上谈思想，很想学文化，党小组里有江青、阎长林、李银桥。张天义心想，说也就完了，不一定让去，以后没再提起这当子事儿。

毛泽东午餐后，又伏案工作，张天义为他沏一杯茶，放在桌子上。毛泽东把笔轻轻放下，抬起头微笑着问：“小张，听说你不同意在我这里工作了是吗？”

还没等张天义回答，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你感到在这里干不合算了吧？”

张天义侍立桌旁，很腼腆地说：“主席，我愿意在你身边工作，可是我文化太低，只上过两年小学，我思想着，要是进了城，我这点文化水就远不够用了。我想趁年轻学点文化。”

毛泽东仔细地听了张天义的话，略微思索了一下，点一下头，说：“学习文化是个好事情，青年人的前途是很大的，不能耽误了青春。好吧，就这样定了。”

张天义心细，他买了个大本子，请主席给他写点嘱咐的话。毛泽东思索一下，便提笔写道：

**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一日

张天义手捧嘱咐语，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圈湿润了。



邓加荣

# 毛泽东 与中央社 扫荡报 新民报

你读过毛选二卷上那篇《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家喻户晓、不断为人传诵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当初，这三位记者是怎样闯入毛主席在延安那间办公室，提请这位巨人在历史转变关头发出这震撼历史的声音呢？

说起来，三位先生都是当代的名记者，都有着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记者生涯。先说中央社的刘先生吧！他本名刘尊棋，是193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曾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同志一起蹲过北平西直门里草岚子胡同陆军监狱。他在狱中用机敏巧妙的手法，将狱中的黑暗统治和对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迫害情况，用英文写成一封信，辗转递到人权保障大同盟宋庆龄、蔡元培的手里。宋、蔡见信非常气愤，立即派出代表，并邀请中外记者一道去北平监狱探视。在同犯人见面时，刘尊棋用英语揭露了国民党监狱中的种种弊政。1933年他出狱后，先与范长江等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后又与孙伏园等创办中外出版社和文化周报。1946年，周恩来要他在上海创办了《联合日报》和《联合晚报》，解放后担任过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主编，《中国日报》主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小组成员，《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审。

耿记者名坚白，是位老先生。当年去延安采访时，刘、张二位都在英姿勃发的20几岁年纪，而耿

记者谈话的前因后果



延安女子大学学员在延河边

先生已是40开外的人了。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与张国焘、朱自清等同在哲学系里读书。在建党时期便受李大钊的委派，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去发展党组织，曾一度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27年后脱党，但仍倾向进步。解放后任民族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宁夏大学教务长等职。

张先生名西洛，四川人，1936年入党，去延安时才只有21岁。他一生只干记者一种职业，一生都是与报纸打交道的。除了在《新民报》任职外，还创办过《星期快报》、《工商导报》。解放后，在《光明日报》任国内部副主任、《人民政协报》任副总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是怎么去到延安的呢？

1939年，历史宏恢而沉重。日寇侵略的魔爪已经伸进神州大陆的深处，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的周恩来、郭沫若等提出倡议，要组建一个“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分赴到各个战区去慰问在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全军将士，这个总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任会长，下设南北两个慰劳团，张继随北团行动。

北团由贺衷寒领导，行动路线是重庆、成都、西安，然后由西安再辗转转到各战区去。刘、张二记者随北团活动。耿坚白是《扫荡报》驻西安的记者，8月

中旬，慰劳团由襄樊老河口第五战区回到西安后，他也参加了北团的活动。随团同行的还有文艺界代表老舍先生和两名摄影师韩仲良与徐剑秋先生。

8月下旬，北团从宜川过黄河到了山西吉县古贤村，在那里会见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然后又渡过黄河返回陕西洛川。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路线是过延安，去榆林，因为邓宝珊将军的晋陕绥边区司令部设在那里。

在临出发前，团长贺衷寒突然将三记者找去，告之明天去延安和榆林，要他们不必同行了，可回到西安等候，俟慰劳团返回后再一道去甘肃、宁夏等地。很显然，那个被称之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的贺衷寒是在捉政治迷藏，他不愿意记者去解放区采访报道，要想尽办法封锁边区人民抗战的真相。

这对三记者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延安是敌后抗战的中心，也是他们久已向往的地方，作为记者，神圣天职就是不避艰险去报道人民最关心的事。于是，他们与贺衷寒据理力争，申明他们从重庆出来一直与团同行，没有理由中途将他们甩掉。贺被诘问得无话可答，只好退让一步，允许他们同去延安，但必须遵守一条纪律：不准报道一个字。

9月5日，慰劳团和三位记者离开洛川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郿县。这是国共两个地区的交界

地，县城南部是国统区，县城北部是解放区，两个县长都出面前来迎接，两个人身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作风。国民党县长穿的是料子服，大皮鞋，点头哈腰，虚与委蛇；共产党的县长只有20来岁，穿着灰粗布制服和布鞋，但却显得朴实大方，忠厚干练。过后，老舍感叹地对记者张先生说：“从两个县长身上，就看到国共两党的一个缩影！”

晚上，他们到达延安。延安群众和各机关、学校、军队代表数千人已列队迎候。谭政、肖劲光、高岗、滕代远等领导同志也都出来迎接，轰轰烈烈的场面使国民党元老张继老先生很受感动，他从汽车里走下来，用手摇着帽子向群众致意。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亲自出面接待慰劳团，并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同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参加有千余人欢迎慰劳团而举行的大会。毛主席那天情绪高，他在欢迎致词中针对当时国民党正在酝酿发动的反共高潮而进行的阴谋活动和蓄意挑起的磨擦，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和批驳，告诫国民党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明确地指出，只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致辞后，国民党元老张继老先生情绪十分激动，他在讲话时声泪俱下，抚今思昔地说：“我听到毛先生的欢迎词后，非常感动，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这也就是总理领导我们革命的精神。我参观抗大时，我向抗大校长，一个学生每月吃多少

钱？他说每天每个学生只有一斤半小米和6分菜钱，我听了非常感动。过去在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是第一个。今天的情况改变了，国共两党正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之间虽然有小磨擦，但是通通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共同打日本的，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我的脑筋很简单，现在我简单地来讲救国道理：我们中国人只要战、战、战，只要打、打、打就够了。只有战，国才能不亡；不打，讲什么主义也是无用！”

接下来，文艺界代表老舍先生也被请到台上讲话，他特别强调文化界在团结抗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介绍了大后方文化界在“文章下乡”口号的动员下所取得的成绩。他那幽默的言语、真挚的感情，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有很多人要求他演出文艺节目。老舍先生也不推辞，当下就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下有人知道三记者中的张先生曾是抗战宣传队的，也欢迎他上台表演节目，他也大大方方地唱了两支陕北民歌，会后是文艺演出，有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鲁艺首次演出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给人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9月11日清晨，慰劳团动身北上，乘车奔赴地处塞北的榆林。谁知道到了榆林后便风云骤起。9月17日晚上，在榆林各界在榆林中学大礼堂开会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并欢迎慰劳团莅榆的晚会上，

陕北公学学员参加集会





贺衷寒走上讲台大放厥词，叫嚷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攻击陕甘宁边区。榆林地方本来就复杂，反共分子慑于邓宝珊将军坚持国共合作的坚定态度不敢冒然肇事。现在，听到贺的讲话便都轰然而起，首先跳出来的是边疆通讯社的社长，中统特务赵尺子。他在会上公然大叫说“抗战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的指使，靠唱歌和喊口号闹起来的”，是“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是基本国策的流产”等等。这一派胡言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都站起来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表达怒火中烧的愤怒感情。

这种丑事在榆林地区还是第一次发生，邓宝珊将军心里很是不安。这时，正好他的老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辰同志驻在榆林，于是他便去找南商量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南的意见是针锋相对，必须态度明朗地给那些反共分子以坚决的回击，打退逆流。他们当下商定，马上就把赵尺子作为靶子，在《陕北日报》上将他的讲话公开发表出来，赵尺子的讲话一见报后，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唾骂之声。慰劳团的三

记者也很愤慨，他们找到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先生，还有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公社记者段复生、孙承佩等，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赵尺子开除榆林新闻记者协会，并发出呼吁书，要求当局将赵驱逐出境。榆林市的商界、学界、文化界和市民群起响应，各处都在开声讨会，把呼吁书一封封地递到邓宝珊将军的司令部里。这一下子他不得不像一条丧家之犬，灰溜溜地夹起尾巴从榆林溜到西安躲起来。

9月21日他们又返回延安，这时，正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二次来延安，三记者在继续参观延安各工厂、机关、学校之余，还专门去拜访了斯诺，并同斯诺先生做了交谈。其中，刘尊棋的英语最好，曾经在一个月时间内翻译并出版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威文基10万多字的论著《天下一家》一书，因之与斯诺先生谈得比较深入融洽，受到了斯诺先生的很大启迪，再加上他们一路上的感受和激发，当时三人晚上躺在窑洞的炕上久久不能入睡，彻夜地议论着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交换着各自的心得体会。

## 放晴



他们都常常地感到反动派封锁边区消息所造成的危害，特别是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所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统区的反动报刊上天天充塞着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种种造谣诬蔑，更是令人气愤，作为一个有良心，有历史责任感的记者，完全有必要将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做出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事实真相，揭穿和打退蒋介石所发动的反共高潮。

然后作难的是，贺衷寒事先已经有了禁令：“不准写一个字”，怎样才能突破他的约束呢？大家反复商量，最后终于找出了一个好办法，决定采访毛泽东，让毛泽东以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发表讲话。这既突破了贺的不让记者写一字的禁令，而且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出面讲话来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团结抗战的态度，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为有力的。热情的激励使他们马上从炕上爬起来，立即讨论和草拟出一份采访问题表来。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将问题表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几位负责同志。很快，交际处长金诚同志就告诉他们：毛主席说，他十分欢迎记者们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那天下午，他们去延安郊区参观了一个工厂，五点多钟回交际处时，远远见到窑洞前面土坪上站着一个人，高大的形象使他们立即辨认出那是怎样一个人物来。他穿着正是人们在照片上经常见到的那样：一套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衣服、布鞋、灰布八角帽，满脸笑容地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三个记者赶快奔过去同毛主席相见。毛主席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你们来！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毛主席把他们让进交际处五孔窑洞中间的一座，里面有一张长桌和十几个凳子。节气已近中秋，不到6点天色就已发暗了。交际处同志点燃了两盏油灯放到长桌上，另外摆放着一些茶水、香烟、瓜子之类的东西。主席热情地招待他们说：“国民党封锁我们边区，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招待先生们。我们延安不象你们重庆，但是延安的葵花子是很不错的，我们就一面嗑瓜子一面谈话吧！”他谈话时总是带着从容的微笑和愿意交流思想的眼神，声音有时和婉，有时高亢，甚至有时激愤，但不管谈论什么问题，都让人产生一种不可磨灭的信赖、慰藉和向往的感觉。

毛泽东首先向三位记者打听来到延安后的观感。这倒使他们想起在边区大门口邠县所见到两个县长的事。他们还把老舍先生当时说的那句话也给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在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专门做了阐述，他详细地介绍了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县长，有些是民众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

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接着，毛主席又看着三记者提出的问题表，按照顺序，一一地做了答复。当谈到国民党在抗战队伍中制造磨擦、闹分裂、大力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时，他的态度比较严肃起来，坚定有力地挥动手臂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接着，毛主席就讲出了那句为人广泛传诵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名言。

那天，谈的时间很长，当大家送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已是满天灿烂的星斗，远山现出一片朦胧的影子了。

第二天上午，在他们将要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来交际处看望，与大家一道合了影，给每个人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签名。

慰劳团在9月23日离开延安，过了不久，10月6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就将这次谈话记录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的题目发表了。10月1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也转发了此文。各解放区的报纸也都做了转发。至于三记者所处的报社，虽然他们都寄回去复写的稿件，却都压到总编辑的抽屉里，没敢让它与广大读者见面。所幸的是，他们同时又将稿子寄给范长江同志主办的“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将谈话稿发到香港、南洋等地，有几家华侨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了。这样，这次接见三记者的谈话，就在中外发生了震撼历史的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编纂《毛泽东选集》时，便将这篇文稿收入到第二卷中。1991年出第二版时，仍然全文保留，而且将注释内原来的3条增加到9条。这也足以证明此文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至于三记者呢？耿先生1968年病逝于宁夏银川。刘先生1993年9月5月病逝于北京。年纪最轻的张先生现在仍然精力旺盛，为繁荣祖国的经济、文化事业做着有益的工作。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投笔从戎”的董鲁安教授

1942年春夏之交，北平文化界忽然传开：“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董鲁安教授看破红尘，已去五台山当和尚，遁入空门！”有人指出，这是继李叔同（弘一大师）出家之后，又一位学者削发为僧。

那么，董鲁安教授离家出走的真相究竟如何？这还得从董先生其人说起。他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北京西城一个满族镶蓝旗的家庭里，少儿时代，即目睹清廷一再丧权辱国的种种现象。他先后在市立第三中学和高等师范读书，1918年偕张石桥、曹葆青等创办平民学校，推行平民教育。“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亲自参与火烧赵家楼。后在天安门集会时被军警圈往北大第三院囚禁一夜，陈荇民等6人被捕，于是校中罢课。他与诸同学每日在街头讲演，编印各种宣传品。

此后，董鲁安长期执教于北京、天津，桃李满天下。他是“五四”后在各中学首先教授白话文的，成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一位先驱。

教学之余，董鲁安还潜心研究佛学、文学、修辞学，并著有《修辞

□秦时月



学讲义》、《说文或体字考》、《反训纂例》、《释格律》、《梵吹考》等等，并出版旧体诗《温巽堂诗》。当代学者认为，董教授的《修辞学讲义》由体性论、文格论和批评论三大部分组成一个体系，堪称另开一新领域，独具一格；其修辞观对此后的修辞学研究较有影响。

据其学生回忆，董鲁安教授平日里潜心学术，性格温和，为人谦逊厚道，诲人不倦，然而，在外敌入侵之际，他却显示出性格中刚烈、憨直的一面；嫉恶如仇，溢于言表。董教授幼子浩成先生对笔者介绍说：北平沦陷时期，一日董鲁安夫妇乘有轨电车外出访友，忽有一日本军官上车，他傲慢地坐下，双手将军刀杵在地上，眼光凶狠地向中国人挑衅，一些乘客避之唯恐不及，而董鲁安教授则投之以鄙视、愤怒的目光，毫不示弱。双方对峙良久，互不相让，最终邪不压正，日本军官胆怯地移开目光——董鲁安的刚烈和嫉恶如仇，于此可见一斑。据老舍夫人胡絮青回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中那位大义凛然的诗人钱默吟身上，便有董鲁安教授的影子。董鲁安与老舍不仅是莫逆之交，而且董是老舍先生同胡絮青结婚时女方的大媒。董氏与老舍还是中学同窗，二人相知甚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当即查封了燕京大学，有的教授被逮捕，身为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教授被软禁在家中。后来，日伪当局发出通知，要原在英美教会学校任职的教授前去登记并接受委派，董鲁安坚决拒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接受周叔迦的北平私立佛教学院和何其巩的私立中国大学的聘请。

董鲁安教授以研究佛教著称，而且确是虔诚的佛教徒（并非“为做地下工作打掩护”），他常去华北居士林参加佛事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一天，他从前在师大的学生张寿林来邀请董教授出席一个日本著名密宗和尚的欢迎会，并称将成立一个中日佛教团体，参加者收入相当可观。对此，董鲁安严词拒绝，并表示同敌伪绝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坚定态度。——当时，董教授薪金已停发，经济拮据，家中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

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董鲁安教授并不仅仅满足于洁身自好，他暗下决心，离开“人鬼杂居”的北平，投身神圣的抗日战争。董鲁安教授的行动，得到其夫人关树芳（关竞）的支持和掩护。他们商量好，由董先生故意留下一纸条，上书：因看破红尘，决意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需寻

找云云。董先生出走不久，友人闻讯，纷纷前来，关树芳女士即拿出纸条一面哭泣，一面给大家看。当时一些熟悉他的朋友都信以为真。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顾随（字羨季）于1943年9月16日写给学生莘园（滕茂春）的信，颇能代表大家的心情：

“拟闻董鲁安先生于上月出家，留书与家人，具说决往僻县深山，家中亦不必寻觅云云，心中不无怅触，昨夕梦中为雷惊醒，辗转不能入睡，因念董大师此时不知闭关何处，韦苏州诗云：‘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真不啻为此刻情景写照也。今晚亦颇思作一诗，但珠玉在前，未免难于下笔，恐终于一字也写不出耳。”

董教授几经周折，终于闯过日伪封锁线，抵达晋察冀解放区受到聂荣臻将军的欢迎。他充满豪情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像董鲁安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毅然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在当时尚属鲜见。

虽说是“投笔从戎”，但董鲁安依然是学者本色，他与敌伪作斗争的武器仍然是笔。他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署名于力），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愤怒揭露日寇和汉奸在北平犯下的滔天罪行，热情讴歌北平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该著作曾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金”。

在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召开之际，他曾与聂荣臻、吕正操、邓拓等发起成立“燕赵诗社”，这是一个以吟咏写作旧体格律诗词为主的学术团体。

董鲁安教授投身革命后，先后任职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并曾任教育学院院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1949年7月，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后调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局长。1953年8月20日，这位集学者与战士于一身的名教授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他在去世后被迫认为中共党员。

董鲁安教授虽是以“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借口投笔从戎，但他信仰佛教则是事实，即使到解放区之后，他见到寺庙里的佛像依然顶礼膜拜；据他向其幼子透露，更名于力，一方面为方便书写和记忆；另一方面意思则是隐喻“瑜伽”学派。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又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济南车站被为父报仇的义士枪杀的一幕，读来动人心弦。

□黄国平

# 济南车站 的血案

## ——“三不知”将军张宗昌之死

### 一 众说纷纭的死因

1932年9月3日，夜幕已快降临。济南车站警卫森严，月台上官员云集。一列开往北平的专车已经升火待发。

一个醉熏熏的山东大汉在警卫的搀扶下，摇摇晃晃登上了豪华的车厢，回过头来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忽然，他发现人群中有人拔出驳壳枪对着自己。他酒已吓醒了一半，下意识地往腰里摸去，

准备拔枪，突然想起他那支德国造的新枪已经送给石友三了。他赶忙钻进车厢。

持枪者叫陈凤山，他看张宗昌往车厢跑，立即扣动了枪机，但未响。于是向车厢内冲去，后面还紧紧跟着一个人，此人叫郑继成，陈凤山是郑相约而来的。

陈在车厢内又开一枪，还是不上响，此时张宗昌已跳车逃跑，陈凤山和郑继成下车追击，谁知陈又碰到了瞎火。

此时，济南车站枪声大作。

张宗昌拼命向北跑去，护兵已经上来向陈凤山开枪，陈突然被铁轨绊倒，子弹从头上飞了过去，此时他的枪也响了。郑继成在后面一枪打倒了张的护兵，终于将张打倒在第7条轨道旁，陈、郑二人又追上去，向张的头部连开两枪，污血流在铁道上……

郑打死张宗昌后，回到月台上，高声说：“我是为父报仇，现



在投案自首。”

当时正好一列客车未发，车上的乘客听说打死了张宗昌，竟鼓起掌来，一个学生还专门下车对郑大呼：“郑先生，你真是大英雄，大豪杰！”

郑继成为父报仇，指的是其继父郑金声被张宗昌杀害一案。郑金声是冯玉祥的部下，在北伐中被张宗昌俘虏。张在失败时，不顾不杀俘虏的惯例，将郑枪杀了，并通缉郑继成，使之流落四方，这时是韩复榘的高级参议。

郑继成虽然押在法院，但已成为山东父老心目中的英雄。济南法院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室，所长还让出自己的住室作为郑的寝室。他受到极大的优待。

仰慕这位英雄的人们前来馈赠礼品、慰问致敬，络绎不绝。各民众团体，社会组织纷纷向南京政府发去要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报。不久，南京果然来了特赦令，郑继成大摇大摆地走出看守所……

各种渠道的报道都说张宗昌是郑继成替父报仇杀死的，其实，他的死因始终是个谜：

在他临行，韩复榘在珍珠泉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刚入座，张宗昌脸色大变，似乎大有不祥之感。当韩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只好支支唔唔地说：“我生平忌讳 13，今天出席者正好 13 人……”。此时，有一人借口退了出去，但张的惊慌状态始终未变。是否张宗昌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众说纷纭……

事情又这么巧，张宗昌土匪出身，是有名的神枪手，要是有枪在身，10 个郑继成也不是他的对手。偏偏在石友三请他吃晚饭时，夸起他的枪来，颇有爱不释手之意，张终于将随身手枪送给了石友三。是否石友三设计下了他的枪，众说纷纭……

在张宗昌逃跑时，正好车站上有一辆兵车，也在混乱中开起枪来，而郑却未伤毫毛，验尸时在张的身上却有不少步枪子弹的痕迹。是否预先布下伏兵，众说纷纭……

反正张宗昌已经死了，但是却无人愿意抬尸。张的参谋长出 50 大洋的高价，得到的回答是，“别说 50 元，就是 500 元、5000 元也不抬”，最后只好上头下令由士兵抬走。

市场中谁也不肯卖给张穿的衣帽，连棺材铺也拒绝出售棺材，最后只好强行征用。

## 二 手染烈士鲜血发迹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生于 1882 年 2 月 13 日。因为他好赌，特别善于推牌九，所以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狗肉将军”，又因为他打仗时进军和撤退都快，人们又叫他“长腿将军”，至于那个“三不知将军”的雅号，是因为他一生“不知军队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而得。

他出身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当过吹鼓手，曾三次下关东，在中国的最北地带淘过金，当过胡匪，还为俄国军警卖过力。由于他身强力壮，加上豪爽的性格，在那里结交了一帮亡命之徒，成了海参崴一带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包娼、包赌成了他的重要职业收入。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张宗昌带了一批土匪，乘船到上海，投机革命，在李征五门下当上了骑兵团长。

张宗昌发迹之后，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充当刺客，暗杀了革命党人陈英士。其实张到上海完全是陈派人做工作的结果。

袁世凯称帝，全国又掀起讨袁高潮，蔡锷首先在西南举义，陈英士在上海也在积极活动，成了袁世凯的心腹之患，而冯国璋

也感到陈对自己是个威胁，所以决定暗杀陈。

他们看中了张宗昌这条鹰犬。

一天，一个姓蔡的嫖友约张宗昌到他家密谈，这是袁世凯和冯国璋派来的。蔡某说：“有一宗大事要同你商量，如果你没有胆量的话，我就不必说了！”这是一种激将法。

张宗昌的性格是从来从不认输的，一听就脸红脖子粗地说：“你这是什么话，自打出娘胎以来，我什么没见过，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当他听说要他干的大事是刺杀陈英士之后，不禁楞了一下，说：“陈英士算来也是我的老长官了，作人怎好以下犯上呢？”

“督帅（冯国璋）也是你的上司，他对你不薄，杀陈英士虽是老头子（袁世凯）密令，但也可以为督帅除去一心腹之患。事成后，你既可以报答督帅知遇之恩，也可借此为老头子出力，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口齿伶俐的蔡某终于把张说动了。

张宗昌从袁世凯那里领到了 40 万大洋的酬劳，就到了上海，买通了陈的副官宿英武和刘四海，终于将陈暗杀了。

张宗昌暗杀陈英士的成功，受到了袁世凯的嘉奖，更引起冯国璋的重视。冯决心要把张培养为将才。

## 三 投奉张的收获

在袁世凯、冯国璋的支持下，张宗昌很快由旅长升为师长，但随着袁世凯 83 天皇帝梦的结束、冯国璋的死亡，他也顿失靠山。一师人马在江西被陈光远打得七零八落，张宗昌只身逃回北方。

他曾用贪污的军饷为直系头子曹錕做了 8 个金佛作为寿礼，想再找一个靠山，但由于吴佩孚反对而没有办成。在赔了夫人又

折兵之后，他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宗昌到奉天后，戏剧性地给张作霖送去两只筐作礼物，人们窃窃私语，讥讽他不懂人事，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却知道其中的奥秘：两只筐，没有扁担，缺少权柄也。但张作霖除了委以高参名义，好吃好招待外，并没有给张宗昌一兵一卒，因为他毕竟不知张宗昌的底细。

后来总算答应张宗昌编了一个200人的宪兵营。也正是这个营，使张作霖看出了他的“才干”。

原来张作霖统一东三省之后，吉林督军孟恩远一直不服指挥，并支持外甥高士宾旅与张作对。孟被撤职后，高又勾结土匪卢永贵与张作霖对抗，几次镇压都不能伤其根本。

张宗昌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对高、卢作战。这时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奉军刚刚失败归来，尽管张作霖对张宗昌是否能胜表示怀疑，但再也派不出兵力来对付高、卢了。

谁知多年派重兵未能征服的高、卢，被张宗昌一营人解决了。原来高、卢手下的小头目多是当年闯关东的汉子，当年张宗昌曾在这一带混过，豪爽侠义出名。这些小头目有的是张的熟人，有的听说过他。他们听说张率部前来，就纷纷叛变了高卢，最后竟将高、卢绑起来献给张宗昌。

张宗昌不战而胜，而且一下子收编了2000多人。张作霖接到捷报，一拍大腿，说：“效坤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没有白花我几十万！”不久，就发表张宗昌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和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

从此，张宗昌不断扩大兵源，除了招收在东北的山东人当兵外，还派人到山东老家招兵。

接着张宗昌又收编了500人的白俄部队。很快把第3混成旅编成了。加上白俄兵和白俄带来的无数枪枝弹药，张宗昌一下子抖起来了。他也受到了张作霖的重视。

1923年，经过休养生息，奉系军阀恢复了元气，开始全面整编军队，准备与直军再决一战。张宗昌也应招到奉天述职。

他离开奉天已经一年了，这次到奉天，除了述职，准备好好玩一玩。除了随员，他还带着如花如玉的美女阎丽珠。

阎丽珠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送给张宗昌的，当时作为张宗昌打败高、卢叛军的奖赏，并答应将为他们大办婚事。

张宗昌到了奉天，就顺利地领了全旅官兵的三个月军饷，用大麻袋装了，运到他的下榻。

他刚领到军饷，晚上正逢黑龙江骑兵总监吴泰来设宴为他洗尘。在酒足饭饱之后，张宗昌说：“我刚领了三个月兵饷，钞票多得直往外蹦，咱们找几个角儿，玩一玩牌九如何？”

客人要玩，主人只好相陪。于是凑了二十多人，招来全市的名妓侍候，吆五喝六，好不热闹。谁知张宗昌牌运不佳，一夜之间，不仅将三个月军饷输得干干净净，还欠下一万多元。这下可急坏了张宗昌，他想，输了钱倒好说，到时多发一点军用票也就解决了，要是张作霖问起来，又如何交代呢？

赌局收场后，稍加休息，张宗昌就去见张作霖。一见面，就学着戏剧里的腔调：“参见老师！”就要跪下去叩头。张作霖连忙将其扶起来，连声说：“效坤，你真行！”他指的是打败高、卢一役。

张作霖问了问部队的情况，随便问了一句：“军饷领到了吗？”张宗昌一下子满脸通红，扑通一声跪在地下：“领是领了，可是一

夜让俺输光了，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部下，请老师把我枪毙了吧！让我早早投生，来世作牛作马再来报答老师！”

他这一耍赖皮还真起了作用。张作霖一边拉着他起来，一边说：“效坤，输了就输了，要知道如今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以后别再胡闹了。”张宗昌连声称“是”！张作霖命令秘书长又给补了一份军饷。正是这一着，使张宗昌以后为奉张效命更无二心了。

第二天，张宗昌奉命带着阎丽珠去见张作霖时，正好吴俊升在场。吴见到他们，忽然想起答应为他们办婚事一节，忙对张作霖说：“效坤攻打高士宾，我曾答应给他小两口办喜事，要不是今天巧遇，我几乎忘了。”

张作霖非常干脆，对吴说：“那就拣个黄道吉日，在奉天办吧！”

张宗昌的队伍越来越大，单靠奉天发的军饷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名义上的一个旅，发给8000多人的饷已是了不得了，而现在张宗昌部下是10000多人，况且张宗昌是个挥霍无度之徒呢！

他滥发军用票，弄得怨声载道，还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就种鸦片和开赌局来解决主要问题。

张宗昌接任绥宁镇守使后，首先在五站接收了原由吴光新开办的“裕宁公司”。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开荒种地，实际上主要是种植鸦片。这个公司原来只在五站地区，后来又扩展到七站。土地多，公司本身种植不了，就大量出租，当地的流氓，第三旅的军官，大量承租土地。公司的收入，大部分补充了军饷。

张宗昌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奉系实力人物的怀疑和嫉妒，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就反对张宗昌拥有这样一支队伍，常常在张

作霖耳边吹风，要将张宗昌部除掉。流言不断在张作霖周围出现，有的说张宗昌种大烟、开赌局、搜刮民财，有的说张宗昌有反奉野心，要调动他，准不听话。

尽管张作霖对张宗昌有好感，但流言听多了，也就对张宗昌怀疑起来。

1923年秋，奉军举行军事演习，校阅委员有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张作霖对校阅委员说：“我每年花100多万元，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

谁知这次预习恰恰又给张宗昌露了脸。

经过野外演习之后，进行部队对练。在由李景林部对张宗昌部进行对练时，正好张作霖同高级幕僚都去观看。只见张宗昌的人马人人争先，乱七八糟地往前冲，其勇猛程度竟使李景林部支持不住而节节败下阵去。

张作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法，高兴地对高级幕僚说：“你们瞧，这个破落户打起仗来还真是那么一会事呢，说不定这种乌烟瘴气的打法，还真能对付正规军哩！”

这次演习使张作霖决定留下张宗昌旅，并给予装备补充，别人再在张作霖旁边吹耳边风也无济于事。

奉张自1922年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卧薪尝胆，无日不思报仇。1923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成为第二次直奉大战直接导火线。1924年，战争终于爆发，这次战争，奉张作了充分准备，并和皖系的段祺瑞、广州的孙中山结成三角联盟，而直系则匆匆应战。

奉军共编了六个军向关内挺进。张宗昌是第二军副军长，军

长李景林。李张两部共七个团约三万余人，在热河、冷口一线攻击。

此时直军已经从前线全面溃退，张宗昌趁机收编直军部队，一下扩充了七、八万人。收编后，张宗昌将自己的中下级军官都升为将校级，来不及更换肩章，均用锡箔纸糊成黄色肩章代替。

稍作休整后，他又挥兵前进，过芦州、昌黎直到天津。

据说，张宗昌把直军打得七零八落，用电话报告张作霖时，张作霖高兴万分地说：“效坤老弟呀！你他妈拉巴子真打呀！吴老二这一回可真栽在你手里了，我见着你的面，非揍你一顿不可。”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张宗昌正听着这位大帅不知还要说什么，忽然拍的一声，电话断了。原来是张作霖高兴得不能自制，竟把电话筒用力一摔，碎成满地都是碎片。

#### 四 祸鲁三年

由于作战有功，更重要的是张宗昌已有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北洋政权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25年4月，他被命为山东督办。

张宗昌于1925年5月到济南接位，到1928年4月兵败逃往日本，仅仅3年时间，在山东不断扩大军队，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山东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绝后的最高记录。

他收编土匪，抓壮丁，一年以内，已经编了14个军。这批军队与土匪没有什么两样，抢、偷、奸、杀无所不为，路人只要见到带尖帽子的（张部标志）赶快躲避逃遁。

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军费，张宗昌除了乱发一文不值的军用票外，捐税达50余种。他督鲁一年，税收已征到13年以后的1939年了。

张宗昌已成为山东的土皇帝，其妻妾已达数十人之多，至于没有正式迎娶的更是无数了，有人曾问张宗昌有几个老婆，张乐哈哈地说：“俺也说不清！”

张宗昌自己挥霍无度早已出名，然而他的姨太太们也照样挥金如土，每人都有副官1人、护兵2人，奴仆无数，吃、穿、用开支之大更不用说了。单以他的七姨太太为例，买一只卷毛狗花了3000块大洋，每天以牛肉、牛奶和鸡蛋喂养，装修一座楼要花五六千块大洋，就她一双珍珠鞋就用去四五千元，其他开支就可想而知。

张宗昌虽然已有无数妻妾，但还不满足，见到有姿色的妇女决不放过，使当时山东妇女都不敢出门。

人们有恨在心，但谁也不敢说公道话，否则就有杀身之祸。他到山东不久，民间就流行“切开亮亮”、“听听电话”的谚语，因为这是张宗昌的酷刑之一，所谓“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

舆论界是绝对受控制的。

一天，青岛《公民报》上出现了一幅漫画，一只老鼠准备爬到一盏油灯上，旁边写着“老刘，老刘，快来添油”，是讽刺青岛首富刘子山不肯出救灾款的。谁知刘到张宗昌处告状后，张派军警冲入报馆，将副刊编辑胡信之等逮捕枪决，报社财物全被抢走，报馆也被封。

张宗昌的密探布满大街小巷，他的势力范围一片白色恐怖……

山东父老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地方已十室九空，他们恨透了张宗昌，有民谣为证：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刺！”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葱，锅里煮着张宗昌！”

张宗昌督鲁后，已被北京政府提为上将。张宗昌在山东三年，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外，并不多顾政事，他更多的还是参加军阀混战。

1925年9月，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反奉。10月，张宗昌立即进兵抵抗。他依靠白俄队的铁甲车，曾将孙传芳一个前锋团俘获。他们将战俘绑在树上烧，挖眼睛……。但在安徽固镇一战，张部大败，老五师师长施从滨被俘杀害，白俄队也几乎消灭，张宗昌只好退回济南。

同年，他将自己的部队和直督李景林部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与吴佩孚言归于好，联合进剿冯玉祥的国民军，迫使冯部队从北京南口退出。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冯玉祥部也从北方向南进攻。张宗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退到滦州，准备出山海关，到东北再图发展。但是奉军已拒绝张宗昌进入东三省。张宗昌已走投无路。

### 五 潜逃东洋

1928年4月张宗昌一面电请北京张作霖与日本联系，一面亲自与驻济南领事西田会晤，要求出兵山东帮助阻止北伐军北上。

4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就到达济南高埠。

张宗昌拔巨款给日军作军费，合力攻击北伐军。在南京向日方提出交涉后，张宗昌部又故意化装在日本占领区抢劫，使日方借口治安不好，以保护侨民为由，拒不撤兵。终于造成了“五三济南惨案”。

日寇霸占山东，当然要感谢张宗昌。今天张既然已经落魄，日方愿助一臂之力。他们劝张宗昌东渡日本，再想法发展。但张宗昌不愿意，原因是还想组织残部反扑。

“蒋介石已派特务到大连，企图对张宗昌行刺。”日本人放出风来，一些日本浪人故意到张的住宅附近“严加保护”。使张宗昌感到安全已受到威胁。最后终于同意到日本去。

### 六 末日来到

张宗昌到日本，日方朝野要员不断光临张宅。但是日寇意思很明确，要张和日方“合作”、“讨蒋建国”。张宗昌已无一兵一卒，“建国”谈何容易！他不敢轻易答应。

他是挥霍无度惯了，日本哪能白白养着他呢？渐渐地，供给越来越少了，张宗昌只好派人到国内求助。

1932年，在张学良、吴佩孚等人的邀请下，张宗昌终于又回到北平，由张学良每月供给8万元生活费，这时他忽然想起动用在济南的存款，因为8万元实在不够他挥霍。

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韩复榘到北平开会。一天，他带着小姨太太去张宅拜望。

张宗昌对韩复榘到来喜出望外，立即设宴欢迎。两人越谈越“投机”，就在席间，两人结成把兄弟，韩还认张母为干娘。

“效坤兄，欢迎您到济南旧地重游，到时小弟一定热情招待。”韩向张发出邀请。

“是啊！我家的祖坟已多年没扫，我想去祭奠一番！”张说。

“好！到时我们共饮一杯趵突泉之水，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韩越说越高兴。

韩复榘回济南后，又派石友三专程到北平约请张宗昌南下，并许以张宗昌到山东招兵买马。

张宗昌决定到济南一行，一来去提款，这是韩复榘答应了的，二是想去山东招募旧部。

“你不能去，韩复榘虽然和你结为兄弟，但他是翻脸不认人的。”张母首先反对他去济南。

张学良和吴佩孚也劝张别去，认为韩复榘居心叵测。

但张宗昌仍然不听劝阻，带着少数人，没有向其母辞别，就去了车站。有人告诉张母侯氏，侯氏大吃一惊，让人速找吴佩孚商议，结果挂电话到天津，让在天津赋闲的原山东省省长林宪祖截住车，劝张返回。

林宪祖终于等来了张宗昌，当他把侯氏和吴佩孚的意见告诉张并劝其返回时，张不高兴地说：“你跟我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去趟济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仍乘车走了。

正是这一去，钱没拿到，队伍也没拉起来，却在济南车站送了命。

## 邮购 启事

本刊尚有从创刊号至1992年年底（共9期）合订本，有需要者请汇款至本社邮购部郭小姐（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分馆内，邮编：100802），定价30.20元，另外加收邮费百分之十。款到寄书。

# 陈布雷收集民间叙事诗

陈布雷，1890年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官桥镇。曾任《天津日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为反皇朝、建民国、驱列强、倒军阀、鼓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

从1927年12月起，陈布雷的笔主要为蒋介石一人服务。因为他为人性情随和、笔力雄健，又是浙东宁波同乡，蒋介石选中他当秘书。此后20多年间，虽增加过不少官衔，但实际上一直是蒋介石的秘书长。

陈布雷的笔光彩夺目，堪足自豪。但服务的对象错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抗战时期，曾通过郭沫若的秘书翁泽永转告：“请传话给陈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当时，陈布雷不可能理解周恩来言简意赅、语重千钧的传话。回复说：“周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象周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陈布雷从下面避开了周恩来的忠告。陈布雷被蒋介石看中，似乎觉得碰上了“真命天子”，不胜“知遇”之感，别人的忠告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陈布雷的后半生却处在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郭沫若曾说：“给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好差使。”陈布雷闻后感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字，真是世界上最大苦事。”陈布雷在痛苦时，常常留恋过去的记者生涯，等抗战胜利后，一定要回去当记者。但是抗战胜利后，陈布雷更难摆脱蒋介石的紫留。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力量排山倒海，陈布雷自然是敏感的。他为蒋介石起草文稿时，也提一些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但极少为蒋介石所接受，甚至遭到无理训斥。1948年冬，陈布雷在南京吞服了160粒进口的烈

性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这样一支如椽大笔，假如不被蒋介石看中，绝不至于59岁就走上绝路；如果他的笔不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一人服务，大可踌躇满志。

据说，陈布雷个子矮小、文弱，衣着打扮平常。抗战时陈布雷在重庆，下班回家后，马上脱去长衫，卷起袖子淘米做饭干家务，生活上并不怎么讲究。但是他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对民间文学有偏爱。

抗战初起，陈布雷随蒋介石撤往四川，途经昆明时，曾收集了云南民间叙事诗十三首。这十三首民间叙事诗记叙了元朝云南梁王手下大将段功，以计巧破红巾军之事。梁王以女儿阿盖公主配与段功为妻。后梁王怕段才高盖己，而夺其王权，便要阿盖公主用毒药孔雀胆杀死段功。谁知阿盖与段功夫妻情深，不忍杀夫。梁王遂亲自动手在通济桥刺杀了段功。以后，段功的一子一女又竭力为父报仇等。

这段故事，郭沫若先生曾据以创作了剧本《孔雀胆》。但剧本在着力描绘阿盖公主与段功的忠贞爱情的同时，也简略甚至删除了段功计破红巾军及段的一对子女报仇等情节。陈布雷收集的十三首民间叙事诗，自《梁王自咏》起，至《巫女歌》止，中间《新婚歌》、《阿盖悼亡词》、《段宝（段子）诗》、《僧奴（段女）临嫁别弟诗》，等等，是比较原始和完整的。

陈布雷收集民间叙事诗是在他的日记中被发现的，这不仅为民间文学家、戏剧家据以研究多了一份原始材料，而且也引起史学家、人物史记作家的极大兴趣。陈布雷日记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石林 瞿书惠）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58年，默默无闻的徐水县，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荒唐剧，既触目惊心，不可理解，又确是活生生的事实……



# 徐水报

1958年8月22日 星期二 第10000号

## 中共徐水县委委员会 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全文)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不另行文)

（此处为报纸正文内容，包含多栏排版的文字，部分文字因模糊难以完全辨识，但可见其为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草案全文。）

### 中共徐水县委通知

（此处为通知正文内容，包含具体的行政指令或公告。）



# 梦幻的天堂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

□辛 平



## 徐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推上“大跃进”舞台

徐水，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两千多个县里，不过是一个名字平平，没有任何影响的小县。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个县，在公元 1958 年，曾经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历史。

这年 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风尘仆仆地来到保定，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他听完徐水县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马上给以肯定，加以赞扬。

自从 1955 年毛泽东指示将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高潮后，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浪，但是这股热浪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年，便在随之而来的“反冒进”中降了温。1957 年，“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冒进的情绪又开始重新躁动。12 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召开的沙颍河治理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门过去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这一水利工作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向全国宣传。全国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季节，迅速掀起了一个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高潮。水利部则根据中央确定的“三主”方针，于 1958 年 1 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

但是，非常遗憾，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的十几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同志新发现的徐水县的影子。几天后，中央农

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便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 月上旬，毛泽东赴成都，召集中央及各地要员就如何发动大跃进的问题开会，陈正人不失时机地将这份材料带到了会上。3 月 14 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书记彭真的桌上，这样的报告毫无例外地写着“并报毛主席、中央各负责同志”的字样。

报告中说，徐水县从 1957 年 11 月起，苦战 3 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 3 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 万亩耕地都配备了 1 套至 3 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相互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一）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二）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三）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四）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五）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六）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这种总结经验的方式，就像诗人填词一样，先有一个大体不变的框架，再根据上级布置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填到框架中去，经验也便形成了。

巧就巧在 3 月 13 日，即“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的情况”上报的前一天，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也上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这两份报告恰成一个姊妹篇，一

个从宏观上着眼，一个从微观上入手，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3 月 21 日，毛泽东看过两份报告后，用他那酣畅娴熟的草书写下了一段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徐水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在农业方面，斯大林曾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合作化。1953 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具规模，农业如何改造提到了日程，是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吹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号角。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干部普遍水平偏低，大多数干部讲不明所以然，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不少农民在入社前，将曾经属于自己的树砍掉、家畜杀掉、牲口能卖的则卖掉。归到合作社里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病的病，死的死，全国一下子减少了 200 万头以上。已建立的 67 万个合作社，到 1954 年有四分之一减了产。1955 年便出现了严峻的问题：有的合作社“船漂出 30 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 30 多里没人找”；有的“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有鉴于此，党中央采取了收缩策略。但是，几个月后，毛泽东便发现，象“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于是他要求合作社在 1956 年要翻一番，即达到 130 万个，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后修订为“农业四十条”），并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了序言和按语，批判了党内的“右

倾保守思想”。在毛泽东等人的急速过渡思想指导下，工农业生产各项指标被人为地大大地提高了。为了避免由于急躁冒进而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1956年5月，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反一下急躁冒进。这时毛泽东正在外地，对于北京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意见，但他并没有立即表示自己的看法，只是在6月份胡乔木送来的由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修改稿上批了3个字，“不看了”。毛泽东有亲自批改《人民日报》社论和重头文章的习惯，而这一次却是一个例外：“不看了”3个字表示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社论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态度而搁浅，而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于6月20日见了报。由于反冒进的精神被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去，才使1957年的经济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绩。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说：去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委员会。这是“右倾”，是“促退”；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毛泽东的讲话，通篇围绕着经济工作，大造反反冒进的声势，成为下一步发动大跃进的先声。11月13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指责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这篇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用十分赞赏的口气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

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并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了“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3月，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徐水县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发现和被推上“大跃进”的舞台的。

## 人民日报隆重推出徐水“大跃进”的领导经验

4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隆重推出《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也许出于慎重考虑，在这份总结的前面，《人民日报》没有加编者按，只写了几百字的“内容提要”，将整篇总结归纳为“四点领导经验”，基本上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经验。

应该说，徐水经验之不同反响处，不在于报上介绍的这几条概念化的经验，而在于文章内容中蕴含着另外四点经验，即：第一，敢说大话。如“前人不该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等。这些近似文学语言的口号，一方面表现了人们“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浪漫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的色彩，尽管这些口号比起后来的口号显得还不那么离奇，但却有始作俑者之功，谁又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第二，开创了大兵团作战的先河。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除去老弱病残妇幼和脱产人员，实际能投入的人力不足10万。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的劳动大军，“转战三河两岸和山地、平原”，在干部的指挥下，以超强劳动的方式，“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地突击县委交下来的任务，如此作法被称为“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就转变为“军事化”。第三，推行强迫命令之风。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理论训练，考虑问题和工作方法都比较简单，自从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后，辩论会就成为批斗会的代名词，只要你有不同意见，就辩论辩论，搞上几顶大帽子，不怕你不屈从。“大事大辩，小事小辩。即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问题，在较大的范围内大辩，较小的问题，就在较小的范围内小辩”。辩论的效果如何呢？“辩论前，1400民工14天只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民工们怕被扣上“右倾”“促退”的帽子，只得拼命地干；而干部们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几个简单的数字上。跃进看的是指标，数字不过是一种游戏。第四，为共产风推波助澜。共产风从成立合作社起就开始出现，中央亦发现问题加以制止，但始终效果不佳。随着大跃进的来临，共产风更呈兴风作浪之势，并成为衡量一个人对大跃进的态度标尺。如“南隆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打井器材等），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投资

665万元。有的自愿把分红和准备盖房的钱投了资。有的自愿把多年未露面的宝藏也拿出来投资搞生产”。将这一切都说成是“自愿”的，当然不是事实。刚刚过上一一点好日子的中国农民，并不想将自己的财产“共”出来。但是，要想不被“辩论”，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违心的“自愿”。这些经验就象鲜酵母一样在大跃进运动中不断地发酵膨胀。

## 徐水的“生产方式大革命”和“生活方式大革命”

入夏之后，各地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从报道上看，徐水并没有参加这个行列，而是进行了更深入更大胆的改革：在批判本位主义、保守思想、单纯业务观点的基础上，突破了过去独立性较强的一些系统，特别是商业、政法、邮电系统，实施了较大的手术。在商业方面，改变过去的坐销方式，实行了三串（串乡、串社、串户）四送（送到门、送田间、送工地、送上山），改变了营业时间，早开门，晚关门，半夜叫门半夜开，一切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服务。在政治方面，破除了“独立审判”的程序，创造了“案件下放”的方法，实行有案挂牌，群众摘牌破案的作法。在邮电方面，将各乡原有的收音机改装为会议电话机，开创了县一级电话会议的先例，使县委的声音随时可以传达到基层。这几项改革为徐水下一步跃进准备了条件。

7月1日，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向各级干部推出了畅想曲——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内容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

作，其基本要求是“四化”，即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通过“四化”，“要把社员培养成为有集中有民主，有纪律有自由，意志统一，心情舒畅，有高度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的新型农民”，“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

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



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书、社会分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主要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要使这一军事化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农业社会主义跃进兵团。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令而行，几天之间，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又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食堂也由原来的300个猛增到1693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39人，占全县人口的70.5%。一时间，徐水县就成了一个大兵营，徐水也因此而成为全国仿效的对象。

从毛主席3月21日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至今，不过几个月，徐水还真是搞出了不少发明创造。

## 毛主席亲临徐水 视察并向一般干部提出 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8月4日，毛泽东亲自来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听了之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容满面地看着周围的人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啊！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反应快，回答说：“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在一旁的大寺各庄农业村主任李江生忙答道：“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说：“那就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着那么多酒精啊？”这一下把大家都问住了。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着大家，似乎在等待着满意的回答。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还是张国忠见多识广，为了弄清毛主席的看法，于是试探地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说：“也要考虑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在视察的过程中，也许是毛泽东觉得一天吃5顿饭，并不是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好办法，吃5顿还吃不完又怎么办呢？于是又作了一条新指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呀？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徐水的粮食真的到了吃不完的程度吗？当然没有，这不过是一句自己骗自己的大话！徐水当年的每亩平均产量究竟是多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准确的统计资料，有人说，只有200多斤。我们可以把它估得再高一些，按每亩350斤计算，徐水共有耕地86万亩，总计可收粮食3亿斤，比县委书记张国忠所说的12亿斤，还差9亿斤！这样的大话，今天听起来很可笑，但在当年几乎是司空见惯的。

入夏以来，高产“卫星”不断升空。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这个记录仅仅保持了不到5天，就被河北省魏县的亩

产小麦2394斤所打破。紧接着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16日，湖北谷城报出4353斤的卫星；6月18日，河南商丘县放出4689斤的卫星；6月30日，河北安国县以5103斤突破了单产5000斤大关；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再创7320斤记录。更让人吃惊的还是水稻的产量：8月1日，湖北孝感突破水稻单产1万斤大关，放出了亩产1.5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也信以为真，8月4日，在徐水视察时，对全国竞放卫星的情况大加赞扬：“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以后，各地更是推波助澜：8月13日，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自称“天下第一田”；8月22日，安徽繁昌县放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却没敢号称“天下第一”；9月18日，四川郫县放出了82525斤的特大卫星；同一天，广西环江则放出了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对于以上的记录，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尽管头脑中存着一个大问号，可又有几人敢说呢？春天刚刚批了“保守”“促退”，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焕发了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问题是有，但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看问题要看主流，要从大局着眼，不要当“怀疑派”、“观潮派”，大家都要当革命的促进派。各级干部之所以敢于放开胆子吹牛，并非因为他们吃了豹子胆，他们似乎也有可以吹牛的依据。6月16日，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可能达到4万斤。这时正是人们试放高产卫星的初级

阶段。从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发表之后，稻麦的亩产量便直线上升，其数目之大，连这位科学家也要为之兴叹了。他是一位科学家，他的话自然有科学依据，但如何使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却未经过实践证明，仅仅只是一个假设而已。那时我国不少人为了使稻麦能得到充分的光能，以创造出高产。竟然在夜里用灯泡照着庄稼，结果浪费了大量的电能，却未能获得更多的收获；而更多的人则是省略了“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这个前提。而把目光集中在“亩产4万斤”这个结论上。

关于农业生产上可能出现奇迹，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政治家可以有各种各样宏伟的设想，而“将来”二字，在时限上又可近可远，很难用科学的概念去定义。科学家提出种种假想，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假设的条件是否成立，能否达到。任何一个未经科学实验证明的假说，也只能是“假设”而已。

问题恰恰出在把政治家的“预言”和科学家的“假说”，当成了现实。那些貌似严肃的传媒，像专门出售大活胡话细菌的商店一样，传播着病毒：“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毛主席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有一个专题讲话，就是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的，他说：“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这里的“老祖宗”指的是马恩列斯，从反对教条主义的角度讲，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由此而引伸出来的意思就值得商榷了。要解放思想，首先就要从“老祖宗”那里破起，其他的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在内。毛泽东认为只要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当“奇迹”出现的时候，毛也自然会以为是预料之中的事，尽管他曾经务农，应该清楚土地的效力，但那已经被“时代不同了”的豪情所埋葬，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谁若不能了解这一点，谁就将被时代所抛弃。

毛泽东来到徐水视察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城乡，《人民日报》记者康濯记述道：“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泽东“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这不仅是作家妙笔生花的描述，也是这个时代领袖与群众关系的生动写照：“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毛泽东边视察边听汇报，他对徐水县的集体化程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表示了更多的关注。参观食堂时，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连贴在墙上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都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他赞赏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

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他特意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向陪同视察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和副省长张明河强调了一遍：“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徐水的经验使毛泽东感到异常兴奋，视察接近尾声了，毛泽东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讲，他感慨地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突然，毛泽东将话锋一转问：“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县委书记张国忠抢着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对于张国忠的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不断地点头。有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徐水又一次享受了殊荣。

晚上7点半，毛泽东的车队离开了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徐水县委于8月5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对于“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县委领导已经不算陌生，在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陈伯达就提出：“把合作社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个设想还比较粗糙，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毛泽东的看法。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陈伯达继续著文，透露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构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人民公社”终究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搞法，并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

## 中央农村工作部 带给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消息

8月6日，最先发现徐水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8月8日，传达了另一位中央领导关于搞试点的具体指示：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将他带来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分送给县委领导。

现在知道《大同书》的人恐怕不太多了。这本由清末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曾经在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它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满现状，追求理想社会的空想作品，其主要内容来源于中国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

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满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人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大同书》写成后，康有为一直秘不示人，仅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甲、乙两部（1919年有单行本问世），全书则在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毛泽东早年读过《礼记》，对中国古代的大同说颇为赞许。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目前虽未发现毛泽东早年对《大同书》的评语，但他确有与《大同书》相同的思想基础。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谈了办“新村”的设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

泽东的这一设想与康有为的《大同书》如出一辙。翌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学说，暂时放弃了创办“新村”的幻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要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说：“康有为的《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应该说，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它的潜台词应该是：“这条路已经被我们找到了。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任何设想都只能是空想；而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又点燃了毛泽东早年的梦想，他选择了徐水作为他实行“新村”计划的试验场。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明确地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他甚至启发与会的各级要员们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毛泽东的主要经验来自于战争年代，他对于军事共产主义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感情：“我们有22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到影响。”大跃进是否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呢？当然可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

领袖的设想和徐水的实践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产生了共鸣。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俗称“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徐水；一开始还比较小心，因为军事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命令主义，所以还是不要硬

性提倡为好，他用商量的口吻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几天后，毛泽东又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他下决心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给与会的各级领导交个底，以免因为模棱两可而让人不得要领，导致各行其事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将它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而是无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互相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军事化成为人民公社的一般组织形式，全国由此进入了大兵团作战的历史时期，为实现党提出的1070万吨钢的任务，提供了近亿人的劳动力。

自从毛泽东视察之后，徐水又登上了新的台阶。由于毛泽东曾经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军事化措施，赞美了徐水实行军事化以后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跃进的发展，因而国家决定给徐水全民皆兵的公社社员发枪。8月13

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发枪典礼之后，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又有所提高，人们处在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点上。县委领导趁热打铁，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以便可以更集中地调动人力，实行大兵团作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为办好公社而比劳动、比共产主义精神的群众性竞赛运动。

8月22日，徐水县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绘制出了一个远离现实，虚无缥缈的宏伟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不再仅仅是谋生计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磅，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5年，或者在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即从明年算起，在7至10年内，30

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第一书记张国忠对社员群众讲解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他面对着无数只疑惑的眼睛，讲解着自己也不明白的问题，反正徐水已经被推上了共产主义试点的位子。

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透露了一个信息：“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 超越时空的“畅想”，带来的是种种掩盖不住的弊端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自从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传达之后，这句诗一般的口号已是妇孺皆知，它向人们展示的，正是贫苦的中国人世世代代所渴求的“大同世界”。于是“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拱破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坚实大地，带着势不可挡的锐气呐喊着：“我来了”。据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报告：至9月底，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4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

10月底完成。全国已建立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农户 112174651 户，占农户总数的 90.4%，每社平均 4797 户。据 11 个省、市、区 7589 个公社统计，5000 户以下的社有 5287 个，5000 户至 10000 户的社有 1718 个；1 万至 2 万户的社 533 个；2 万户以上的社 51 个；河南、吉林等 13 个省，有 94 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徐水县亦在此列）。中央农村工作部郑重地向全国宣告：我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

公社化。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人们几乎来不及想，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徐水县在北戴河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于 9 月 15 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 月 20 日，向全县人民发布《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试行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吃饭不要钱，干部、工人、职工、农民不发薪金，每月只给几元钱的补贴，服装、日用品都由公社统一发，

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情况下，急忙打破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似乎这样就可以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既然可以实行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自然也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于是，徐水县委一声令下，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统统被纳入了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 and 大部分生活资料一下子归了公。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并将这种超现实的作法，冠以“消除城乡差别”的美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 32000 多个房子被拆除，新房又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只有大寺各庄边拆边建，盖起了 39 栋 300 个居室的外表美而质量差的楼房，其余大部分村没有建起多少新房，一时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连箱箱柜柜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

不久，各种弊端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就是供给制。由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形式，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社员生产的积极性，社员中开始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一、二、三。”“一、二、三”指按照供给制的分配原则，除了吃饭不要钱，每个社员每月只给一元、二元、三元钱的津贴费，不管怎么干，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微小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不干活和少干活的人占有干活和多干活的



人的劳动成果，导致了出工不出力的人多起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正常发展，惰性在无形中膨胀。而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指战争年代——作者注），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毛泽东以为在战争年代取得的经验是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真理，他根本不承认，革命和建设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情。战争年代，由于敌对的关系，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将意志高度的统一起来，去战胜共同的敌人，因此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就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由战争的规律决定的。但是战争终究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怎么能用同一方法去指导建设呢？可是毛泽东却以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这两样东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导致他一步步走向“唯意志论”的深渊。

然而，精神力量永远不能替代物质存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不能创出所需的财富，有限的财力不足以支撑起梦幻的大厦。两个月后，徐水人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按照供给制实行15包，但全县全年的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与发工资、办事业所需费用相差甚远，根本负担不起来，就连每人每年应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便发不起了。11月，县里筹了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发了一次薪贴及部分生活用品款。12月，又筹了90万元，与计划需要相差很大，便挪用了商业上的资金

700万元，致使商品资金不能周转。搞了三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徐水县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比供给制更糟糕。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出现了全县物资和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县里根本不考虑资金的紧张状况，共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所，文工团、剧团、医院等也一哄而上，但很快就因资金不足，纷纷垮台，刚刚建起的政社合一的徐水人民公社也随之流产。

徐水自从搞了军事化、供给制、全民所有制以后，问题出了很多，除了共产风、浮夸风以外，强迫命令风也非常严重；又自认为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省委、地委的指挥根本不再听。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了河北省委的汇报，特别指出：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他们所实行的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毕竟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如，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

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

鸡鸭的饲养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

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良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

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 郑州会议上，对徐水试点提出了否定意见

正当粮食高产“卫星”不断升空的时候，北戴河会议根据毛泽东“拿农业来压工业”的意见，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通过了钢铁翻番的决议，并向全国发出了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动员会。这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的时间，而前8个月仅炼成450万吨钢，要在短短的4个月里完成620万吨钢的任务，就必须拿出登天的本事才行。一时间全国出现了一支由几千万人组成的钢

铁大军，同时也便出现了全国性的顾此失彼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局面。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造成了粮食、棉花在收成上的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一些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保住口粮、防止虚报产量而带来的高征购，采用了瞒产私分的策略，致使国家农产品征收任务未能完成，到10月底，国家粮食库存减少140亿斤。为此，中央于10月22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和调运农产品，于是出现了反瞒产运动，搞得农民怨声载道。而大炼钢铁运动，又因电、煤、炭、矿、运输等跟不上去，尽管一切为之让路，仍搞得一片混乱。

在这样的形势下，竟冒出来一个比徐水还冒进的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省）。10月28日，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在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并用一首诗概括了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看到桌上摆着新送来的《宣教动态》：“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马上打开读下去，觉得里面说得也有些道理，提笔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但范县的情况究竟如何，却没有把握。大跃进以来，说大话的人太多，近一段就听到许多关于徐水的反映，大话假话说了不少，真正能够落实的东西甚少。徐水不能再做全国的表率了，但是范县如何呢？还是派人先去了解一下再说。于是，毛泽东提笔

又补上了一句话：“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并在这一期《宣传动态》上批了“照发”二字，作为郑州会议的文件。

更出人意料的是：10月底，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社党委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这位书记万万没有想到，一宣布散会，社员群众便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去“共产”了：拿空了商店，就破门而入去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也可以任意去挖；更有荒唐到去托儿所、幼儿园，认领个孩子作儿子的。往后的日子如何过？谁也不知道。

面对形形色色啼笑皆非的事件，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忧的是干部们头脑过热，再这样下去，还不知要闹出多大的笑话来。11月初，毛泽东召集各路大将到郑州开会：一方面是为了划几条线，规范一下行为，以免继续胡来；另一方面是要泼点冷水，让大家头脑清醒一些。徐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当做了一剂良药。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批评徐水。他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就说是右倾。”“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就会使台湾高兴”。“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3、5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这些讲话，摆明了毛泽东之所以要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即分清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徐水之所以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制，是因为它“不能作全国的调拨”，既然连全民所有制都不是，徐水的所有制就只能是一种刚刚碰到社会主义门坎儿的经济组织形式，距离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的路程。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象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并批评徐水：“急急忙忙往前闯”。毛泽东还批评了徐水的“浮夸”：“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对徐水的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更是愤恨不已。“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这样一个徐水，怎么能做全国的表率？这样的典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典型还是要搞，榜样还是要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找出一个取代徐水地位的样板，——即毛泽东在8月份视察过的河北省安国县。这大概与河北省委的汇报有关。

安国县的情况又如何呢？早在1956年，安国县建立了集体

农庄之后，便提出“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全年粮食亩产1060斤的指标，比1955年平均亩产276斤高出3.8倍，结果由于当年发生严重的水灾，平均亩产仅达128斤。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和中央反冒进的形势下，安国县吹牛的劲头有所收敛。1957年9—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反冒进”，安国县故态复萌，拟定了1958年的指标：“粮食亩产500斤，争取650斤”。12月，又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将指标提高到：“粮食亩产800斤，争取1000斤”，提出了“万斤薯，千斤粮，乡乡大跃进，全县过长江”的口号。1958年南宁会议之后，又提出：“粮食亩产1050斤，争取1500斤，皮棉亩产100斤，争取150斤”的新指标。1958年6月30日，又在学习宣传八大二次会议的基础上，召开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能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为：“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订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4次提高到3000斤，高出省定元帅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源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积极采取对策，第5次提高指标，将粮食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一时真给人一种感觉，这粮棉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靠气吹出来的。长也罢，吹也罢，反正是闭起眼来说胡话：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

大关的记录。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代表，干脆住进了“安国饭店”，求取优良麦种。11月，安国县上报了平均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有余，向全世界扯了一个弥天大谎；不仅如此，还立下了明年夺取“千亩天下第一田”的誓言。更为恶劣的是，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服从，发明了许多包括诬辱人格在内的体罚办法。体罚过基层干部和社员的公社脱产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29%。安国还总结出了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县委的决定不准有任何怀疑，不然就采取“不信就算，不疑就看，不通就搬”的方法，轻则辩论（批判）、重则体罚。

对于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知之甚少，但他听信了某些汇报，便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并指示：“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降下了帷幕。

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从头至尾又认真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一个典型树起来不容易，倒下去却不费吹灰之力。他拿起笔，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表达了对徐

水的失望心情。

为了解决徐水存在的问题，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根据郑州会议的精神，对徐水进行了整顿。同时，徐水县委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修改了《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纲要（草案）》。这个修改草案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时间表，只是根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增加了一些内容，调整了一些数字，提高了一点标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更难实现的目标，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丽的梦想。

在大跃进中，徐水虽然象一颗流星，很快就消失了，但它终究发出过一道耀眼的闪光。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连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也抑制不住强烈好奇心的诱惑，拖着病弱的身体同贺龙、聂荣臻一道跑到徐水观看，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墙上写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和画的其大如牛的肥猪及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大白菜；幼儿园里象背课文一样呆板地回答参观者提问的孩子；敬老院中四壁肃然，没有生活气息，面壁呆坐的老人。罗荣桓风趣地对聂荣臻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共产主义试点虽然失败了，徐水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但是这种“超越时空”的历史教训是万万不能忘记的。

（责任编辑 洛松）



# 蒋介石踢足球

石林 瞿书惠

蒋介石初到上海谋生，有一天，他在街上闲逛，忽然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中学门口停下了，是校园内一群中学生在踢足球，那热闹的场面把蒋介石吸引住了。他最欣赏一位细高个学生，那高超熟练的球艺令之叹服。这位细高个学生球性很熟，一传一接非常自如，带球过人，一晃就是两三个，到了门前，飞起一脚球直奔大门，守门的学生鱼跃扑出，他又横身打凌空，守门的学生回身不及，足球钻入网底。

一球进门，双方比赛重新开始。对方输球，急于捞回来，一名学生踢球用力过猛，把球踢飞了，落到学校旁边的一座洋人的花园里。同学们只好望球兴叹，那座花园是用铁丝网围着，人进不去，球拿不出来，急得他们团团转。

这一切，被站在学校铁栅门外的蒋介石看到了。蒋介石在门外高声喊：「放我进来，我有办法把球捡回来。」那位细高个学生跑到大门口，请校役把门打开。细高个学生说：「你有办法把球捡回来吗？」蒋介石说：「我能把球捡回来，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要参加你们的球队。」那位细高个学生点头答应了。蒋介石让同学们找一把克丝钳和一条草席，同学们很快就拿来了。蒋介石站在细高个的肩上，用克丝钳把洋人花园围墙上的铁丝网剪开一个洞，把草席垫在洞口以免扎伤人。蒋介石顺洞口钻进花园，把球扔出来，再用克丝钳把铁丝网恢复原状。

蒋介石把球捡回来了，同学们很佩服蒋介石的点子 and 胆量，对他刮目相看，一致同意破格吸收他为不在校的球员。其实，蒋介石对足球是刚刚入门，球技一般，年轻人模仿力强，初入门的瘾头大，跟那位细高个学生踢球进步很大，很快就加入主力阵容。

后来，蒋介石发迹了，当了国民党的委员长，他没有忘记年轻时最要好的球友，就是那位细高个学生，他叫朱建山，是江苏昆山陈墓镇人。蒋介石写信给朱建山，要他到南京来做官，但被朱建山婉言谢绝了。



□王赐九原稿  
□方雅南整理



# 我驾机秘密转移 张学良夫妇去台经过

近来，国内有些报刊发表或转载了有关本人在1946年驾机秘密转移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由重庆去台湾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情节全系作者渲染杜撰，严重失实，以讹传讹混淆视听。

1946年10月30日，我刚驾驶专机由南京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宿舍休息，站长来宿舍通知我：“奉上级紧急命令由你驾驶专机执行特别任务去台湾桃园机场，明晨8时30分准点起飞，今晚把航线准备好，千万不能出差错。”说完让我复诵一遍就匆匆离去，神情较往日凝重。

九龙坡机场离重庆市中心约10余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长江，地僻人稀、狭窄且跑道不足千米，仅能供中、小型运输机起落，其它飞机都使用较远的白市驿机场。11月1日晨8时我到达机前，地勤人员已检查完毕向我交待说专机状况良好；机组人员除副驾驶赵连景是老战友（赵后来随军去台湾，其夫人杨宝琛现定居美国夏威夷，两子都在西亚图工作），领航员、通信员、机械师等人都较生疏，均忘其姓名了。我看到专机尾部舱门左侧地面已停放的吉普车旁，站长和一位身穿呢军服未戴军衔的中年人在交谈，站长招手示意我过去，然后介绍说：“他是机长王赐九，是最优秀的飞行员。”那位官员朝我微微点了一下头，颇有高傲凌人之态，使我顿生反感，立即离开指挥机组人员对专机进行复查去了。随后我来到

舱门前朝机内望去，右侧放有两个藤箱和背包等简单行李。藤箱上坐着一位穿阴丹士林布旗袍外罩毛线短衫年约三十多岁的女士，虽未施脂粉，朴素无华，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雍容仪态。她一手支颐，两眼朝机外四处张望，流露出惶惑神情，好象在沉思什么。身旁有一位约莫40多岁身着中山服的男士不时前后踱来踱去，步履间透出军人的阳刚气概。他两眼朝我上下打量，显然已从我身穿羊皮茄克头戴飞行帽的装束中判断出是专机飞行员了。他朝吉普车那边瞥了一眼回过头来盯着我，似是欲言又止有点局促不安。舱内左侧被包上坐着一位50多岁满脸风尘的老人在木然发呆，颇象军中的伙夫。他身旁伫立着一位四十上下的男子一动不动，显得十分拘谨，可能是侍者之类的身份。我捉摸不透这身份颇显悬殊的三男一女究竟何许人也。出于好奇我仔细看了看那位先生，顿时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颇有似曾相识又茫然之感。

此时机场内外寂谧，人迹渺无，一反送行者车水马龙的常景。时针指向8时30分，看不到另有人来，引起我满腹狐疑，试探性地问站长人到齐没有？站长说人已到齐，那位官员随即攀上悬梯向我挥手说：“起飞吧！”我和机组人员登上驾驶舱起飞，专机呼啸着斜插长空越江升腾而去。

航途，我不禁对这次飞行许多异于常情之处陷



张学良在台湾的会计室及看门人



1989年张学良在台湾家门口

人沉思：为什么不按常规签发放飞通知单（内含空运人数、部门及姓名、载物重量等项），而由站长亲自到场？为什么空运的三男一女身份反差很大，但不似权贵显要人物却要动用专机？不是还都南京而直航台湾？为什么一反常情，不但没有官员前来送行，连亲属也不见一个？为什么机场内外如此沉谧严重得近乎神秘？为什么这三男一女默默地无言不见轻松欢快反是个个忧形于色？为什么昨夜站长交待时说什么“上级紧急命令……执行特别任务”，还不必要地叮嘱什么“千万不能出差错”，其中奥秘何在？为什么我对那位先生确是似曾相识而又茫然陌生，他究竟是谁？

一连串的为什么激起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搜索枯肠冥思苦想寻求答案，许久，许久，猛地心头一震若有所悟，他不是名闻中外的张学良少帅么？对这位青春年少即凌云得志曾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见过他的许多巨幅照片，印象极为深刻，是他！只有他才具有能解开那一连串为什么之谜的条件！是耶？否耶？我无以自制在飞行中一直处于紧张而又亢奋之中。

专机在重庆起飞时雾霾很重，标准的雾都气候，能见度仅两公里。飞机一直在云层上飞行。到江西遂川时云量才逐渐减少可见地面，进入福建上空已是碧空无云能见度极佳，苍莽大地一览无遗了。过了

福州已可遥见台湾宝岛，霎时那雄伟壮峙的阿里山脉尽收眼底。经过5个小时飞行终于顺利飞临桃园上空，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始终见不到显示降落的标志，通讯联络不上而风速又超过标准，怎么办？为了确保安全，只得向台北机场呼叫，总算取得联络并得到允许在该机场降落的指示而改飞台北。专机着陆刚定，一辆黑色轿车立即把陪送官员和三男一女接走了，神速到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不能不惘然若失，引为最大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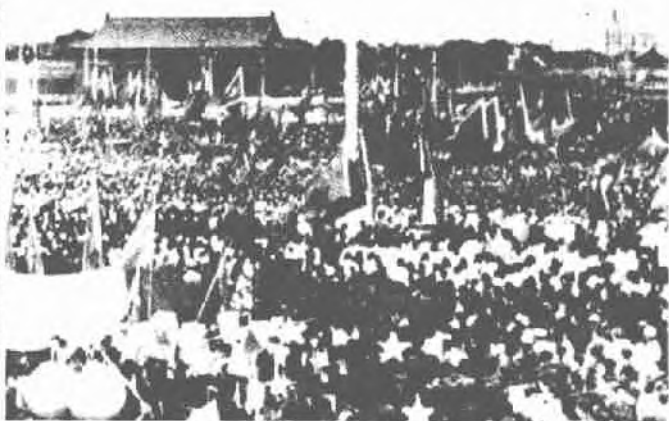
次日我们按指令飞返南京复命，刚降落在明故宫机场就接到通知去航委向作战处陈处长汇报（陈系航校二期毕业，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曾于一个夜晚只身驾机潜飞到日本九州投放“告日本人民书”大量传单并安全返航，被誉为孤胆英雄），一见面他就劈头盖脸斥责我：“为什么不按命令在桃园降落而擅自改飞台北？”我理直气壮地将情况呈述后，他盯着我声色俱厉地警告说：“对这次飞行你不要自作聪明胡乱猜疑，更不准透露半点消息，否则杀你的头”。说完很不耐烦地挥手叫我离去。我受此窝囊气真有一肚子委曲和怨愤，但无处发泄只能自个生闷气。但也彻悟到我的判断无误，不禁为执行这一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任务未出差错而庆幸，竟冒出一身冷汗。



石林 瞿书惠

# 司徒雷登 离开中国 以后

195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盛况



毛泽东主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何许人也？他是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后来作了传教士，又成了燕京大学校长，直到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大使。他的一生是跟中国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作为支持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

1949年，国民党兵退台湾岛，大陆解放了，作为传教士，他本人不愿意走，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奉美国政府之命，暂时留在中国，他反正是没有走。

中国大陆解放了，到处是欢乐的人群，游行的队伍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司徒雷登感到孤独，冷落，中国人都不理睬他。美国大使馆的“使”字车牌被拿掉了，十五部车只发给一个车牌，只能通行一辆车。使馆的人员都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司徒雷

登不想走，他对中国感情太深了，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望着燕大校友赠送的纪念品出神，连他的女秘书与著名的记者李普曼结婚时，作为证婚人，他一言不发。

一切都完了。司徒雷登知道，他没有必要再留在中国了，他以外国侨民的身份办了离境手续。于1949年7月23日，怀着悲哀的心情，默默地踏上开往美国的飞机。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没有固定的住宅，尽量避免会见记者，行动也不为朋友所知。之后，他虽然到美国各地发表讲演，也不谈中美关系。他是基督教徒，讲话多是讲些祈求世界人类平安无事的内容。他没有亲人了，夫人在他四十刚出头就去世了，葬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在燕大时，他每天到夫人墓前静坐，谈一小时圣经才去用早餐。回到美国后，到南方的老家，每天到他和夫人

度蜜月的小路上，慢跑半小时，以悼念亡妻。

司徒雷登孑然一身，曾是他私人顾问的傅泾波，拿出私人积蓄，在华盛顿买了一栋宽敞的二楼楼，接司徒雷登来合住，象一家人一样，给他以温暖。

有一天，司徒雷登在火车上突然中风倒地，被送入医院，因抢救及时，病情好转。在他八十大寿时，美国燕大校友为他祝寿，一些京剧爱好者唱堂会戏《游龙戏凤》，数百位来宾到场。司徒雷登非常喜欢这种中国式的庆祝方式，但他因病不能来看戏了。

1962年，病魔夺去了司徒雷登的生命，终年八十六岁。追悼会在纽约举行，规模很大。会后，骨灰盒由傅泾波捧回华盛顿，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始终没有送去安葬。

1948年底，蒋介石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奸诈的蒋介石以退为进，与此同时，与其勾心斗角的李宗仁亦想取而代之，以挽救危局，于是台前幕后，演出了一场“逼宫”好戏……

# 李宗仁“逼宫”

## (一)

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怀着怆然的心情送走了夫人宋美龄，尚未从和宋美龄依依惜别的情感中解脱出来，他又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杜聿明自徐州仓皇撤退的战报，恰好在杜聿明所部三个兵团西撤徐州，陷入华东野战军重围的12月3日，出访美国的宋美龄自大洋彼岸打来了长途电话，报告她在美国莱尔脱德医院拜会了病中的国务卿马歇尔，向马歇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要求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计划。就在这时，南京上层军政各界人士都在风传：面对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唯有请蒋介石下野，政由李宗仁接任主持，军由何应钦负责，这样才能做到和有主和的谈判主帅，战有能和美国默契配合的战将。这对蒋介石的震撼，无疑要超过即将惨败的“徐蚌会战”危局。

蒋介石是依靠军队起家的。几十年来，他无论处于何等不利的地位，都紧紧抓住军队不放，并依靠手中的军权置各种类型的政敌于绝境，然后再迫使政敌拱手称臣，或俯首请他出山。时下的美国佬不念旧情，不但逼迫自

己交出总统的桂冠，而且还要把自己手中的帅印让给何应钦。这样一来，蒋介石就真的“下野”了。蒋氏决不会屈服于司徒雷登的压力，违愿地同意这一方案。

蒋介石为了挫败司徒雷登导演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逼宫夺权，他必须尽快地组建一个听从他指挥的内阁。而新内阁的第一人选就是行政院院长。他左右筛选，终于选定了孙科。

他认为孙科不仅会欣然同意出面组阁，而且还会自觉地协助他遏制李宗仁逼宫上台。

蒋介石的预料是正确的。孙科同意组阁，并表示要组织“巨头内阁”，坚决邀请张群、吴铁城、翁文灏、陈立夫、邵力子、张治中等大员入阁。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因为这“巨头内阁”不仅能够体现举党一致的政治色彩，而且还能粉碎李宗仁、何应钦分掌军政大权的阴谋。蒋介石在筹组孙科内阁的同时，他一直在研究应付李宗仁的对策。诚如沈醉所说，在这些天中，前几次欲动杀念，终因国内外形势所不允而作罢。他感到惊异的是，李宗仁虽偶与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少数接触之外，他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

就说他那位竞选参谋团主任黄绍竑吧，也从不到南京来，在上海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近来，中外都在吁请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可这位做梦都想当总统的李宗仁依然是寓居傅厚岗官邸，过着悠哉悠哉的“寓公”生活，这就更使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大惑不解了！蒋氏为了驱散罩在李宗仁头上的神秘迷团，彻底亮出李宗仁取自己而代之的真心，遂采用火力侦察的办法，突然决定于12月4日约见李宗仁。

李宗仁自打参加竞选副总统那一天起，他就存有取蒋而代之的想法。而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局势，他这种取蒋而代之的想法又逐渐化为实际的行动。或许是他太了解蒋介石为人的缘故，他认为自己与其亮出旗帜大张旗鼓地逼蒋下野，还不如默不作声地观变坐等。当然，他认为最好的结局是：蒋介石感到自己实在混不下去了，亲自出面请他上台。因此，他就像当年屈居曹阿瞞之下的刘玄德，故意作出一种没有野心的样子，过着表面看来与世无争的平和的生活。今天，蒋介石突然传下话



□王朝柱

# 始末

来：召见。

蒋介石依然摆出党的总裁、三军统帅、国家总统的架子，故作礼贤下士的样子请李宗仁落座，在谈了一番形势之后，遂又把话题一转说道：

“我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美国的肉中刺，各界所谓民主战士不受欢迎的总统了。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想恋栈，想及时引退。下面的文章该如何作呢？我想也只有你能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

李宗仁虽然估计到，蒋介石会亲自出面请他上台，但决不是今天。因为蒋介石的老本尚未输光，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援助也还未完全绝望，就说全国吁和罢战的呼声，也不足以使蒋下台。因此，他认定蒋今天的举动是别有用心的。他听了蒋氏请他“顶起这局面，同中共讲和”这句话后，作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

“这局面你都干不了了，我如何顶得起！”

蒋介石无论怎样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其接受，李宗仁都故作姿态竭力推辞。

蒋介石的火力侦察失败了。李氏回到傅厚岗官邸，又认真地

分析了蒋氏此举的真实用心——在测试李宗仁政治动向的同时，也暴露了蒋氏一直想下野的事情。

蒋介石送走李宗仁以后，他再次想到了自己所处的困境，“徐蚌会战”、“华北会战”彻底失败之后，他很可能在外有美国，内有中共及其解放军的双重压力之下，被党政军中的反对派轰下台。与其不久的明天出现那种悲惨的结局，还不如从现在起就主动下毛毛雨，做到进退有据。因而，他又动了请李宗仁出山的念头。他左思右想，为了达到施放风声的目的，又请来了他忠诚的谋士——同时又和桂系保持着不错关系的吴忠信，开诚布公地说道：

“我的总统是注定干不下去了，我想请你接替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这……我哪是秘书长的材料啊！”吴忠信惶恐不安地说道，“总裁，你一向是知人善任的嘛，我……”

“非你干不行！”蒋介石打断吴忠信的话，又进一步说道，“观察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



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

吴忠信获悉蒋介石要他组织一个为蒋、李都能接收的吴忠信内阁，所以欣然应允，并代蒋充任说客。

吴忠信再次代蒋游说，李宗仁就不能不严肃的考虑了。他思考良久，决定把蒋、吴的谈话当作一种信号，纳入到他逼蒋下台的全部战略中。接着，他又几经权衡利弊，遂于12月5日要通了武汉华中“剿总”司令部的电话，要时在武汉的程思远于六日速返南京。

程思远如时回到南京。首先，他向李宗仁报告：“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崇禧）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

运动，目的在迫蒋下台。白要我为此到湘桂粤一行。”接着，李宗仁向程思远讲了吴忠信夜访傅厚岗的全部内容。最后，李宗仁说道：

“从目前看，局势将变得很快，你留在南京等候发展。同时，代我和健生联系。”

就在蒋介石和李宗仁相互摸底期间，又发生了白崇禧有意设置障碍，拒绝蒋介石调宋希濂兵团经武汉东下，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的争吵。

12月10日到了，蒋介石没有去黄浦路官邸处理黄维兵团求援、以及杜聿明所率三个兵团陷入重围的军情，独自一人留在那空空荡荡的卧室里，焦虑地等待宋美龄自美国打来的电话。宋美龄无限伤感地告诉他，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关于加派一个高级军官为顾问的请求，杜鲁门总统明确地答复说：“巴大维将军对现时情况甚为熟悉，彼之意见，可随时供给委员长。”这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凉水。

真是祸不单行！黄维兵团残部遵照蒋介石的指示突围，在廖运周师长率部起义后，数小时之内全军覆没，黄维等高级将领被俘。

蒋介石真的要下野了！他面对空空荡荡的卧室，内心这极其复杂的情感几乎失去了依托，也失去了平衡。这时，他是何等的希望宋美龄能守在自己身边，为之分忧解愁——或大吵大闹一通也好啊！可她此时此刻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为了改变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继续在美国向各方人士游说。

正当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下野，并正式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之际，时在武汉的白崇

禧急于逼蒋下野，突然于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等转蒋，公然要求与共产党谈和。这不仅激怒了蒋介石，同时在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 (二)

白崇禧独居武汉，焦急地企盼着蒋介石快些下台！黄维兵团被歼之后，他曾收到程思远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张群、张治中、吴忠信来傅厚岗官邸看望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协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

(一) 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 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 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外研究；

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白崇禧太了解蒋介石的政治品格了，他认为蒋氏的代表所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算数的，只要蒋氏没有公然声明下野，他都可以推翻这类私人间的君子协定。因此，他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切勿上当。另外，他认为第二条款：“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其概念含混不清，也容易为蒋介石他日秋后算帐钻空子。他为了避免沿途转换站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灵机一动，突然由国语改为粤语，对程思远叮嘱：

“蒋下野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

“请德公一定不要手软，对此

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白崇禧接完程思远的电话，大有跃跃欲试之感。他认为只要从外边再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辞职下野就会在1948年岁末变为现实。恰好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听说宋希濂自南京飞抵武汉，他沉吟有顷，遂又打起了这位蒋记“天子门生”的主意。

在白崇禧的心目中，黄埔系的娇子们决不会为其校长殉葬。就其求生的常理而言，他们会从黄百韬、黄维、杜聿明等师兄弟的下场中醒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必须改弦易辙，变打为和，国民党才会有出路，每一个人才会有新的前途。他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遂又异想天开地认为：如果以宋希濂为首的“天子门生”转战为和，这对蒋介石的打击将是最大的。因为此举宣告：蒋介石的子弟兵离心它去了！白崇禧不是当代的张子房，更不会吹箫放歌，他决定当面策反。

据宋希濂的回忆，大约是17日或18日的早晨8时左右，白崇禧把宋希濂带到自己的家里，引宋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对宋希濂说了这段史有可记的话：

“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两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

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崇禧说罢认真地注视着宋希濂的变化，并问宋的意见怎样。这样，就把宋希濂逼到了一个很为难的境地。宋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表情，他这位本不会吸烟的人信手燃起一支烟，颇不在行地使劲地吸着。宋沉吟了一会儿，遂说了下面这段话：

“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

白崇禧策反宋希濂失败之后，旋即又转为策动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出白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反响，而且孙科于12月22日宣布他的新内阁组织完成。白再一看孙科新内阁的主要成员：政学系的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CC系的头子陈立夫以及朱家骅都当了政务委员，这表明它是一个“举党一致”的内

阁。换句话说：蒋介石虽然声言下野，可行政院依然是蒋家王朝的原班人马。就是李宗仁登上总统的宝座，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傀儡而已。加上他远在武汉，不知蒋介石已经让新上任的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转告李宗仁：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1949年元旦，同时由李接任。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白崇禧几乎发怒了，就在吴忠信出任秘书长的同一天——12月24日由汉口发出了“亥敬”电：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达钧听，并贡刍蕘：（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英、苏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李读罢电文连声说道：

“糟了，蒋介石可能误会我们逼他早日下台，从而老羞成怒，故意把事情拖下去。”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敬”电文之后，当即雷霆大发，并一

口咬定李宗仁是这通“亥敬”电的后台，李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遂决定元旦下野向后推迟。

但是，国内外的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这又给蒋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白崇禧发出“亥敬”电的第二天——12月25日，蒋介石欲要闭门谢客，独自在家过圣诞节，并按照西方的传统，倾听上帝给他传报佳音的时候，中共权威人士向中外公布了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位居第二，白崇禧继陈诚之后名列第四。这就是说，中共一旦取得全国的胜利，就像是两天以前——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并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一样，他将某人也要被中共送上断头台，其畏惧之心是可想而知了！

司徒雷登就像是有意和蒋介石过不去似的，在这种火口眼上又公然表示：解决中国问题，蒋介石下野为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蒋介石身边的几位相随有年的文臣武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等人“认为要在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因此，他们主动上门和蒋谈“战”“和”。谈前景，“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希冀蒋介石不要因为白崇禧的“亥敬”电而负气，还是顺应潮流主动下野为好。蒋介石的气因而消了许多，遂又动念下野。

恰在这时，已近尾声的“徐蚌会战”前线迭连发来要求空中支援的电报。他呆痴地望着那张被解放军蚕食得越来越小的军事地图。

蒋介石召来了张群、吴忠信、张治中，共同磋商下野之事。他们四人密商的结果是：蒋总统因身体原因暂时离职。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暂代。

对此，李宗仁自然明了蒋介石及其谋臣们的用意：蒋既然因身体的原因可以暂时离职，也可以因身体的原因随时复职。结果是：他这个暂代总统形同蒋介石手中的玩偶，毫无独行其事的主动权。他自然不能接受。

正当蒋、桂双方为下野、上台进行讨价还价的艰难谈判的时候，远在武汉的白崇禧又等得不耐烦了，遂于12月30日，对蒋介石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  
易，和亦困难。顾念时  
间迫促，稍纵即逝，鄙  
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  
转告友邦，公之国人，  
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  
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  
受，借此摆困境，创造  
新机，诚一举而两利  
也。总之，无论和战，  
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  
与，恳请趁早莫断。

蒋介石在收到白崇禧“亥全”电的同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发来“亥卅”电，表达同样主张。因此，蒋介石更怀疑白崇禧正在湘鄂豫三省开展一次迫蒋下台的运动。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全”电文以后，气得浑身发抖，连声说着“真是欺人太甚了！欺人太甚了……”蒋介石认为桂系正在上演的这场逼宫戏，李宗仁唱的是白脸，白崇禧唱的则是黑脸。加之时局发展到了这一地步，他认为自己再也不能一声不吭了，遂决定利用发表元旦文告之机，阐明自己的主张，并命“江西才子”陈方代笔。

陈方应命赶到。蒋介石向往常那样，首先讲述元旦文告的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

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旋即陈方返回自己的家中，把蒋介石的指示化做一篇官样文章，然后再送请蒋介石过目，有时蒋还要亲自动笔略作修改，这就是蒋介石——不！世上绝大多数所谓元首的文章。

陈方送来了元旦文告的草稿，请蒋介石审定打印，并提前交给各大新闻单位录用。

或许是这篇元旦文告实在是太重要了缘故，蒋介石看得十分认真，而且还逐段逐句的斟酌。

蒋介石看完有关和谈的段落之后，他又认真地研读有关他进退的内容。遂提笔在“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一句的后面，增加了如下一段文字：

“中正毕生革命，早  
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和  
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  
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  
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府邸里火树银花，照耀夺目，四周墙壁还贴着圣诞节的七彩剪纸，显示着节日的气氛，但是在座的人们表情阴郁，好似大祸临头，忧心忡忡”。今晚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仁，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范予遂、肖同兹等，共40多人。移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

“现在的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

家意见。”

张群照本宣科把全文念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侧目看了看李宗仁，问道：

“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吗？”

李宗仁知道蒋是在试探其底数，他故做憨态的样子，说了下面这句话：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CC骨干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都极力反对发表这个文告，因为它表示蒋下野谋和，将对于士气人心发生重大影响。肖同兹、范予遂等则表示相反的见解。两派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时，阎锡山起而说道：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非和谈不能救国。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看一下，谁的心也不死。至于这句话，若是没有了，文告也就没意思了。”

阎锡山的这番话暂时把争论平息了。突然谷正纲号啕大哭，坚持删去“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段话，遂双方争论再起。蒋介石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

### (三)

除夕夜是漫长的；对蒋介石而言，今年的除夕夜尤其显得漫长！

蒋介石参加完府邸餐叙，回到自己空旷的客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他蹙着眉头，微眯着双眼，上身向后倾斜，紧紧靠在沙发背上，不时发出一两声怅然的喟叹。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之

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就是蒋介石“御驾”往访李宗仁的前一天——1月3日，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称“该文告为一过于冠冕堂皇之文章，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是以忽略若干不愉快之现实：即军事力量几已全部崩溃，最近经济措施之失败，几乎举国一致对和平之祈求，与在蒋氏执政期内此种和平之不可能。另一缺点则更为严重，即在某一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给予充分之退让。”又说蒋实际上已“收回方于两周前决定之辞职，与由副总统自由采取被认为系谋国家福利的任何政策。”

这样，中外形成了一致的舆论：蒋介石恋栈不去，中国问题终无解决。蒋介石为缓和压力，遂又派张群和吴忠信找李宗仁。用李宗仁的话说：“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蒋第一次下野）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怎么办？蒋介石只好请李宗仁到总统府官邸谈话。

15日，天津失守，这标志着所谓“华北会战”失败的开始。到这时，蒋介石真的认为到了考虑“引退”的时候了，遂命令已先期回到溪口的蒋经国，加紧布置警卫网和通讯网，为自己“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18日，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任命了他和蒋经国议过的文臣武将的职务后，又于1月19日下午4点，约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谈话。蒋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了的，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

邻主持。”这些与会者谁也不愿作出头鸟，故半晌没人说话。蒋一个一个地问，唯有吴铁城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猝然火冒三丈，愤然地说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与会者一见蒋介石大发脾气的样子，就更无人再说些什么。蒋介石最后说道：

“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蒋介石决计下野了！但是，他就像占往今来的中外政治家那样，决不会放弃报复政敌的一切机会。他把下野的日子选在杜鲁门总统就职的第二天，也是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就任国务卿的日子。蒋的用意是清楚的，我的下野不单单是被桂系逼宫造成的，而且也有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功劳”。

1月20日深夜，蒋介石电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暗杀李宗仁的行动结束，让沈醉回昆明去。

1月21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蒋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

机。”

蒋介石讲话的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对某些免死狐悲的与会者有着不小的感染力。“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悲痛。”这时，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

“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低沉答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旋即取出一纸对李宗仁说：

“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蒋介石起立宣布散会，李宗仁憨厚地问道：

“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蒋介石淡然地答说。

“总统！总统！”

蒋介石闻声回身一看，一位美髯飘逸的老者踉跄进来，他忙问：

“于院长，有什么要事相告吗？”

这位于院长就是鼎鼎大名的于右任。他十分诚恳地说道：

“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挥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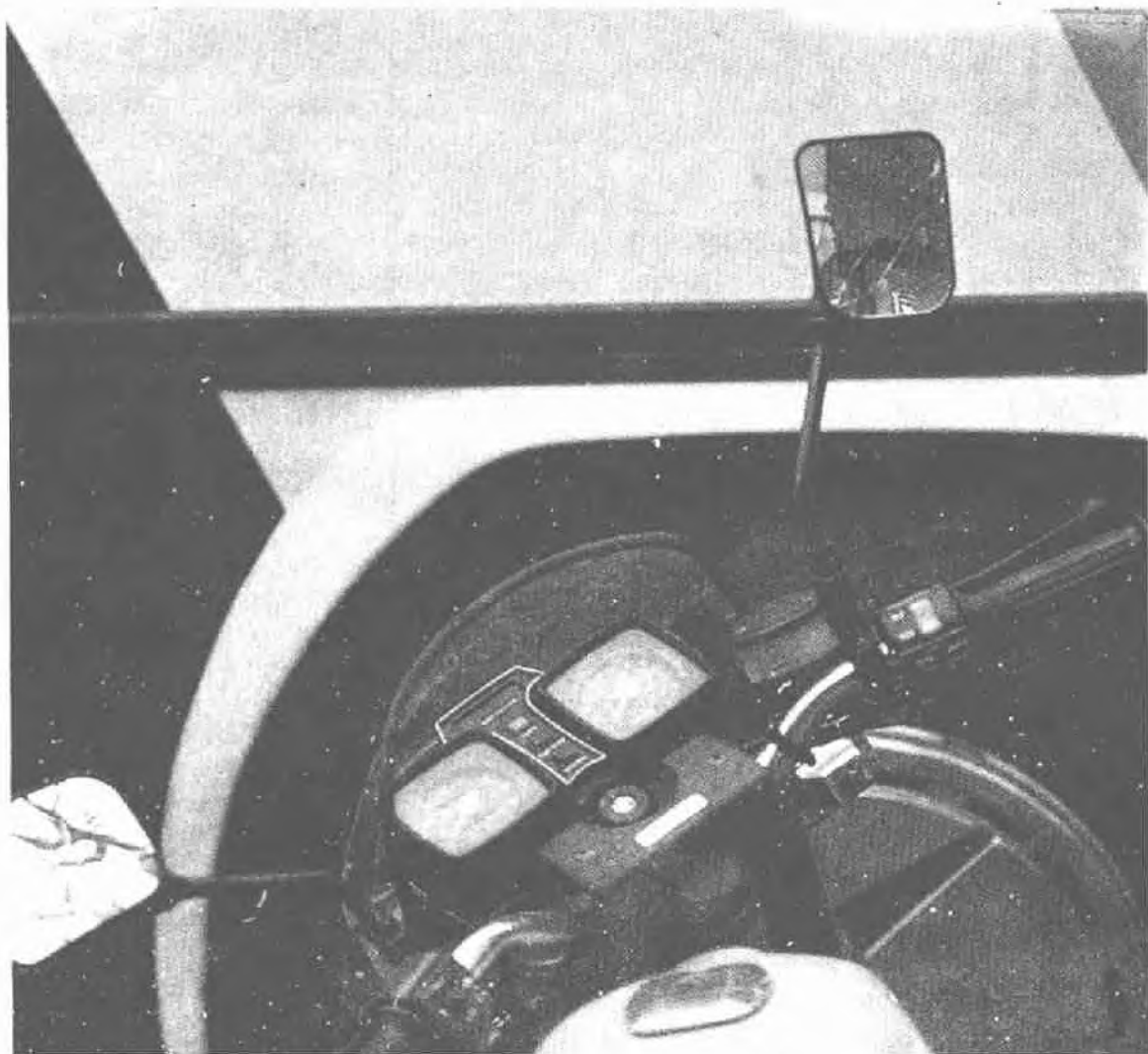
蒋介石的行踪一向是保密的。他离开会场之后，便趑趄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向杭州。厚道的李宗仁于下午遵时赶到明故宫机场，自然是空跑一趟。这时，他才真的相信蒋介石是下野了。同时，一种莫名的压力向他袭来，使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将怎样收拾这盘残棋呢？……”

“炒”房地产的狂潮在京城掀起，各式人物纷纷登台表演，不见经传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濒临破产的企业领导者又靠出卖房产企图起死回生，……作者是行家里手，深入内幕几年，写出了这篇生动的特写。

# 京

# 神





# 城

# 秘“炒”房人

□刘长华

近两年，沿海开放地区房地产热得烫人的手，火得烧人的心。北京起初呈观望态度，动静不大，显得很冷清，很保守，在九三年春天来临之际，终于启开封闭的京都之门。几乎一夜之间就诞生了几百家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冒出无数房地产信息咨询部……

## “空手道”玩出高档次

李仲昆已经40岁了，在中央某单位当了多年机关干部，连个科级头衔也没混上，每月工资百十多元，也曾想过辞职“下海”，但毕竟端“铁饭碗”的年头太久了，自己没有一技之长，面对商品经济大潮惶惑不安，长吁短叹。

机遇人人皆有。李仲昆并不善于把握机遇，倒是妻子无休止的埋怨使他脑袋开了窍，两个肩头扛一个脑袋，谁比谁能差多少！妻子那个同学除了吃饭睡觉，再没别的本事，前两年竟然只身闯深圳，下海南，做起了房地产经营生意，最近回到北京，俨然一副巨商大亨派头，坐着奔驰500豪华汽车，住着五星级大饭店，身边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小姐。玩房地产成了大款的人太多了。别人也是人，别人能做的事，他为什么就不能做？

他很快就成立起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个人承包的形式挂靠在中央某部委名下。挂靠单位名头越大越响，公司的牌子也就越唬人，越硬气。

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金不能少于500万。妻子去求那位同学出具一张资金担保证明，在工商局蒙哄过了关，帐号上的钱，没有分文能够由他支配。公司牌子不小，为了显示实力好办事，他咬牙吐血在一家中档饭店租了一间办公室。他的职务是某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妻子是总会计师。名曰总公司，实为夫妻店。

李仲昆对房地产业务一窍不通，但他相当聪明，深知房地产开发资金投入大，有风险，而且周期太长，眼下他手中没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空手套白狼”。

“倒”的另一个名字叫做“炒”，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倒”是违法行为，而“炒”则是合法经营。他有执照没资金，叫什么都可以。眼下谁也说不清北京究竟有多少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却能数得出有多少家公司在真正从事开发建设，其余的不言而喻都在“炒”。房地产是大买卖，从中能“倒”出无穷的财源，“炒”出无尽的油水。那些真正在搞开发建设的公司不是官办企业，就是合资企业，官办企业带有一

定垄断性，靠行政划拨取得开发地块。合资企业实力雄厚，财大气粗，别人无法与这两种企业竞争。现在北京房源十分紧张，城市开发，危房改造，都需要大量房子做周转，搞拆迁安置，使原本就奇缺的房子更加紧俏。什么紧俏“炒”什么，正是“炒”家的生意经。

极少数开发公司建出的数量有限的房子，成了大多数开发公司争相“开发”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房价越来越高。李仲昆一无经验，二无实力，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他暴躁如雷，但未灰心丧气，清楚这样跟着“炒”没戏，必须得抓头手货。

此后，他不再打着安置拆迁的幌子去炒楼炒地，一连数日往政府各有关部门跑，整天出这个委的院，进那个局的门。衙门难进，小鬼难缠，手续繁杂，凡事拖踏，万事开头难嘛。他申请立项，不厌其烦；感情投资，不皱眉头。终于以超人的忍耐力和大把的金钱打通各个关节，踏平道道门坎，使“开发”达到“三通一平”终于抓到几个开发项目，拿到几笔抵押贷款，比头手货还头手货。

有了项目和资金，便可以稳坐泰山，身不动膀不摇，财源就滚滚而来。至于具体怎样开发，何时开发全是假的，那是别人的事情，他李仲昆不想挣开发的钱，也挣不了这份钱，随便“转让”出一个项目，就能赚上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以前他追着别人“炒”，现在是炒家们围着他转。公司的牌子也响亮多了，他出资建起一座很够档次的小办公楼，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要求条件是，男性已婚而忠厚老实有业务能力，女性未婚而年轻漂亮有迷人魅力。“奥迪100”专车代替了以前的自行车，他的气派真像个总经理了。

## 玩房玩地“短平快”

他，由某局机关副处长的座位上跌落下来，到基层去领导一个只有8个老弱残兵的房屋修缮队。

一个外商看中了他。广州、深圳、海南……南方的房地产不好玩了，外商纷纷向北方进军，北京是个前景看好的地方，这里正在“筑巢引鸟”，希望“引鸟下蛋”。同样是外商，港商与日商有所不同，港商相信地方势力，日商信任国家政府。他万全顺结交广，朋友多，正适合港客的口味，上赶着提出要跟他合资搞房地产，并请他出任中方经理。那位港客是个投机商，手中只捏着500万美元资金，在境外不动产界是个放屁都不臭的人物。这笔钱搞别的产品项目说得过去，但要搞房地产开发则等于打水漂儿，连个响都听不见。于是万全顺向上级拍了胸脯，自筹资金干合资。他请朋友帮助搞个假项

目，从建设银行贷款5千万，理所当然地控股这家房地产公司。

那个港商与万全顺年龄差不多，也是30多岁，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万全顺的。大陆办事手续繁杂，关卡甚多，搞独资企业简直寸步难行，必须得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万全顺交际广，路子宽，人挺精明，又懂业务，不须他劳神费力，便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高出几倍的利润。中国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搞投资风险大，然而这样更有机可乘赚大钱。

万全顺玩的是“短平快”，聘请和雇佣一帮子人满街转，深入胡同巷里去为他抓房抓地，专门收购四合院，小独院，散平房，以最低价格买进，用最高价格卖出。城里的地皮寸土万金，房子再破也不要紧，甚至越破越好，花30万元买座200多平方米的破独院，好歹收拾收拾，再出手就能翻两翻，卖到百十来万。对那些受聘和受雇人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都给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头衔都是某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这些人有的是兼职，有的是无业游民，胡同窜子。

但北京的私房十分难找。费了多少周折才找到一所房子，里面却有房客。房客往往比房主难缠，他赖着不走，他说了：“要搬可以，得给我在二环路以内找3套四居室，得有双气，得是产权！”其实，他在别人私有的10间房子中只住着1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厢房。这所院子的价值顶多20万元，房客要求的3套四居室楼房，在二环路以内则价值150万元。许多私房主手里捏着房产证，说起来拥有多少房子，实际上住得十分拥挤，甚至没有房住，上辈子人给自己留下窝儿长期被人占据着，巴不得快点卖掉。然而自己想卖掉自己的产业却相当不易，首先得过房客的关。房客说了：“是公家让我住这儿的，要是你，倒贴我多少钱都不来，有话找公家说去，跟我说不上！”“谁愿意住这破平房，只要单位给解决合适的房子，我他妈立马就搬走！”有的房客根本没有单位。于是，便有打不清的官司扯不断的皮。在北京，想找没有房客捣乱的房子如同大海捞针。尽管如此，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们仍然把这种买卖视为肥肉，1间破房200家争，再加上闻风而至的无数咨询部和“房虫子”，倒给房主创造了发财的条件，1间10平方米的破平房开口就要3万元、4万元，随时倒塌的危旧房成了聚宝盆，摇钱树。

万全顺折腾了半年，竟连一笔买卖也没做成，劲没少费，钱没少花。他着急上火之余，倒也没忘记及时行乐，每天坐着“黑牌子”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宾馆大饭店。一到晚上就更忙了，有几处高级酒吧几乎同时在等着他的光临，每处酒吧内都有几位陪

酒小姐在同时对他望眼欲穿。他是合资企业中方老板，更是挥金如土的大款。给小费出手千元，毫不吝啬。

最近，那位港客要来北京，看看经营情况如何，企业赚了多少钱。万全顺有些慌了，因为就在港客飞回香港之后，朋友为他巧立名目划来的那笔资金就从帐上划走了。这半年多他一分钱效益没有，倒把港客 500 万美元化掉了三分之一。

事到如今，别无选择，必须在港客到来之前做成几笔生意！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他动员起所有他能动员的人员，调动所有他能调动的力量，紧锣密鼓地抓房抓地，不论大小，连倒带炒，不惜手段，只要有赚就干。他自己也跟疯了似的开着汽车满京城跑。

## 垂死挣扎“炒”得凶

地处西直门内南侧有一处不该是废墟的废墟，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里面有些破旧不堪的建筑。这里原是一家皮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在商品竞争中输得惨败，长期靠吃贷款活着。随着改革的深入，贷款一停，这家企业就立马断了气，全厂几百名职工大都被“炒”回了家，紧接着就开始“炒”厂址。

消息传开，许多买家蜂拥而至。厂家报价 3.5 千万元，实际上厂内的总建筑面积不到 5000 平方米，而且是一堆破棚子和旧车间，每平米价格竟高达 7000 多元。再加上成交时要交付各种手续费和税金，在不装修的情况下，其价格超过了北京现有的任何高级公寓和写字楼，何况陈旧破败的房屋如不下大力量装修改造，根本无法做任何使用。

该厂负责人对络绎不绝的买主们，起初还热情接待做介绍，后来也“皮”了，索性说了，“自己去看吧，就这么一堆东西。价儿也摆在这儿了，看看值就买，没什么可商量的。”

你说他房子根本不值这么多钱，他说这儿的的地方好，在二环路以内。实际上，这片地方远离大街，在胡同里，不具有商业价值。

跟这个厂家一样，北京有许多倒闭企业把东山再起的希望寄托在炒卖房地产上。

朝阳区十里堡有个拥有 600 亩生产场区和 2000 多名职工的厂家，由于干部队伍腐败，经理管理不善等等原因，使企业连年亏损，让几家企业分块吞并了。许多职工回顾当年创业的情景，流着眼泪大骂后来这些干部是“败家子”；许多干部在职工的指责声中流下痛苦的眼泪。

但是他们并不急躁，不急于求成，将破烂摊子

朝那儿一摆，就如同钓鱼的架稳了“海杆”一般，耐心等待大鱼上钩。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太“黑”了点儿，但北京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众多，地皮房子如此紧张，还有那么多外地政府和企业想在北京设办事处，那么多外资企业正在寻求办公地点，就不信没有一个肯出高价的。

还有些卖家之所以把价格抬到令人接受不了的程度，其用意就是要把你吓跑，因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卖，可不卖又不行，这样做是给上边看的。不止一个倒闭企业当家人说过这样的话：“厂子开办这么些年了，换过多少任厂长，在经营上都不算景气，轮到我在任时把它卖了，那不成了罪人啦，我可不想挨这份骂。上边决定让卖，我不能不听，但是这么长时间没人买，总不能怪我不卖吧。”

但是再把话说回，土地是国家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只能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使用权，而无权出售和私自出让或转让。那种把破旧不堪的车间、厂房、库房价格高扬到几千元甚至近万元的做法，明摆着是在吃地皮，你的房屋建筑经过有关部门评估了吗？你说这里地方好，是按市政府颁布的基准地价来的吗？房地产既然做为商品推进市场，首先得体现出你的商品价值，还得在法制的轨道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座落在陶然亭公园有个濒临倒闭的厂家，乱七八糟加在一起，建筑面积不到 1 万平方米，出售价格 6.5 千万。“倒家”、“炒家”和买家去那里谈过的不计其数。卖家主事人虎死不倒架子，寻常人根本得不到接见，休看是个“败家子”，为人却“牛”得很。

有个“炒”得很凶的厂家经理近来叹着气说：“北京的地皮和房子这么紧缺，但要炒出油来也真不易。政策放宽了，空子却不好钻，办手续的关卡不好过。企业实际情况摆在这儿，你不这么炒一下怎么办？可照这么炒又真行不通。”

那么，一切究竟该怎么办呢？

## 五花八门的房地产咨询部

房地产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看重了，越来越被视为最能赚大钱的买卖。所以，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公司如雨后春笋，房地产咨询行当更是热火朝天，素来与房地产不沾边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也一哄而上，做起房地产买卖。

眼下人们常说，有背景的干开发，路子野的玩中介，有本事的搞公司，心眼多的练咨询。大凡有营业执照的，不管原来经营什么，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肯出点儿“血”，就能增加个房地产咨询项目，即令是烤白薯、卖冰葫芦的，只要工商局那儿有人，照样如此这

般。

有家从事旅游纪念品和化妆品经营的个体户，看出房地产咨询是个无本万利的好生意，于是请个“有用的人”帮忙，在一大堆兼营业务中增上这个项目。由于个体老板是位年轻女性，虽然容颜并不姣好，因打扮入时，倒也有些姿色，所以增项时连“正常”请客都免了。

实际上，她在没增加这个项目之前就已经玩起房地产，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手干。增加了房地产咨询项目之后，她立马大张旗鼓地干起来，兼营成了主业，而主业倒成了兼营。她根本不搞什么咨询，对房地产业务也根本不懂，所以直接切入中介。所谓的咨询即是她在某处有什么房，多少面积，什么价格，要想买的话，先写委托书，再签份协议，交了咨询费，方带你去看看房。至于咨询费应该怎么收，国家有何标准和规定，她一概不清楚。开口说个价，你要不能接受，她高兴时可以商量，不高兴时就告吹。有本事你自己去找吧，因为她并没告诉你实底，最多说个大概方位，而且这个方位还是根据你的购买意向得来的。究竟房在哪，只有鬼知道。你要不放心，她就要说了：“我这儿是‘单位’，还能骗你吗？先把钱压这儿，事情办不成，如数退给你！”

这是一家刚刚成立的房地产咨询，地处繁华闹市，生意非常兴隆。操作这个咨询部的是位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他请了两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小青年帮忙。两个小青年一男一女，男的负责接待，女的专管收钱。

与前面说过的个体户不同，小伙子不是搞兼营，而是专门玩房地产咨询的。更不相同的是他只管咨询，不管中介。不过，这位男士与那个女郎也有着根本相同之处——对房地产有关业务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房地产”这几个字都写不下来。但他的脑瓜并不傻，知道这玩艺儿能赚大钱，也清楚这个钱不大好挣，想一口吃个胖子不行，于是琢磨出个最实际，最行之有效的赚钱方法，先从收取咨询费入手。所谓咨询费，就是买房租房登记费。只要你交了登记费，想要什么地方和什么样的房子他都有，房子价格也保你满意。不过，这得需要点儿时间，他得再给你落实落实，回去等通知吧。至于等到什么时候，连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房子。

“黑”。在目前全北京市干这一行的当中，他这里是收费最高的一家。一般搞咨询的不愿挣这种小钱，没有房源时不收登记费，要收顶多不超过10元钱，只有买卖做成了，才索要事先讲妥的信息费或叫中介费。而他挣的正是这个钱，登记一次30元，

在京城创造了最高纪录。因为他根本就没想挣什么中介费。一次就拿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事儿，他认为是天方夜谭，要现实一点，不如这样“宰”得稳当，来得方便，“下刀”虽然狠点儿，人们倒能承受得住。

小伙子此前是“练服装”的，了解人们的消费心理。如今北京的房子太缺了，想买租房的人又太多了，为了能买到和租到房子，别说30块钱，即使再多也得花。对症下药，投其所好，正是经营之道。假如登记买房时不收费，他会以为你办事没谱儿，要是收钱少了，他会觉得有点儿玄，戏不大，不狠宰他不舒服。另外，新闻媒介的传播作用威力无穷，广告一登记出去，“傻帽们”就拿着那张报纸，成群结队地送钱来了。

他是这里的经理，不懂房地产业务，服务态度却挺不错，对“上帝”笑脸相迎。请来帮助收钱的那位时髦小姐可就不然了，描眉画眼往收款台前一坐，对交了30元登记费的顾客是一问三不知，而且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对那些不愿“出血”想咨询的人，那副面孔就更难以形容了。一天，有位从事房地产市场研究的中年专家偶过此处，刚一进门，小姐就问：“有什么事？”专家谦虚地笑着说，“向你们学习学习。”小姐把脸一沉：“先交学费！”

太好了，好在搞房地产咨询不要本钱，而且也不用通过什么资历审查和资格审查，长着脑袋不哑巴，干这一行就没问题。张胖子是个念过初中的文盲，今年不满四十岁，过去打架斗殴耍流氓，是拘留所的常客。爱人是他在10年前从大街上“拍婆子”弄来的，也斗大的字不识半升。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拉家带口了，人也就变得安分守己了。近些年，俩口子都没找到工作，长期在街头摆摊卖菜。今年春天，菜不大好进，也不怎么好卖，眼见房地产热火起来，也想做这不用花本赚大钱的买卖。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老百姓住房困难的事儿也体验最深，那些居住不方便的人想换换房子，也简直比登上太空还难。对，就干这个——张胖子跟老婆一合计，拿出1万元注册资金，成立起一家便民换房服务部，兼营项目是房地产中介和咨询，向顾客有偿提供信息。

服务部是夫妻店。俩口子都是经理，都理帐管财。他们认准这是好买卖，却没料到特别火，设在家里的服务部一开张，前来登记的人就踢破门坎。公家换房站登记一次不超过5块钱，在这儿登记要10元，开张几个月，每月都挣6、7千。这年头物价不断往上涨，人们已经习惯了，不管事情成不成，谁也不把10块钱当回事儿。

这两口子乐了，事情办成办不成是假的，先拿

上钱是真的，至于这几个月给人家换成几处房，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在搞换房登记的同时，房地产“咨询”业务也格外红火，一切如法炮制，手续费也是10元，当然也同样连一档子事儿没办成过。

俩口子常常感到遗憾，因为每为别人换成一处房，就能拿到200元中介费，每买成一处房，就至少拿上1万元信息费，成交额越大，拿到的钱就越多。那么，他们每月的收入就远不是7千元了。遗憾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房源。

## 杀气腾腾的“游击队”

傅某长得瘦小枯干，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除了在年轻漂亮的女人和上级领导面前，谁也看不见他的笑脸，去年，各类广告公司一哄而上，他也拉起一家广告公司，当上一人说了算的总经理。

他的公司够规模，搞得也算很气派，注册资金全是借来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是高薪聘请来的，号称年创利润上千万的垄断型企业。若想高收入，必须高投入。这话是他的口头禅。公司开业后，到处请客送礼拉关系，整天坐着汽车进出饭店去谈判，还不惜花大钱到南方沿海城市去招商……似乎事业非常红火，实际上折腾了将近一年连一项业务也没做成，白白赔了上百万。不说北京现在在上千家广告公司，找点儿活干相当困难，最关键的是他既不懂业务，也不懂经营，而且意气用事，任人唯亲。他的公司成立得挺快，垮台也更迅速，后来见房地产热火起来，索性也玩起这一行。

他没有资金搞“吞吐”，只能打着为客户做广告的幌子到处打听哪有房子和地皮，然后找个“下家”赚中介费。

听说靠北二环路旁有块4万平方米地皮，已经做到“三通一平”，而且还立了项，转让价格相当便宜。围绕北京二环路两侧，那可是搞开发建设炙手可热的地段。他很快就找到一家买主，按成交总额百分之三收取中介费，他这一笔就能干赚200万元。按照他的要求，买主写了委托书，下一步由他落实，负责带着委托方办理一切手续。为他提供信息的人说了：“地皮确实是有，你要想落实一下可以，不过得给我出具一份委托书，就算咱们两家合作，中间费用好商量。”他只得照办，否则人家不干。

合作者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业务部主任。为了保险起见，傅某和这个人签定了一份协议书，写明中介费各得一半。然后，那位合作者领他去找个人看地。那块地皮本来是在北二环路，合作者却领着他开车出了南三环，进了一家副食品加工厂的大门。

接待他们的是这厂的女供销科长，性格泼辣，50来岁。她说，厂子近两年很不景气，生产技术落后，

产品质量总出问题，被上级有关部门给停产了。但停产不能不吃饭，现在开展多种经营，于是也搞房地产业务，用来养活几百名职工。

“至于中间这笔费用怎么分，待会儿咱们再商量。走，带你们到现场看看去！”女科长和他们一道坐车进了城，到了长安街，吩咐司机拐了两次弯，进了一家大商场。傅经理开始还以为这女人临时有点私事要办，后来才知道，敢情他的信息是从商场信息部得到的。房地产现在也是一种商品，但凭怎么说也不该进入百货商场和副食加工厂。

商场信息部主任是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小姐，言谈举止透出精明，具有非凡的公关才能。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傅某没理由反驳，亦没力量拒绝。她说在她前边还有两家中介人，事成之后，这笔中介费大家平分，并说她能够控制卖方，到时候不会被买方甩掉。

6家中介人合作一笔生意，相互之间都存有戒心，怕被人给抄了后路。傅某早就动了这份心机，因为他能控制住买方，一旦让他接触到卖方，马上想办法将其他5家中介人甩掉。

傅某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周折才见到真正的卖主，在同买方签定了协议的前提下，让买卖双方见了面。为进一步防范双方一接触就把他甩了，还专门选在一家饭店见面，并严密监视双方的一举一动。监视的重点对象是买家，只要买卖一成交，当即兑现信息费。

然而，意料之中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双方见面后谈些有关那块地的事宜，买方说对方地价太高，早期开发也未达到有关标准，此事回去研究一下再定。交易尚未拍板成功，傅某的中介费就“八”字没有一撇。他紧盯着这宗交易不放，多次询问双方的进展情况，甚至还派人去盯梢监视。如此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没办成”。

事情没成的只是他，在那块地皮上却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他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杀气腾腾地向委托单位兴师问罪。他不能傻帽儿似让人白涮白玩。结果呢，非但没能把人家怎么样了，倒被对方弄得十分狼狈。人家的火气比他还大：“是谁不守信用？我们对这块地皮很感兴趣，商量好了正要签合同，却叫别人买走了。你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人？我们又是车又是人折腾这么长时间，经济损失谁承担？你！因为你是受委托人，你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

他怒气冲冲地找到卖方，人家两句话就把他噎回来：“你介绍的那个买主是瞎起哄，根本买不起这块地，我不卖给别人又怎么着！这块地晚一天出手，经济损失好几万，你负责赔偿吗？再有，到时候任务完不成，你能替我负责任吗？至于把地卖给谁了，你无权过问，……”



### 编者按：

唐义贞，烈士，陆定一同志前妻。1928年至1955年间，屡遭王明路线迫害、被开除团籍、党籍。牺牲时，尤为惨烈——国民党兵匪用刺刀划破她的胸膛……致使陆定一“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 我被光荣地开除了团籍和学籍

一艘从上海启航的苏联客轮正劈波斩浪，行驶在风光迷人的大海上。甲板上有一位18岁的少女，迎风伫立，心潮激荡……她就是唐义贞。

唐义贞出生在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武昌一带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哥哥唐义精在“五四”时期就与董必武、恽代英交往甚密。唐义贞很早就接受了革命

影响，192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董必武亲自领导下的革命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决定派唐义贞赴苏学习。临行前，她母亲病危。唐义贞含泪跪在母亲床前，深情地拜了三拜。然后，抹去泪水，毅然走出家门。

她离家后，先到了上海，在上海通过了入学考试，然后参加培训学习俄语和其它课程，紧张地为赴苏做好准备。1928年初，在组织的安排下，登上了赴

苏的轮船。

唐义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共产国际创办，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学校，起初为纪念孙中山的逝世起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党员）的学生。前后培养了1200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属国民党籍的学生退学回国，校名亦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说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生全



# 陆定一和 前妻唐义贞 的生离死别

□荒 坪

部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大开设的课程很多，有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还有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地理、列宁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以及军事学。功课自然十分紧张。

但是，中山大学的校园却逐渐失去了它的宁静，变得风波迭起。因为这时米夫担任了中大校长，把持着这所学校。米夫还兼

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他以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权威自居，并且是一位恶劣的苏联大国主义者，自居为“老子党”，把中国党和别国党都视为儿子，干涉别国的内政，培植宗派集团夺取该国党的领导权。在米夫看来，中国革命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靠他和他培植的宗派集团的领导方能胜利。在中大，米夫起用中国的王明及其同伙，组成学校的支部局，自称“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

克”，抛出了一套“左”得出奇的理论，并且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以亲疏、好恶为标准，能讨他们欢心的就提拔重用，否则就诬陷、打击、打棍子，戴帽子。王明他们有米夫作后台，有恃无恐。不少同学（包括唐义贞）看不惯他们的恶劣作风，起来批判支部局的错误。为了对这些学生打击报复，王明一伙便捏造说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江浙同乡会”和“工人反对派”等

组织，执行着与支部局，共产国际相对立的“第二条路线”，并决定开除 12 名学生的党籍，团籍，还逮捕了几名学生。这次事件更激起了中大学生的义愤，于是中国学生立即上书联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唐义贞还经常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反映中大的真实情况和同学们的要求，在这里，她认识了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国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陆定一在来莫斯科之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的主编。

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本来就同米夫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中大风波中，中共代表团同米夫、王明一伙的斗争便公开化和激烈化了。但在米夫的把持下，中共代表团却无权过问这所培养中国学生的学校的事情，反而成了米夫和王明要打倒的对象。

陆定一从唐义贞的汇报中了解了中大事件的真相，对王明一伙蓄意捏造和陷害不同意见的人的恶劣作法也极其愤慨。他还从米夫和王明的一系列言行中，觉察到了他们篡党守权的企图。当唐义贞在交谈中对王明一伙的所为表示愤慨、同时也感到困惑时，陆定一对她说：“我谈谈我的一点体会，当初我参加革命，认为只是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做斗争，单纯得很，当时是以瞿秋白同志为首，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四·一二’，‘五·一七’，这血淋淋的恶果，就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呀！现在，这些人却提出一套‘左’得出奇的理论”。“还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想干什么，不就清楚了……”他们之间的这种

交流，使唐义贞很受启发，她的头脑更加清醒了。

中山大学也掀起了更大的风浪。王明一伙搞了个大阴谋，即“十天大会”。他们把中大学生集中起来开十天大会，要瞿秋白参加，目的是在会上斗争瞿秋白，瞿秋白未予理睬。会上学生对学校提了意见，大家恨王明，对支部局的意见提得特别多。600 多学生，只有 29 个人赞成支部局。这就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中 1 人因为年纪小，不到 16 岁，所以是半个。）

“十天大会”完毕，中大就开始清党，搞停课运动。王明集团在学生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不同意见的学生加上“反对支部局”的帽子，有的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有的流放，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中大校园弥漫着更加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但唐义贞毫不畏惧，仍然多次在会上站出来勇敢地发言，与王明集团进行面对面公开的斗争。有一次斗争会上，她慷慨陈辞后愤然退场，以示对王明集团的恶劣行为的愤慨和抗议。

在同王明集团的斗争中，唐义贞与陆定一有着共同的立场，共同的态度，他们由相识到相知，建立了感情。1929 年 12 月，他们在莫斯科举行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是请了几个同学来聚餐，还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中国菜。

就在他俩婚后不久，中大支部局做出决定，开除唐义贞的团籍和学籍，“罪名”是“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就是“反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明集团这一决定，不但是要打击唐义贞，而且矛头也是对着陆定一和中共代表团的，他们还诬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托派的支持者，王明也曾造谣说陆定一与托派有联系，等等。

唐义贞外表秀丽，文静，但意志却十分坚定，她在遭受打击后无悔无憾，曾淡然一笑地告诉一位即将回国的女友说：“我被光荣地开除了团籍和学籍。”学校当局问她：“你回国后还革命不革命？”唐义贞的回答是：“还要革命！”于是她被送到一个“医务训练班”进行短期训练，规定回国后到苏区做医务工作。

1930 年初夏，中国代表团全体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是唐义贞同陆定一婚后第一次分别，为了保守秘密，唐义贞没有前往送行，只是与陆定一约好在上海见面的办法。

唐义贞于 1930 年 9 月底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10 月回国，来到上海。陆定一派人把她接到他在同孚路的住地，他们重新相见。陆定一回国后担任了出国前原来的职务：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向团中央反映了唐义贞在莫斯科被开除团籍的缘由，并提出恢复她团籍的要求。他指出，所谓“反对支部局”并无政治内容，构不成“反党”的罪名，开除团籍毫无根据和理由，也不符合团的章程。团中央因而作出决定，恢复了唐义贞的团籍。

唐义贞在上海的小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所度过的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有欢乐，但又十分单调。秘密工作的环境下，非不得已是不出门的，甚至也不出去散步。这对活泼好动的唐义贞来说，很不习惯，但她忍了下来。

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们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

唐义贞在这期间也曾想回家去看望她思念的母亲，但由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不能回去，为此她十分难过，但她克制了下来，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母亲她已经结婚了的消息。这封信被保存至今，下面抄录其中的

一段：

“我已经结婚了，他姓陆，无锡人，性格很似大哥，不过加上些孩子气，只知做事业，不知其它。脏也同大哥相仿，不叫他洗脚他就不洗脚。荷包乱七八糟的塞了一大包，写的东西总是杂乱地堆满一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别人都笑我，说我做过了，我也不否认。妈妈，这样顽皮的脏孩子你老乐意吗？我叫他写信给你老，他说不知如何写好，只知坐在那里傻笑。你老来信可骂他这个不知事的小子。”

因为秘密工作的缘故，她在信中只能说丈夫的姓，不能说他的名，也不能写通讯处，因此也不能希望收到她母亲的回信。

但这种“家居”生活并不是安定的。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而带他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那位同志又来了，把周恩来同志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必须转移，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的住地避一避。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而感到高兴。

### 我到苏区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战斗！

唐义贞住了一阵后，就耐不住了，提出要到苏区去工作。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她便第二次与陆定一分别，同何叔衡装扮成父女俩，从上海出发，经过汕头——大埔的秘密交通线，爬山涉水，进入闽西苏区，来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的所在地永定虎

岗。然后，何叔衡继续前往瑞金，唐义贞则留在闽西苏维埃从事宣传和医务工作。从秘密工作的环境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红色根据地斗争生活，就象鱼儿跃游于大海，鸟儿翱翔于蓝天，唐义贞觉得自己有了使不完的劲，她说：“我到苏区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锻炼，更好地参加战斗。”

繁忙中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意外地，唐义贞与陆定一在虎岗重逢。原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集团篡夺了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权，陆定一被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的职务，罪名是“调和路线”。1931年3月，他离开上海来到苏区，身份是团中央巡视员。陆定一当初并不知道唐义贞到哪个苏区去了，这意外的相会，两人十分惊喜。这是他们婚后第二次别后相聚。

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敌人接近虎岗时，陆定一与唐义贞随闽西苏维埃向西边深山转移，到了长汀的四都，第三次“围剿”被我红军在江西、福建粉碎。闽西苏维埃进驻长汀。江西、福建两个苏区打通后，变为“中央苏区”。1931年11月，陆定一与唐义贞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陆定一担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和《青年实话》的主编。他们住在瑞金叶坪的一个大祠堂旁边，这个大祠堂。1932年是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址。1932年12月30日，唐义贞在这里分娩，生下一女孩，取名“叶坪”。

唐义贞在苏区瑞金与邓颖超关系亲密，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她很崇敬邓颖超，邓颖超也非常喜欢正直热情的她，并认她做干女儿，她称邓颖超为“爱妈妈”。叶坪出生后，“爱妈妈”特来贺喜，抱着孩子高兴地说：“干女儿生千金，我当外婆喽！”并以外

婆的身份给叶坪起了个亲昵的名字：爱生。当妈妈的便让孩子称邓颖超为“爱外婆”。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委直接指挥师，并把原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原属各科改称局，其中之一是药材局，专门负责药材的生产和供应，唐义贞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总卫生部为了解决药品奇缺的问题，决定创办卫生材料厂，并由药材局担负建厂工作，唐义贞亲自兼任卫生材料厂厂长。

卫生材料厂在瑞金的宋坊镇创办起来，职工一百多人，不久，厂址又迁至胜利县平宇区琵琶龙乡（现江西省于都县银坑乡境内的平安寨）。平安寨原是地主的必经之地，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为了打通这条苏区腹地的交通要道，红军与地方武装攻破了这个土围子，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巩固的根据地。由于这里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药材资源，卫生材料厂便搬迁到这里。平安寨离瑞金八十余里，唐义贞生孩子不久，便带着孩子走马上任，从此，她与陆定一很少见面了。

在当时条件下，办厂所面临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药品、食盐、布、棉等物资封锁最严，苏区人民吃的是自己熬的硝盐，红军部队药品奇缺，连纱布，消毒棉花都没有，当时部队卫生员手里几乎只有一种药品——升汞，连碘酒、奎宁、治痢疾用的常用西药都很难见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靠自力更生来解决。

在唐义贞的带领下，这个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厂子终于发展成为5个车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制药车间，利用中草药按西药型制成药品；敷

料车间，可以生产医用纱布，脱脂棉和急救包等；酒精车间，利用蒸馏烧酒的方法制造酒精；水剂车间，生产急救水，龙胆酊，碘酒等；器材车间，能制造手术刀，镊子，钳子等器械。这样，使得在药材品种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前线的需要。1934年，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到长征开始时，主要依靠这个厂子的产品，给部队配足了三个月的药材用量。卫生材料厂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表扬和称赞，唐义贞也在此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陆定一定会回来，你死了那份心吧！

在这期间的一个日子里，唐义贞突然接到陆定一从长汀寄来的一封信，陆定一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指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寄出这封信后，他已立即单独上路了。

唐义贞将信读了好几遍，然后将信默默地收起，她知道定一是冤屈的。她早在前几期的《青年实话》中就看到好几篇批判陆定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只不过是他在形势问题上与“左”倾路线所认为的反动阵线是铁板一块的观点相异。他们还深挖他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说他早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时就领导的联共反国际的小组织，等等。这说明王明集团还在算老帐，对不同意见者施以报复打击。所以唐义贞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遥祝亲人一路平安。

不久，卫生材料厂搬回到瑞金县城郊区。她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但对此除了愤慨，她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她却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女性。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由卫兵押着从批判处回禁闭室的邓小平，此时邓小平被指控为“罗明路线”的追随者和“富农路线”的执行者，正在遭受审查和批斗，人也变得瘦弱憔悴。唐义贞关心他，同情他，便拦住他询问他的境况，邓小平对她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唐义贞听了，十分难过和心酸，之后她立即用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并亲手做好，然后捎信给卫兵，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一顿吃完了一只鸡，剩下的一只她又让他带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

1933年3月的一天，一阵由远而近的“得得得”的马蹄声叩响在进厂的石子路上——一位大人物突然下到厂子里“视察”来了。

这位“大人物”骑着高头大马，跟着许多护卫。他是王明集团的要员，从苏联回国后春风得意，青云直上，身居显要。

他来干什么，真的是视察吗？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找唐义贞“谈话”的，开口就说：“陆定一逃跑了！上海团中央机关最近遭破坏，他已逃跑回家。党和团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和党籍。”怕唐义贞不信，他又从兜里掏出一本新的《青年实话》，“看吧，千真万确，登了报了，全国都知道了！”

唐义贞果然看到，在这份苏区团中央局的机关刊物上，刊登有一则“开除团籍的决定”。“决定”中说：根据上海来电，在这次大破坏期间，陆定一“未得到组织允许，自动逃回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惶失措与惊慌，党和团中央

决定开除他的团籍和党籍。”唐义贞将这则“决定”反复看了几遍。但她目光沉着，神态如常，开口平静地说：“我不相信陆定一会逃跑回家。”

“你，你不相信？”大人物感到吃惊，随后变得气急，“他当逃兵，可不是我编出来的。团中央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稍稍停顿，他又说：“陆定一是不回来了，你不要白等了……你嫁给我吧！”

唐义贞听后，投去厌恶的目光，不加思索地说：“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你死了那份心吧，我坚决等他。我相信他，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即使不能走，他爬也会爬回来的，我相信他！”说完，她转身就走了，留下大人物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事实证明唐义贞的判断是何等正确。在上海那次大破坏中，陆定一得以脱险，几经周折，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并由地下交通带到赣东北苏区，然后于1933年4月间，回到瑞金，与唐义贞第三次别后重逢。他向中央上诉：“我没有逃跑回家，不应开除团籍。”那则决定也捏造事实，其实苏区党中央局根本没有做出过所谓“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为此，在董必武同志的主持下，党中央局特意发表“并未做过开除陆定一党籍的决定”的声明一并为这桩错案平了反。原来那则决定是根据何凯丰的报告所写，何凯丰因此受到警告处分。

“我应该怎样称呼义贞呢？”陆定一晚年回忆起这一段历史时，感动地说，“应该称她‘知己’！我们一年不能通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逃跑回家，开除党籍团籍’，是党团的决议（决议呀），赫然登在报上，你不相信岂不‘反党’？而你竟敢不怕‘反党’，不怕由此而来的‘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不是深知我心，你敢这样么？曾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义贞就是我的知己，我一世忘不了这样的知己。”

## 告诉孩子： 我是为革命而死

第五次反“围剿”，仗打了近一年，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结果屡遭失败，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唐义贞骑马来到了沙洲坝，叩响了一家农家小屋的门。她这时已第二次怀孕，接近分娩。她是来跟陆定一告别的。原来，陆定一的团籍恢复后，但却没有安排什么职务，只是由博古分派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当“技术编辑”。当长征的决策秘密地做出并紧张地部署着的时候，他却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唐义贞的突然到来感到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平时总是他利用星期天去她厂子看望她和女儿叶坪的。

唐义贞把他从屋子里叫到外面说话，她告诉他，她是前来告别的，厂里已接到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命令，并开了动员会，决定了哪些人跟大部队走，哪些人留下。因她怀孕在身，行动不便，不能与大部队同行，已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直到这时，陆定一才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并且知道他与她又要分离了。他的心倏然变得沉重。他想到，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军队必定要扫荡清乡，血洗根据地，地主会回来组织武装，党内也难保不出现叛徒，留下来的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况且她很快就要分娩，在哪里分娩？生下的孩子怎么办？还有未满三岁的女儿叶坪也无法带在身

边了，该如何安置？……他声音沙哑地对她说：“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

“不用为我担心，留下的还有一批女同志哩；有困难大家都会互相帮忙的。这里的群众很可靠，我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好。我已想好了抚养女儿叶坪的办法。怀着的孩子出生后，我也会安置妥当，你就安心随部队去吧。”

她说完这些，又要匆匆赶回厂里去。他想留她吃顿晚饭，但她没有时间，大转移之际，厂里有大量的事情等待她去处理。

他扶她上了马背，但抓住缰绳的手却久久没有松开。她与他相对凝眸，千言万语在心头涌动……啊，这一别，还能有重逢之时吗？

她最后留给他的依然是沉着平静的神态，她把一切危险和困难都担当起来了，不想让亲人为她担忧。道一声“珍重”，她挥起了马鞭……

这是他们婚后五年中的第四次离别，第二天夜里，陆定一便随部队开拔。他肩扛一根梭标，踏上了漫漫征途。“挥手自兹去”，他们的这一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唐义贞将三岁的女儿叶坪交给本厂的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县境外的乡村找可靠人家寄养。张德万是江西吉安县人，因病未能参加长征，被批准返乡。他热心，正直，靠得住，平时经常帮助唐义贞照看孩子，对叶坪非常好。所以唐义贞将女儿托他寄养。临行前，唐义贞将旧衣裳拆了，连夜为女儿赶制出几件可在不同年龄阶段穿用的小棉衣。骨肉分离的时刻来临，唐义贞柔肠寸断，望着张德万背着孩子远去的身影，禁不住泪如泉涌。片刻后，却又咬紧嘴唇，擦干泪水，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起初，她被安排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中央办事处工作。不久，把持苏区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当权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又无辜开除了她的党籍。她含冤忍辱，继续默默地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11月初，她随同派往闽西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的毛泽潭、贺怡夫妇以及周月林、王淑振等，从瑞金转移到长汀，一起在福建省委工作。当时福建省委的大部分机关设在东街，唐义贞被分派在少共省委宣传部指导工作，少共省委领导同志嘱咐该部的宣传干事陈六嫖：“这位同志是中央派来我们这里领导工作的，她的身子有困难，你要好好照顾她。”

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来越小，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由于福建省委领导人对形势判断的错误，致使有限的革命力量在敌人疯狂的“围剿”面前，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根据地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少。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只好实行精简。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唐义贞拖着笨重的身子，投入到抢救红军伤病员的工作中，以忘我的精神坚持斗争。

即使这样，她仍然经常遭到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的歧视，怀疑和打击。有一次铲共团在机关驻地附近杀死了一位红军伤员，领导未做认真的调查，便咬定是毛泽潭、贺怡和唐义贞勾通铲共团杀害的。把他们三人逮捕起来，并且上了绑，准备枪毙了。后来发现是别人勾通的，才把他们三人释放了，但唐义贞的党籍却依然没有恢复。

由于敌人的进攻，机关不得已退出长汀，疏散转移，来到四都的丛山峻岭之中。一次，唐义贞、贺怡、王淑振等5位女同志碰在了一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

形势面前，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互相郑重约定，如果谁能活着，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要代传口信。唐义贞对其他四位说：“将来你们谁能见到陆定一，请对他转告我的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

贺怡等人听了这番话，为她虽然忍冤含辱，却对党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崇高品质而感动地流下泪水。

当机关到并轱岑的时候，因唐义贞即将临盆，在组织的安排下，她由邓子恢的母亲杨老太太陪同，来到了田都圭回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汀西县保卫局区队长，残废红军范其标，聪秀妹夫妇家中。但组织上对她很苛刻，只给了她四个月的粮票和二元钱。来到圭田村的第二天，11月20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因念及丈夫，便取名“小定”。为了保存体力，便于产后参加战斗，她忍痛不给刚出生的孩子喂奶，只喂米汤。产后第四天，便商定将小定送给范其标和聪秀妹夫妇抚养。她把自己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送给范其标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对范其标夫妇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便于联系。如果我未能再来，就说明我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在这段日子里，她也十分挂念不知漂泊在何方的女儿叶坪，常常含泪念叨说：“坪坪不知怎么样了……我也舍不得坪坪呀！”范其标，聪秀妹于是知道，在这之前，她的心灵早就经受过骨肉离散的创痛。

生孩后不到满月，国民党三十六师向四都圭田逼近，福建省

委通知她迅速归队。她毅然含泪告别还未满月的小定，告别范其标，聪秀妹和众乡亲，在圭田乡苏维埃两位干部的护送下，回到福建省军区所在地琉璃坑。

## 死也要死在红旗下，决不做投降鬼！

唐义贞回到省军区后，担任了省军区宣传部长，随部队在谢坊，琉璃、姜畲坑一带坚持游击战。

1935年1月中旬，长汀四都一带的大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红军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摆脱困境，唐义贞、毛泽潭、贺怡等随省军区突击游击队向江西方向行动，准备寻找陈毅率领的红军队伍。突击游击队一共有二百多人，也称独立营，营长和政委都姓胡。该月下旬，部队通过小金村附近的乌蛟塘大山时，不知谁毁坏了峭壁上的一座小木桥，认为这样可以切断追兵的来路，殊不知反而暴露了部队的走向。敌三十六师宋希濂部便迅速包抄过来，包围圈越缩越小了。气焰嚣张的敌军到处乱放枪，到处喊投降。

27日中午，部队在山上的一個撩子里稍作休憩，草草吃了点东西。唐义贞预感到情况危急，她收拾着行李，见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嫖穿得单薄，便将一件无补贴，暗纽扣的结黄色丝棉袄送给她，又从行李中翻出一大一小两个银镯，对她说：“这一次我不知能不能脱险，你是本地人，可能逃得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做纪念。日后若有人来问你，你就告诉他，我丈夫姓陆，叫陆定一，他对我十分好，这辈子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他。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了一个儿子叫小定，很象他的爸爸，一生下来我就将他送给了圭田乡苏

维埃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我若能生存，将来母子当会相认，那时我儿既是范家人，亦是陆家人，我们两家都有份。我若牺牲了，那就希望我的丈夫，儿子，女儿将来都知道我是为革命牺牲的。”陈六嫖激动地接过银镯说：“你放心，范其标，聪秀妹都是好人，我认识他们，聪秀妹是我的堂姐，我们叫她‘聪子’，跟我姐姐很要好，她没有出嫁时，我跟她就住在上下屋里。”唐义贞听了很高兴，但陈六嫖望着消瘦不堪的她，心里就感到酸痛：唐大姐在生孩子以前是又白又胖，脸圆圆的，可现在却瘦成了一条筋，脸也变成长的了。她做完月子，头上手帕也不包，整天随部队东奔西走，吃不好，睡不安定，风餐露宿，今天在撩子上躺，明天在山沟里蹲，再强壮的人也吃不消呀，何况她刚生了孩子……陈六嫖克制不住自己，扑进她的怀里，流着泪说：“唐姐姐，苦了你了……我们这一次，怕是九死一生呀！”唐义贞也涌出了泪水，但她却坚定地说：“是的，冲不出去，就难免一死，但我们死也要死在红旗下，决不做投降鬼！”说完，唐义贞背起文件袋和背包跟胡营长，胡政委和战士们进乌蛟塘山坑里去了。

下午，独立营与敌军在乌蛟塘山坑发生了一场激战，敌我伤亡很大，我军死伤和被捕80人左右。陈六嫖留下烧火做饭时，也被敌人抓去。

部队被打散了。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唐义贞和战士们与敌人又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坚持到傍晚，终因寡不敌众，唐义贞，黄玉英（福建省委妇女部长），胡政委和胡营长等二十多人被捕，被押出山坑。唐义贞双手被反绑着，浑身是伤，额上被敌兵用枪托打得鲜血直流，衣服也撕破了。



他们被关在四都下赖坝敌三十六师的一个团部。唐义贞，胡政委和胡营长经敌人搜身被认定为红军干部，当做要犯与其他人分开关押在一栋房子里。唐义贞关在前厢房胡政委与胡营长关在后厢房，当时看守不是很严格，他们在屋子里可以走动，打水洗脸等。陈六嫖被捕后，因是本地人，会劳动，被敌人押去给犯人做饭送饭，后又经她的哥哥陈柏生（伪乡民代表）借口说她是到山上拾柴的村姑而保释。陈六嫖当晚说通看守，给唐义贞三人送过一次饭。

深夜，趁看守松懈，唐义贞和胡政委，胡营长越狱逃出敌巢，拂晓时被敌人发现，敌出动大批匪军跟踪追捕。唐义贞三人与敌人周旋了一天一晚，30日傍晚，不幸在汤屋附近的深山凹里又被敌人抓捕。这回就不同上次了，敌人气急败坏，把他们的双手死死捆紧，手的颜色变得紫乌，押回下赖坝后立即关起来；不让人看，不让人近身。

敌人开始了对唐义贞的审讯，强逼她交出文件袋，供出其他同志的下落。唐义贞怒目而视，拒不回答，恼羞成怒的匪军便对她施以酷刑，皮鞭与枪托雨点般落在唐义贞身上，抽碎的衣裳渗出一片片殷红的血渍。两天两晚没有进食，越狱的奔波，唐义贞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又惨遭严刑毒打，唐义贞昏死了过去，但始终未吐一个字。

31日清晨，唐义贞苏醒过来，发现敌人已经给她松了绑。她忍着全身的剧痛，艰难地爬起身，趁机将藏在身上的一份机密文件揉成团，塞进嘴里，嚼碎后强咽下肚。敌人发觉了，匪首气红了眼，声嘶力竭却又无可奈何地喊道：“上绑，把他们拉出去处决！”

残暴的匪兵虎狼般扑了过

去，五花大绑将唐义贞和胡政委、胡营长捆起来。他们把绳索拉得死紧，边绑边踢。然后将他们三人押向下赖坝村的河滩上。沿途和河滩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如临大敌，不准村民靠近。匪兵气势汹汹，一路上对他们咒骂不已，拳打脚踢。

严冬的山谷，朔风凛冽，寒气刺骨，唐义贞迎风走在头里，她遍体鳞伤，血渍斑斑，衣衫褴褛，步履踉跄，一头短发和被撕破的衣片在寒风中飘飞。她忍着周身的剧痛，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朝河滩走去。最后的时刻到了，她的神情坚定，大义凛然。她微微地昂着头，目光投向茫茫苍苍的远方……此刻，她想的是什么呢？

——是在深情地回顾自己所度过的战斗生涯，骄傲自己正履行着神圣，崇高的誓言？

——或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思念起了远方的骨肉亲人，正在心里默默地与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她心中是否有一份遗憾：她的党籍还没有恢复，她再也不能继续为党为革命工作、战斗了……

他们来到了三棵粟树下。

罪恶的枪声响了。

唐义贞，胡政委和胡营长的身躯倒了下去。

唐义贞中弹后却没有死去，剧痛使她那捆绑着的身躯在地上翻滚，她满嘴是土，牙齿咬着沙石咯咯地响。

锋利的刺刀划破了她的肌肤……赤热的鲜血喷溅而出……刀尖挑出了一颗红彤彤的心……

## 后记

1943年，贺怡从江西来到延安，见到了唐义贞烈士的爱人，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

一同志。贺怡告诉他唐义贞英勇就义的消息，并转达了唐义贞要转告给他的口信。

“最坏的事情发生了。”陆定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境，写道：“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他还写道：“唐义贞烈士壮烈就义，是可歌可泣的。她受尽了王明集团的打击和残酷对待，能够这样实践革命到底的诺言。更为可敬……她是革命的英雄。她是我的模范，我对她永远景仰。”

半个世纪后，陆定一分别在1980年、1987年寻找到了他与唐义贞烈士所生的，离散了的两个儿女：儿子小定和女儿叶坪。

唐义贞烈士的崇高品格，激励着千千万万人。

为了纪念唐义贞烈士，在她牺牲之地下赖坝村的一所小学，被命名为“义贞小学”，1985年，长汀县政府为唐义贞立墓，在汀州西门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一侧的一个山坡上，修建了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陆定一亲笔题了碑文：

“唐义贞烈士、湖北武昌人，女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屡遭王明路线的迫害而不屈。曾任中央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厂长。1935年一月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于长汀四都下赖坝。距生于一九〇九年，才二十五岁，她实现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唐义贞烈士是我的最亲爱的亲人，是我的知己。我永远怀念她，学习她，也教子孙这样做。”

在纪念烈士的悼文中，陆定一称赞道：唐义贞烈士的心是金铸成的。

唐义贞烈士的灵魂，是水晶刻成的。

# 作曲家付林 谈歌星素质

□李南友

作曲家付林与一些歌星合影



付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喜欢吃零食，有这个就行。”他向我指了指右手指中的香烟，“有八把7个音符说成是豆芽菜，而我的生命是与7个音符联在一起的。我的语言就是7个音符。同样，我所走过的道路，也象这7个音符的旋律线那样起伏不平。旋律线有高低之分，节奏有快慢、强弱之别，旋律线与节奏是音乐的两大音素，作为一个歌曲文艺工作者，生活



的节奏、歌曲的节奏，应该与时代的节奏相符。7个音符的节奏、旋律是自己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从跳动的心房中涌现出来的。我时刻在想，音乐旋律应具有民族的特点，音乐的节奏应具有时代的特点。我们创作的歌曲，应同时代的脉搏相一致，是激发人们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只有这样，我们创作的歌曲，才能为当代的中国青年所接受、所喜爱。”

近20年中，词曲作家付林谱写了不少优美动听的歌曲：象《祝愿歌》、《妈妈的吻》、《故乡情》、《童年小摇车》……还有器乐代表作《牛郎织女》、《梁山泊与祝英台》，为电视剧、电影《第八个琴键》、《强盗的女儿》、《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追寻》、《托着太阳升起的人》……其中，《太阳有七色》还获得了第15届保加利亚艺术节的创作奖。他举办过多次付林作品专场演出。他已经出版了《付林通俗歌曲100首作品集》，还录制了各种各样的歌曲磁带……

付林说：“80年代在改革的浪潮中迎来文艺的如花似锦的春天。从和朱逢博、李谷一的合作，从和王洁实、谢莉斯、吴国松的合作，从和程琳、段品章、朱晓琳、赵莉、朱明瑛、苏小明的合作，从和许多青年歌手们的交往当中，总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和吸引力，使我不能因客观条件不利而停笔。我不断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改变自己，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尽量适应演员与听众的需要！尤其是和程琳的合作，使我走上了一条我过去没有走过的路。这是一条开满鲜花而又布满荆棘的小路。从此我注重针对歌星的演唱特点来写歌，也注重辅导一些刚刚起步的歌星，帮助他们按作品的内容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使纸上的无声作品插上飞翔的有声翅膀，我付出得多，也就要回收，在创作上，输出输入常常是不平衡的。我只有不断地输入，因为我欠社会欠人民的太多太重。在坎坷中，我是顺利的幸运儿；在顺利中，我又是坎坷的‘逆子’，所以我要写爱与恨、苦与甜、悲与乐、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

在付林的书桌上，至今还贴着一张1982年6月份开始，程琳使用过的课程表。当时程琳只有14岁。

想起程琳的当年，付林总是有无限的感慨，有几年时间，他与程琳几乎朝夕相处，他看着程琳成长，从默默无闻到闻名全国。

他想起程琳最初来到海政文工团时的情景，当时她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双活泼可爱的大眼睛，坐在凳子上，两脚碰不到地上，她活泼可爱，看见谁都十分热情，团里的叔叔、阿姨们都喜欢她。她虽是一名二胡手，却喜欢唱歌。任何一首歌，她一学就会，而且唱得很动人。

为了程琳登上歌坛，为了程琳的成长，付林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付林的夫人石秀娟常说：“你对程琳的关心超过了对咱们自己的孩子。”是的，付林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在她所见过的孩子中，这是音乐素质比较难得的一个。程琳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乐队，他无疑应该竭尽全力照顾她。

1981年，付林与任一平合作，专门为程琳谱写了一首以部队生活为题材的歌曲：《爸爸巡逻去西沙》，又为她准备了《小螺号》、《草帽歌》等中外歌曲。石秀娟与团里其他阿姨为小程琳缝制了一套小海军服，11月，程琳第一次登上了首都的舞台。当付林听到程琳唱出“天边升起了七彩霞……”，台下掌声雷动时，比程琳自己还激动。

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有时则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程琳，这个只有10多岁的孩子，从一开始就面临了重重考验。程琳在歌坛上沉浮，付林也跟着她一起沉浮。

在程琳沉浮的日子里，付林一再告诫程琳，最要紧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文化水平。石秀娟经常在家弹琴，陪程琳演唱。付林仍然经常为程琳作词作曲，让她试唱，付林还为她规定了种种课程，让她天天背诵唐诗宋词。唐诗的铿锵有力，宋词的委婉深情，都熔进于程琳的歌声中。

在程琳几沉几浮，困难重重的时候，是付林带着她到处奔波、呼吁。1983年5月22日，付林带着程琳到海军杨副司令员家。杨副司令员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批示说：“只要是多才多艺的幼苗，应加紧培养，对有才有艺的不用，是封建不敢创新的表现。”

1983年4、5月份，程琳来到哈尔滨，这是她第二次复出的首场演出。观众达四、五千人之多。那次，付林急需回京。临行时，他说：“程琳唱歌时很动感情，对感情体会得很好。”但在日常生活中，程琳很少动感情，很少见到她掉眼泪。可是这一次，程琳听说付林急着要回去，她眼眶中转动着泪水。她希望付林老师看到她演出，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之复出意味着什么？而为了让她复出，付林老师又付出了多少精力。

程琳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消息传来，付林的泪水夺眶而出了。

但是，付林没有想到，出名、成熟后的程琳，开始由于在一些事情上产生误会，同他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有一次，付林不慎丢失了程琳托他保存的李苦禅大师的一幅画，他们的关系由此到了难以挽回的程度。程琳每次见到付林时，有时只勉强低一下头，难得有一句话，作为曾经竭尽全力辅导过她的老师，心里怎么能不感到悲哀？……付林说，当然在程琳问题

上我也有缺点，不能都怪她。

付林与程琳的合作，给付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来，付林是一位词曲作家，又是一位乐器能手，可是因为程琳的成功，社会上不少有志于唱通俗歌曲的青少年，他们以为程琳的成功，有赖于付林的辅导，于是他们也都想拜师。一时间，象不少青少年看了武打电影《少林寺》之后，离家出走，盲目地跑到嵩山少林寺一样，付林也碰到了这种情况。多少个天真烂漫的青少年背着小包袱，从偏远的山村找到了海政大院，找到了他们崇拜的付林老师。更多的人来说：

“您是我仰慕已久的歌曲作家，从报纸上看到，您是程琳、朱明瑛等歌星的老师，我也想拜您为师，学习唱歌。我是多么地热爱唱歌这门艺术啊！虽然我平时也时常看一些关于演唱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但是由于没有老师的辅导和指点，终究没有多大的长进。付林老师，求求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我想，我只比程琳、朱晓琳她们小上一两岁，但她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呢？……老师，收下我吧！收下我吧！虽然，我的家乡离北京那么遥远。……”

一位内蒙古的小姑娘给付林写信说：“人人都有希望与理想，我迷恋于唱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理想，我想您知道当一个人的理想实现不了时，是多么痛苦，我求求您，您就叫我到您那里去学习吧！我相信程琳姐姐也会帮助我的……”

有一位贵州的孩子来信说：“您在信中说，由于我们相隔天涯路，鞭长莫及，通信解决不了问题，不肯收下我这个学生，而叫我在本地找一个老师帮助我。但是，在这个小镇上，要找一个懂音乐知识的老师，好比是大海里捞针……”

还有这样一封来信：“十岁那年，我就十分喜爱音乐，就叫我父母寻找老师，可是都遭到拒绝。我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我并不死心。就让奶奶去找，奶奶出门，一去就是九年，不知流落何方？都是因为我，才让奶奶下落不明，这几年我整天的茶不思，饭不想，痛苦折磨着我，……我前后到过上海、天津都没有找到您，又听说您在北京工作，又怕找不到您，就写这封信，您看了我不幸的生活一定会同情的吧，您能收下我这个学生吗，叔叔，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

象这样的来信，每个月收到总有一二百封，而对这一封封，一叠叠的来信，付林似乎看到了一双双稚气、天真、乞求的眼睛，中国这么大，然而连一所培养辅导、学习通俗歌曲的学校也没有，爱唱、爱听通俗歌曲的人这么多，然而能辅导并热心辅导这些人的人却又少得可怜！

付林说，在这大批的通俗歌曲小歌星、爱好者

中，确实有不少很有前途，很有理想，很可造就的未来的好歌星，同样，也不乏不想吃苦，不想脚踏实地，只想靠机遇取得名誉地位、金钱的人。有几个歌星干脆直截了当地对付林说：“我就是想出名，要名誉、要地位、要发财，一个人，为人一世，不为这个为什么呢！不这样，就活得窝囊，活得不潇洒！”

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造就的前途，“我也不值得为这种人费太多的精力”，他们的素质并不好，既没有音乐素质，道德素质，也没有文化素质，有的把问题也过于想得简单化！

他们哪里知道，一位副师级的音乐工作者，一家三口人至今住着两间小屋，一度连一张完整的搞创作的桌子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常常需要等女儿做完了作业，让出地方，退出去，上了床，这才轮到他，一个人在灯光下静静地想，进入创作的世界！许多旋律优美的歌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

面对这些还不太懂得生活，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对客观世界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背着小背包闯进进来的青少年，付林怎么能拒之门外？而这些人，有的还要求付林解决住，解决吃的问题，付林感到自己的负荷太重了！

付林说，在这些人中，后来确实出了一些人才，有的成了小有名气的歌星，可是因为这中间相当一部分文化素质太差，有一些又挺有名气的歌星连五线谱都看不懂，他们由那样低的层次，一夜之间在大剧院里受到几万人的欢呼掌声，于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分量了，晕晕乎，他们回顾头再看看老师，老师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随着他们本身知名度的提高而越来越缩小……

付林说，我现在一改过去的做法，我不再使用对程琳那样的“合作”方式，任何新歌星一来，我就首先注意教他们做人，培养一种人人应该具有的回报观念，即：（一）言而有信；（二）不能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三）不能以怨报德。付林说：“这是我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几条，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其实我并不期望别人对自己报答。合作是相互的、辅导、扶持也是相互的。但是确实有些素质低的歌星实在使人伤心，觉得老师有用时，好话说尽，觉得老师没有用了，就一脚踢开。这种歌星，连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付林说，从1986年起我开始从注重个别的辅导，扶持，培养，逐步转向广泛的合作。

付林说，苏小明、朱明瑛、程琳、成方圆……开创了中国大陆通俗歌曲一个新的里程碑，李谷一的影响很大，但严格地说来，她还是由民族唱法兼带通俗唱法，而这几年来，韦唯、毛阿敏、刘欢、解晓东、

田震、苏红、娜英、杭天棋、范琳琳等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付林说：“尤其是韦唯、毛阿敏，她们的音乐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台风也很好。一个歌手，如果文化素质不高，很难有发展前途，应该说，通俗歌曲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盛行十多年来，通俗歌曲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提高，但还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听众的需要，十多年来，中国听众的欣赏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但是一大批有前途的歌星正在升起，引起人们的关注，像王治、蔡虹虹、刘海波、白梅、吴荣、周艳红、汪滔、杨英、韩特……”

但是台风不正者有之，忘恩负义者有之，追逐名利者有之，个别演员被邀到外地，稍不合意，甩手而去者有之，索取太离谱的高额金钱者有之，他们忘记了是人民培养了他们，他们没有想一想，你向人民索取了多少？又为人民付出了多少？

付林高兴地说，他现在同一些知名歌星的合作很好，像苏红、韦唯等，1987年春节晚会上，苏红演唱了他创作的《小小的我》；1988年春节晚会上，韦唯演唱了他创作的《相聚在龙年》；1989年，陈汝佳演唱的《故原之恋》；1990年张伟劲演唱的《西北汉子男腰带》；91年春节的联欢会上，毛阿敏演唱了由付林创作的《都是一个爱》……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毛阿敏演唱的《都是一个爱》还被评为十大名曲之一。他说，歌曲作家的作品需要通过优秀的歌星演唱将它们立起来，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友好的合作，谈不出谁帮助谁的问题，帮助是相互的。付林很高兴地告诉我，1992年全国爱好歌曲的人投票，他被选为“全国十个你最喜爱的作曲家”之一。

但是，付林说，有一种现象他很有感触，即分配中的脑体倒挂，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很严重。一个名歌星一出场就是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而一个名作曲家，一首词曲发表在刊物上只有几十元的稿酬，在同一个录音棚内，一个名歌星录一首歌曲可以拿1000元左右，而名作家只有400元左右，一般歌星录音也要拿400元，而同时，名作家却只能拿200元。他创作的《太阳最红》，已经发行了几百万盘录音带，而他分文没有得到，四川一家杂志刊登了这首歌曲，寄来16元稿费，这还是最老实的一家杂志社了。在国外，凡以营利为目的公开演出，任何一个歌星的演出，应将收入的3%至6%交给歌曲作家，可是在中国好像没有这么回事！

但是，付林，这位今年47岁的著名歌曲作家，还在不知疲倦地创作，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8月份，收到全国各地想求他当老师的来信162封。他都要一封封地回答。

难为你了，付林！！

# 张作霖赞赏常荫槐铁面无私

张作霖的五夫人王氏才貌双全，精明强干，张作霖有事总爱与她商量，深得张作霖的宠爱。

五夫人有位厨师，一次外出搭乘京奉路火车，由于当时路政极其紊乱，他便仗着自己是帅府的人，没有买票还占了个头等包厢。

事有凑巧，新任铁路局局长常荫槐正好在这列车上，他一上任便抓路政，亲自出马，雷厉风行。当他检查到这个厨师时，见他没买票，还以自己是帅府的人盛气凌人，便将厨师推下火车，还用重板打了他几下，厨师受此责罚，回来后便向五夫人哭诉。五夫人认为常荫槐打了自己手下的人，有伤自己的面子，非常恼火，便以常荫槐「目中无人，太拔扈」向张作霖告了一状。不料，张作霖听后霍然惊起，大声地说：「真有这等事？他真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小子，真有种，我真正需要这样铁面无私的人呢！」

常荫槐敢于拔虎须，不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自此，他官运亨通，屡屡荣迁，曾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要职。

(文彬)

(接 74 页)他曾经为挣一点买画笔及纸张的钱，不得不去拉“套子”。

他有一个贤慧的妻子，无论在他多么困难的时候，都关心他帮助他，承担了全部的家务。

他曾在那间简陋的，穷哥儿们用碎砖废瓦盖起来的只有五米的画室里，一直苦心致志，忘我不辍地画了十多年，“斯是陋室，何陋之有”，他身在斗室，却进入了一个广阔无限的艺术世界，“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张宝珠说，我只要一站到画台前面，就会进入一个忘我的世界。周怀民先生送给他的《溪山清远》20多米的巨幅长卷他临摹了四遍。

1972年那年，张宝珠在报刊上发表了第一张画《黄河两岸披新装》。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张宝珠与其他二位画家在山东美术馆举办了画展，张宝珠的画得到老前辈黑伯龙、陈惟信老师的高度赞扬，也得到画家同仁以及艺术爱好者们的刮目相看，张宝珠脱颖而出。

1983年，这位身材魁梧，朴实，豪爽的大汉进入了济南画院。

张宝珠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从不掩饰喜怒哀乐的眼睛以及他的典型的山东大汉脸盘上的每一块富有表情的肌肉，都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心地坦荡的人，这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这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一个对艺术诚实、热忱、执著追求的人。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转眼十年又过去了，张

宝珠的画风日趋成熟，他的名声已经超出了山东，他的名声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仅1992年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山东画家十张绘画精品中，张宝珠一人就占了四张，如今已有20多个国家的收藏家，艺术馆收藏有张宝珠的绘画精品。

但是张宝珠并没有满足。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说明未来。

艺无止境，他的艺术名声离开山东越远，他越感到自己的不足。

中国画的漫长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瑰宝。历史，永远是现实的镜子，——尤其是当我们回眸一望的时候。

深厚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使画家心灵颤动。

我们，正站在这几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国画的一个新的起点上。

画家说：“我的艺术道路还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我要进一步苦下功夫，取百家之长，独创自己的风格，山东至今还没有形成山东画派，对此，我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

登山运动员都知道，不少人可以登上半山腰，也有不少人可以攀登到离顶峰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但是能达到顶峰的却寥寥无几，因为攀登这几步之遥比攀登几千米要远远艰苦得多，它需要意志，毅力，生命。

张宝珠愿意用生命去追求他苦恋的艺术。





赵友慈

# 国画大师 与一代伟人 的友谊交往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齐白石闭门家居，很少会客，连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门学校的授课也辞掉了。由于齐白石的作画艺术闻名于世，一些大大小小的日伪头目，仗仗权势，常来齐家强索字画，有的人还带着照像机，想与齐合影，以示“亲善”。某日，两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到齐家，以买画为由，东拉西扯，并诱骗齐加入日本国籍，移居东京。白石老人一听就火了，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不去日本，你们要齐璜，可把齐璜的脑袋拿去！”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防止日寇、汉奸再来捣乱，把他们拒之门外，齐白石在大门上先后贴了以下一些告白：

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

从来官不人民家。官人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与外（国）人翻译者，恕不酬谢。

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若难报答也。

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

心病发作，停止见客。

告白一次比一次鲜明、坚决，为了彻底摆脱日伪的纠缠，最后干脆贴了这样一个告白：

白石已死

白石老人由于心情不好，砍掉了院内自己亲手栽的所有树木，闭门在忧郁中作画，并以题诗诅咒日本侵略者。在《群鼠图》上题诗曰：

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齿我果，又剥我黍。烛尽灯残天欲昏，严冬已换五更鼓。

齐白石在一幅水墨螃蟹上题诗，把日寇喻为横行的螃蟹。他还多次以“鼠辈倾灯”为题材，鞭挞日伪反动统治的罪行。

齐白石的上述言行，充分体现了他嫉恶如仇、耻与敌伪为伍、敢于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北平解放不久，齐白石就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向他问候的亲笔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共产党领袖敬老崇文、谦虚有礼的优良品

格。以后，他又应邀出席了周恩来的宴请，使这位历经数朝、饱经风霜的老艺人初步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

1950年初夏的某日，毛泽东主席派人来看望白石老人，详细了解了他的健康和生活情况。次日，毛主席又接他到中南海作客，由朱德总司令等作陪，品茶赏花，同进晚餐，畅谈数小时。临别时，朱总司令亲自送他上车。

1953年1月7日，是齐白石大师93岁生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李济深、何香凝、周扬、徐悲鸿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了庆祝会。当晚举行宴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祝贺，并对他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生日过后，毛主席派人补送了四样礼品：一坛湖南特产条油咸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羊毫书画笔，一支精装东北野人参和一架鹿茸。祝贺他福寿康宁。白石老人对毛主席的关怀激动不已。他对亲属们说：毛主席今

天给我送来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1954年，齐白石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员。这是国家和人民对他的最大信任、给予他的最高荣誉。同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齐白石还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白石大师的作品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为了表彰他的艺术成就和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1955年度的“加强国际和平”奖金授予他。1956年9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茅盾等各界人士到会，向他表示热忱的祝贺与敬意。齐白石决定将奖

金的一半作为“齐白石奖金”，以促进我国国画事业的发展。

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使白石老人深为感动。他在一封信中表达了无限感激之情：“白石老年，身逢盛世，国内外人士对余国画之喜爱，应感谢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对此道之倡导与关怀。”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也焕发了白石老人的艺术青春，他晚年创作的激情非常旺盛。他画了巨幅“松鹤旭日”，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祖国万岁》、篆刻《学工农》、《为人民》、《人长寿》等倾诉了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广大工农群众及对人民领袖的爱戴之情。他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仅用三天时间在丈二匹上绘制了《百花与和平》，寄托了他祈望祖国繁荣昌盛和人类和平幸福的美好心愿。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这位年逾

九旬的艺术巨匠的作品多得惊人，仅1953年，就创作了各种题材的作品600多件。

由于年事已高，齐白石的身体日渐衰弱，1957年初，病情加重。5月22日，毛主席派人去慰问，转达了领袖对老人的亲切关怀：要节劳，少见宾客，要从心所欲地静居休养。久病中不爱讲话的白石老人向来人倾诉了对领袖的衷心感激之情和美好愿望，企盼病情好转之后，有机会再去中南海，与毛主席合照一张像片。

1957年9月15日，齐白石病逝，享年97岁。9月22日，首都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周恩来、陈毅、林伯渠、陈叔通、董必武等四百余人参加。齐白石晚年受到国家的重视、信任、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和逝世后的哀荣，是中国历代著名画家所不曾有过的。

## 梅兰芳和小凤仙

1916年秋，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在北京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逃出北京，重返云南。

蔡锷逝世后，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追悼会上，小凤仙送了一幅挽联：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那天，小凤仙身穿蓝布大褂前来致哀。当她随民众步入会场，向遗像鞠躬时，被北大学生发现。小凤仙随即快步走出公园，学生们追踪寻访，竟不可得。此后数十年，对小凤仙的去向众说纷纭，一直是个谜。

1951年初，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下榻于交际处招待所。一天，传达室送来一封信，信未署名，不想竟是埋名匿迹数十年的小凤仙。信上写道：“梅同志，寓沈阳很久，如有通信地址，望企百忙中公余之暇，来信一告。我现在东北统计局出收部张建中处做保姆工作，如不弃时，赐晤一谈，是为至盼。”梅先生看罢信，即与秘书许姬传商议，许力主约小凤仙到交际处谈谈。随即回了信。

小凤仙接到梅兰芳的信后，如期到了交际处。

当天，梅兰芳、梅夫人、姚玉芙（梅剧团管事）、许姬传等都在座。小凤仙衣着简朴，形容憔悴，已是五十开外的老妇人了。一番寒暄后，她向梅先生谈了自己幼年的出身家世和沦落烟花的经过，以及与蔡将军结识并帮他从天津脱险等情况。当谈到蔡将军到云南后就没有给她来信以及在讨袁战争中喉部受伤、去日就医、逝世时，她声音哽咽，泣不成声。梅先生关切地询问她生活情况，她感慨万分，讲了三十年颠沛流离：先嫁给东北军一位师长，后嫁给一位工人，目前生活十分拮据。梅兰芳安慰她说：“你的生活问题，我跟实际处商量一下，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你的。”小凤仙说：“我觉得靠劳动吃饭最光荣，东北解放时，我进被服厂工作，以后做保姆。”当天，梅先生宴请了小凤仙，离别时还送给她一笔钱。梅兰芳回家后，又收到小凤仙来信，言她“蒙交际处李处长介绍，在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并说：“我的前途光明，是经梅同志之援助，始有今天。”此后，小凤仙的下落就鲜为人知了。

石林 翟书惠

# 他拥抱泰山

——记著名画家张宝珠

□银珠儿

著名画家张宝珠的家乡历城离泰山只有 200 余里路，站在家门口，可以远眺高耸、神秘、隐约可见的泰山。从幼年时代起，张宝珠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志愿：“我要画泰山”。

16 岁那年，张宝珠背着画夹，自备干粮，他骑着自行车，沿路 200 多里的风光名胜，使宝珠忘记了一路的辛苦，来到了泰山脚下，他欣喜若狂。

他一步一步艰难地攀登泰山，古木交柯，浓荫蔽日的王母池使他流连忘返，红门晓日使他心胸豁然开阔，三潭叠瀑使他心动目眩，山陡崖峭，盘道曲折的回马岭不能让他回头，他永往直前……

“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南天门的清风使他豪情满怀，……从泰山脚下到玉皇顶，有 6293 个台阶，当张宝珠登上玉皇顶时，他一览周围广阔的世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诗句在他耳畔回响，他想起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那段话：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宝珠说：“人生在世，必须象攀登泰山上的十八盘似的，一步步地奋斗，不畏艰难曲折，坚韧不拔地去攀登，不到顶峰，无法领略天地有多广阔，也无法体会到大自然有多美。

他说：我第一次到泰山写生，面对壮丽景色，不知剪裁，一石一水都美得使人陶醉，不知该从何着手。

在此之后，三十年间，他几十次来到了泰山，这里的七十二峰的每一块石头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甚至能认得出，并记住每一棵松柏的形态，他拥抱泰山，亲吻泰山，留下了几千张素描、速写。

张宝珠说：“我是山东人，我要画出山东人的风格，山东人的风格是什么，就是豪爽、热情刚健，山东人的精神就是在艰难困苦中百折不回。山东有

不少我们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典章文物，然而齐鲁大地，最可引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泰山，泰山上或双峰对峙，松生绝壁，如巨浪拍岸，令人心荡松谷，不能自我；或盘道陡峭，如天梯高悬，回视山下，青峰浮云，碧海绿波，若置身霄汉；或晚霞夕照，黄河金带，云海玉盘，……泰山使我刻骨铭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是属于泰山的，然而在我看来，最能代表泰山的，就是泰山上的松柏，泰山上每一棵松的摇曳都在牵动我的神经。任何风云变幻，狂风暴雨都没有能使泰山的松柏摧垮，两千年前的汉柏连理，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很幸运，我从泰山上的松柏那里，看到了我的目标，找到了我艺术中的主旋律。

1987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宝珠松柏画谱》。

1990 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以松柏为主的《张宝珠国画集》。

1992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松柏为主要题材的《张宝珠画集》。

张宝珠所画松柏多以湿墨点擦而成，苍润古拙，墨气袭人，给人以物返其境之感。

1989 年 5 月，泰山遥参亭画廊，游人熙攘，观者如云。一幅巨大的国画长卷《岱宗望府图》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张宝珠倾一个多月的全部心血完成的长卷。

在这幅《岱宗望府图》上，淡墨写山石，浓笔绘松柏，老干虬枝，脊坚神高的岱庙汉柏，偃盖盘枝，挺秀丰润的柏洞侧柏；离披倒起，傲然屹立的对松山松树；勾攬盘迴，奇姿超然的后石坞，以及灵岸柏的幽淡静雅，根露藤攀，千佛山柏的严整谨慎，率率天真。千姿百态，跃然纸上。所以有人评论说：“如此细微的观察和雄厚的功力，非知泰山、爱泰山者，不能为之”。

在山东这块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曾经是奉为圣人的孔子活跃的地方，这里

留下了孔府、万古长春坊、至圣林坊、孔林……等两千多年来供人瞻仰拜谒的众多的名胜古迹。

张宝珠说：“我爱孔林，是它那幽深致远的神韵，使我得以对悠久的几千年历史的静观。”

张宝珠数度前往几百里外的孔林，在孔林参天的松柏丛中体会那种幽深致远的神韵。

1987年，他的孔林翔禽获第一届全国峨嵋杯大赛一等奖。

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张宝珠体会到，是嘉陵江不尽的涛声注入了怀素的狂草；公孙大娘剑器的神韵，透进了张旭的霜毫，是银横的星斗，东山的新月，是雄浑的山，清冽的泉，给了孙过庭美妙的启示，莽莽天宇，恢恢地轮，一切有形有影，有声有色的万象，都是书画家匠心的依据，创造的源泉。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十年间，张宝珠背起画夹，走出画室，不仅无数次地登临泰岱，而且历游灵岩，遍访三孔，每徘徊于泰松汉柏之下，朝夕揣摩尽得其神。此外，他数度去西安，登嵩山，爬九华山，攀越黄山，游桂林，以摄取对大自然的真情实感，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宝珠画的主要是泰岱松柏，却也融入华夏各地松柏之魂。

宝珠的老师黑伯龙老先生这样评价他的画：

“他笔下神奇变化的松柏，倾注了他对松柏的一片痴情，为了画松柏得心应手，泰岱是他常宿席之地，曲阜、灵岩、西安、嵩山，……亦是他驻足忘返处。这大江南北，名山大川的无数奇松异柏，一一充实在他的创作里。浏览他的作品。笔墨之间，那蟠曲卧龙的奇姿，充满力感的造型，无不展现出他对松柏的敬穆。他博爱松柏，是因为他心中装着祖国壮丽的河山，身化松柏所致。”

日本友人干脆称他为“张柏树”，也有人称他为“张松柏”。

张柏树也好，张松柏也好，张宝珠这位农民的儿子，在他三十多年的绘画艺术生涯中走过了漫长、曲折艰苦的道路。

道路虽然曲折、艰苦，然而他的每一步都是扎实的，都留下深深的脚印。

宝珠说，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我的每一棵松柏的泼墨，线条，都融注了我曾经付出的无数的心血，汗水。

在求索的路上，一定有障碍。

在创造的时候，一定有扼杀。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百折不回。

有理想，有抱负，才有奋斗的力量。

没有理想，也无所谓实现。（转70页）



# 一个 历史教 授的生 人

□王方越

文革期间摄于济南



1938年秋天，浙江余姚一个荒芜的山坡上，一位20多岁的青年，迎着冷峭的寒风，埋葬了他的父亲、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昔日豪华的宅院，那个曾是家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废墟，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去留恋的了，他向躺在冰凉的泥土里的亲人们告别，他要去寻找自己的梦，因为，他的教师，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告诉他：在这一切毫无意义的恩恩怨怨之后，存在着一个大得多的世界。凭着他厚实的肩膀，凭着他的智慧，他相

信自己能够在那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便是后来闻名于国内外的史学家王仲孺先生。

王仲孺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太炎文学院任教授。上海沦陷，因其鲜明的政治态度而遭汉奸迫害，颠沛流离经香港、越南、云南后来到重庆，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任教；1947年，受聘于山东大学任教授，客居山东40载，1986年在他济南的家中溘然去世。在其漫长而痛苦的学术道路上，在清贫的环境中，王仲孺度过了自己勤奋的一生，身后留



下了约 500 万字的丰硕成果，计有：

《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西昆酬唱集注》《敦煌地理考释》《物价考》以及数百篇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像每一个有成就的人一样，面对挫折，面对每个加在他身上的诬陷与不实，他总是默默地用自己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来回答。

四十年代初，仲肇先生转道云南时，曾受聘于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时值日军正试图从越南向中国的云南省进攻。作为李根源先生身边的谋士，王仲肇力主作战，中国军队在怒江一带严密布防扼止住了日本的企图。李根源先生为此曾赋诗王仲肇：

壬午六月三，决死在保山。

感君能负重，载得我身还。

而仲肇先生自己却用另一首诗来剖白自己的心迹：

刨地寻碑话宝光，滇池明月镜如霜。

普平村塾三更后，和墨著书夜正长。

忍受着热带疟疾的折磨，他独自生活在云南普平村后破旧的村塾里，伴着阵阵空袭警报，长夜中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仲肇先生十分敬重李根源。他说：“印老（指李根源先生）道德为人，均为一等，当时坚辞印老挽留的美意，欲往重庆中大，没别的原因，我王仲肇是个做学问的，只想当个教授。”

仲肇先生双耳垂肩，嘴唇厚而大，看相之人因此断言说仲肇先生一辈子有口福。作为一个清苦的读书人，山珍海味自然无缘，然而每每谈及吃，仲肇先生兴趣不亚于与人谈学问。最为仲肇先生乐道的，便是四十年代重庆中央大学任职期间，那时仲肇先生是中央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然而这位被同事们戏称为“贝贝教授”的青年书生，生活依旧相当拮据，他的薪水仅够他一天吃两顿饭。当月初刚发薪水时，仲肇先生便直奔小馆，结果月底时常以酱汤度日。只要他不出门，大家便知道他口袋里没钱了。仲肇先生却自有一番理论，他说：只有肚子空空如也，人的思维才能异常活跃。在除夕的欢乐气氛里，同事中年岁较大的吴组湘先生劝王仲肇尽快结束已近 8 年的单身汉生活。仲肇先生却用玩笑将话岔开，“这样吧，我不会跳舞唱歌，那么翻个筋斗做数，感谢老大哥的美意。”看着这个白面书生嘻嘻哈哈地翻筋斗，朋友们却没有笑，因为看到他那 30 岁未到就出现的斑斑白发，心里只能引起阵阵酸楚。1943 年，他生日那天，仲肇先生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饱的一顿饭。他来到面临嘉陵江的山半腰的一间竹棚里，吃了满满一碗牛肉面，然后坐在石头上，像往常一样摊开书。浓雾下的嘉陵江默默

地流淌着，远处时时传来令人压抑的轮船汽笛声。天空一片迷蒙。于是他开始了 8 年来失去妻子后的第一次哭泣。仿佛透过浓雾，他看见了抱着女儿的妻子，妻子的双眸是那么明亮、那么深沉，又是充满了歉疚，仿似她理解丈夫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多少年来，就是这个形象一直指引他走到现在。30 年后，当他重见中央大学的故友蒋礼鸿先生时，赋诗一首谈到了这段生活：

卅年不见阿龙超，末枉高轩叹寂寥。

记得柏溪明月夜，嘉陵江上听清箫。

仲肇先生总是说自己是命运的好朋友。与全国的教授们都在学习怎样拔草与使用铁镐时，他却能躲在北京中华书局，作为国务院请来的一流学者而校点《二十四史》，以至于山东大学都忘记了这个人的存在。每每谈及于此，仲肇先生还意犹未尽地补充道：这就是会“游泳”的与不会“游泳”的差别。自言“五谷不分”的仲肇先生在解释“游泳”这个词时，是这样说的：“看风色不善，赶紧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其实，在文革那段日子里，他也少不了要去拔草、去使铁镐。在家人的眼里，只要他在家，总是看见他伏在桌子上写、写，不停地写。窗外的阳光透过灰尘照在他白发苍苍的脑袋上，然而寂寞时时被他充满压抑的喃喃自语所打破：“混帐！”“怎么能这样！”这时，家里人谁都不出声，因为他们知道，他心里苦。

晦暗的氛围，说不清是是非非，道德力量在现实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然而仲肇先生总是能用超然的微笑把阳光聚集在身边，让每个走近他的人都觉得生活是简单而又明明白白的。八十年代初，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学生来看望仲肇先生。面对这个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的学生，仲肇先生一反常态，从过去的生活中总结出一些话送给这位学生。他说，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别人对你的背叛，有时不相关的人还可以原谅，可有时却是最亲的人的背叛，那会让人从心底里感到仇恨；有一天，当你发现你不再仇恨时，也许你就成熟了，可你也老了，因为仇恨已耗尽了你的一切。

又一年，仲肇先生作为专家列席一次校务会，当会议讨论一学生违犯校规的处理问题时，部分与会者倾向于开除该生，仲肇先生站起缓缓说道：我们是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的无权毁学生。一个被开除的学生，甚至连个好工人、好农民都难做到，是个被社会开除、没有明天的人。言简意赅，那个学生被保留了学籍。

1986 年 6 月 4 日，因长期的劳累大面积心肌梗死，仲肇先生倒在他的写字台旁，从发病到去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他说：“活着时，我不麻烦人，死时也不麻烦人。”他终于跨过了那条河……



# 华侨领袖 陈嘉庚

刘正英 黄顺通



194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延安杨家岭的毛泽东，欣然走出窑洞，等候他慕名已久的远来客人——爱国侨领陈嘉庚。

毛泽东将见的陈嘉庚，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23年创办《南洋商报》，宣传抵制日货；1928年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致力团结华侨的抗日力量；抗战爆发不久，他就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次年10月，被东南亚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推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在三年中为祖国抗战募集的各种款项不下30亿元；广州、武汉沦陷后，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不顾与汪私谊，以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致电提出“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被邹韬奋誉之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后来公然叛国投敌，陈嘉庚又立即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辑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表现了他的一身正气和崇高气节。当陈嘉庚亲率“南洋慰问团”回国考察时，毛泽东立即电邀陈嘉庚访问延安。

他接到毛泽东邀请电报，欣然应邀访问延安。

四时左右，陈嘉庚一行来到杨家岭，毛泽东连忙迎上前去，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嘉庚被迎进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投入眼帘的仅是“大小高下不一的十余只木椅，一张写字桌比学生书桌稍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住处如此简单朴素，是他想不到的。眼前的毛泽东，面容俏俊，衣着朴素，神态慈祥，态度亲切，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交谈中，朱德等中共要人和一些青年也来参加，陈嘉庚注意到他们来时都是“尤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这种“平等无阶级”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十分新奇。当晚，毛泽东宴请陈嘉庚，朱德作陪，使陈嘉庚生平第一次参加了这种由重要人物邀请却又十分俭朴的宴会：在窑洞外露天地面上放置一张陈旧不光洁的圆桌，十余人围坐一起，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等，外加的一道鸡汤还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有贵客特地送来的。席间，毛泽东谈笑自若，十分谦和，他赞扬陈嘉庚的爱国精神，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毛泽东请陈嘉庚向海外侨胞转达他对海外侨胞的关怀和爱护。这一餐，宾主亲如一家，气氛和谐自然，陈嘉庚吃得轻松愉快。饭后，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到中央党校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陈嘉庚被安排坐在毛泽东身旁观看演出。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和陈嘉庚几次晤谈，反复阐述中国共产党政策，还数次共进午餐和晚餐。

陈嘉庚喜食大米饭，一日三餐都有米饭，使他感到宾至如归。有一次交谈时，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他对毛泽东说：“万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满口应承，并宽慰陈嘉庚说其所言绝无恶意，请陈嘉庚回去后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同时将在此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向海外侨胞报告。陈嘉庚对毛泽东这种不计前嫌，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豁达胸怀十分钦佩；有一次共进晚餐后，毛泽东在问明陪同陈嘉庚前来访问的国民党科长寿家骏的住处后，即入其屋与之谈话，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陈嘉庚在窑洞口等待与毛泽东告辞，直等到晚上10时还不见出来，只好入洞就寝，这件小事给陈嘉庚的印象特别深刻。

延安九天，陈嘉庚深感此处风气与重庆有天渊之别：在重庆，达官显贵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蒋介石官架子十足，部属对他唯唯诺诺，奴颜卑膝；延安却是“勤劳质朴、民生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一派新气象。士兵、学生见到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都毫无拘束，言行自如，毛泽东和朱德待人都十分随和。朱德还与战士同桌吃饭，与军校学生一起下场打篮球。这种领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令陈嘉庚叹为观止，敬佩不已，认为“这种事世界上没有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内战，陈嘉庚在《南侨日报》发表了《论美国援蒋必败》、《祖国光明在望》等文章，声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在新加坡怡和轩三楼的大厅中公开悬挂起毛主席的像片。他相信，共产党在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不久，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很担心他的安全，曾打电报劝其不到重庆去，还为此给《经济导报》为《双十协定》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涛”。

1948年4月30日，解放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陈嘉庚于5月4日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毛泽东亦专电陈嘉庚：“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中国共产党为此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1948年11月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在十二月内将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孙起孟、茅盾、陈嘉庚等准备参加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

代表送来解放区，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

此前毛泽东已于10月20日致电陈嘉庚：“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陈嘉庚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与此同时，陈嘉庚还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对时局的声明，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5月5日，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回国，6月4日抵达北平车站。7日，由周恩来陪同前往香山会见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与陈嘉庚阔别九年，再度重逢，分外高兴，他们纵谈中外局势，直到半夜，意犹未尽。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田汉等18人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等问题。经认真讨论，会议采纳了陈嘉庚等人提出的以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建议，这对陈嘉庚思想上又是一个震动。

9月30日，陈嘉庚被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2月，陈嘉庚最后一次出国到新加坡，5月回到北京，他婉谢了毛主席、周恩来一再挽留他定居北京的盛意，决意定居家乡福建集美。1952年，陈嘉庚请毛主席为即将落成的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毛主席当即满足了他的愿望。题字后又附信道：“陈委员：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1952年，有关方面透露，美蒋特务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中共。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中共厦门市委曾就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要不要开展运动问题请示中央，中央明确答复一定要尊重陈老的意见，并具体指示：“在厦大和集美内部进行‘三反’运动，这应取得陈嘉庚的同意，并由他出来领导，厦大在高教事业中所占地位很小，又是他一手经办，只要大的方面

不出轨，他不同意作的事情，宁可不作……对陈嘉庚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要进行批判，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都不要作，因为他是上层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所要求于他的是爱护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不是也不应该要求他放弃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立场。”同时还指示：“要厦门市委有一负责同志经常与陈联系，做好我党同他的统战工作。对厦大困难积极予以帮助，应当予以帮助，而地方上难于解决的可报中央处理。”厦门市委向陈嘉庚汇报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做了细致的工作，陈嘉庚十分感动，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意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开展“三反”运动。

陈嘉庚回国定居后，除赴京参加政务活动和外出视察外，其余精力大都倾注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扩建中。1959年8月，数十年罕见的十二级以上特大台风袭击厦门，集美学校遭受严重破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校舍受损，陈嘉庚正在为此忧心，周总理拍来了慰问电，并通知已决定拨款80万元给集美学校修校舍，交陈嘉庚掌握使用。

陈嘉庚常赞扬毛主席文武才干，他特别钦佩毛主席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1954年10月1日晚，陈嘉庚与曾同赴延安的李铁民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毛主席一眼认出了李铁民，并问道：“你头上碰的伤好了没有？”大家想了好久才明白，原来毛主席指的是14年前陈嘉庚带领南侨慰问团在访问期间，时为慰问团秘书的李铁民上车时不慎头上碰伤而进延安医院治疗。事隔多年，操劳国家大事的毛主席对此居然记忆犹新。陈嘉庚还联想到在延安时毛主席特意向他提出过1932年中央红军进漳州时，曾没收陈嘉庚在漳州胶鞋店的胶鞋以充作派他款项的数额。毛主席对此事一直不忘，为此当面向陈嘉庚道歉。解放后，陈嘉庚每谈到当年访问延安的情况时，总是说：“我一直愁虑复国兴邦的人选，及至看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恍然大悟，原来已经有了‘天生的’了。”

陈嘉庚生前在家乡集美精心设计建造了整园，整园由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陵墓两部分组成。整园的设计和建造倾注了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一片深情：整园正中耸立的纪念碑高28米，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碑正面是由毛泽东题写的“集美解放纪念碑”，背面是陈嘉庚手撰的碑文，其中刻意说明“座阶八级象征八年抗战，又三级象征三年内战”，碑座上精工镌刻着1949年9月17日陈嘉庚在北京勤政殿前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人一起的合影，象征着他们间的永恒友谊。

# 刘传新，

刘传新，曾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他在“文革”中多行不义，对广大公安局的干部，对广大人民群众大打出手，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犬马之劳。结果落得个自杀身亡。

□蔡明忠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



# 为『四人帮』 殉葬的公安局长



“清明时节雨纷纷，悼念总理欲断魂”。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生的一场“文化革命”风潮，袭击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是履行专政职责的公安机关也没有逃脱这场浩劫的厄运。

北京市公安局对首都的安全保卫无疑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它也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

早在1966年5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就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半个多月以后，前公安局长冯基平和当时的公安局长邢相生及其他主要局领导人都被隔离审查。紧接着，工作组对全局84名处级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给32名处级干部罗织了“走资派”、“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分别被隔离、撤职、停职、批斗。

几个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原南京军区某部军副政委刘传新是军管会的主要成员，初任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因“砸烂公安局”时敢于冲锋陷阵，颇受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赏识，很快爬上了军管会“第一把手”的宝座。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于1967年底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正名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与此同时，谢富治发表了关于改造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要求在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并强调“首先从首都开始”。刘传新立即响应，在市局军管会党委扩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对公安局彻底改造。搞不好死不瞑

目！”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崑、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2000多人，用1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崑等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崑定为“CC特务”，张烈定为“头等嫌疑”。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所谓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胡说什么公安局“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

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办法”。

8月23日，刘传新将814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8月29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9月26日，刘传新递交了《关于逮捕公安局内部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请示报告》：“除前经批准逮捕的冯基平、邢相生等叛徒、特务外，我们研究还有35个需要依法逮捕。”在另一份报告中还说：“10名局长有5名是特务分子，2个是死反革命，其余3人问题也很严重。”“专政对象977人除已陆续拘捕39名外，再拘捕79名，其余分别予以判处管制或遣送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改造。”并提出对“不适合做公安工作的4000余人，送茶淀劳改农场安置2000人，其余2000人由市里‘统一安置解决’”。

11月15日，6168名公安干警和职工下放到农场劳动。

1969年12月12日，204名公安干警下放到农场劳动。

1970年1月5日，583名公安干警下放到北京郊区各县农村插队。

1970年5月20日，242名公安干部下放到延安地区……

在刘传新等人的疯狂捣毁下，北京市公安局被糟蹋得支离破碎，老公安干警被驱散得七零八落，公安工作陷于瘫痪！

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总理一针见血地斥责





谢富治，刘传新的行为“是精心战术”。

1970年12月，公安部召开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作出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周总理不失时机地在会上明确指出：“主席管得最多的、一个是外交战线，一个是公安战线。公安战线17年还是毛主席的红线领导。”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总理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刘传新继续诬蔑前17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甚至公然叫嚣“有人想借一

分为二恢复老一套”，影射、攻击毛主席、周总理。

1971年8月，周总理顶着逆流，再一次对刘传新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批评：“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并责问：“那些老人为什么都不用了？老的不能不要，不能不用。”

1972年10月18日，周总理对刘传新等人顽固坚持错误路线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你把有经验的老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

然而，刘传新并没有醒悟。他自以为善于窥测形势，认为周总理当时在中央的地位已是日趋危殆，而真正能控制局势的是正

在崛起的“四人帮”。因此，他不仅拒绝接受周总理的历次批评教育，而且还在内心深处埋下了仇恨周总理的种子。

随着“四人帮”在中央权力的膨胀，刘传新卖身投靠的决心也愈加坚定。当“四人帮”刮起“批林批孔”、“反击回潮”的妖风时，刘传新感到正中下怀，闻风而动。1974年3月底到5月初，刘传新先后两次在北京体育馆和工人体育馆召开公安局“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会前精心布置写稿，会上指派专人发言，公然把周总理关于使用老公安干部、恢复公安工作的好传统的指示诬蔑为“老办法好使、老路子好走、老人好用”的“三老方针”，并作为“复旧”、“回潮”进行批判。他还指使手下的人专门收集了93名老公安干部的所谓“今不如昔”、“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等“回潮表现”，在全局范围内进行批判，并写成材料上报市委。

刘传新还亲自出马，先后两次到北京大学讲演，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一味开倒车的人说公安工作削弱了”，借机发泄对周总理的不满和仇恨。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

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公然说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道道禁令：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邪恶与疯狂，卑鄙与背叛，终于激怒了忍耐已久的中国人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几十座城市先后都贴出了大字报、大标语，并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口诛笔伐“四人帮”的阴谋与罪行。

清明节前的北京，浅淡的春意正孕育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

3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花圈。接着，第2个、第3个、10个、20个……花圈在增多，花圈在增大……

“四人帮”似乎刚刚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们胆战心惊，惶恐万状。公安局长刘传新更是如临大敌，全力以赴。早在3月26日，他就指令专人“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3月31日，他又派遣便衣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

4月1日，他又下令：“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4月2日，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

“联合指挥部”成立的当天，刘传新就下达了抓人的命令。下午，他又亲自主持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对“散布政治谣言，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的，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当场抓获或跟出现场扭获”；对“影射攻击的要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对“蓄意捣乱、制造事端的，要揭露扭送”。

在刘传新的授意下，“便衣”偷花、拍照、盯梢、跟踪、密捕等见不得人的事件相继发生。头一天送的花圈，过一夜就不见了；头一天贴上的诗词，第二天不翼而飞。许多诗词、标语和悼文被立案侦察，纪念碑前有一首最先被人们广为传抄的小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小诗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张贴诗词的人和出头朗诵、讲演的人被盯梢、跟踪，不少人遭到密捕。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引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4月3日，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大早就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有些机关、工厂列队行进，浩浩荡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和花圈越来越多，估计有上百万人次，几千个花圈。

4月4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人群像流水

一样从四面八方方向广场汇集而来，前呼后拥，陆续不断，人数总计达200万人次。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号码、拍照诗词、跟踪群众，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早就下达了监视跟踪、“当场抓获或跟出现场扭获”的指令，并布置公安局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当得知江青大发雷霆，疯狂叫喊“抓人”时，“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立即催办：“在纪念碑西南角讲演的那个人，讲了几个小时了，嗓子都喊哑了，一定要把他抓下来，不管上多少人，坚决抓住。民兵的棒子用上，谁动就打谁！”刘传新抢功心切，亲自赶到指挥部坐镇，人刚抓到，他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四人帮”报告。

仅在4月3日和4日这两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就有26人被捕。

刘传新在公安局内部也进行了彻底清查。他曾多次责令基层组织，让公安干警主动交待，互相揭发，将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列入黑名单，收缴了他们手中传抄的诗词，一并上报。

清明节的那天下午，刘传新在公安局内下达了晚上不许回家的命令。当天夜里，我们机关的“文职人员”除老弱病者外，其他人都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待命。

第二天凌晨4点来钟，我和同事们被紧急集合的呼喊声从睡梦中惊醒。几分钟以后，我们这些揉着睡意未消的眼睛的男男女女，站在院内的操场上，接受基层领导人传达市局的命令：立即出发，到天安门广场旗杆下集合。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今天凌晨以前，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

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简短的几句话，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顿时睡意全消，大家面面相觑，相互传递着疑惑的目光。

“大家赶紧领取备用武器，马上出发！”一声呼叫使我们从疑惑中抬起头来，顺着呼叫者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操场南边的小树下，机关的工人师傅早已将长长的罗纹钢条锯成了一节节一尺多长的短棍。

我们依次拿起了一节铁棍。不知为什么，没有上级指示，也没有互相商量，人们竟各自找来一张旧报纸，默默地将自己手中的铁棍卷在报纸里。当我们排成长队，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时，我望着同伴们手中露出的半截“纸棍”，不竟思绪万千！我知道，我的同伴们绝不是企图让“纸棍”突然在群众的头上显示出“铁棍”的神威，他们只是不愿意让沿途的百姓看到自己手持铁棍开进天安门广场；他们也不是有意欺骗百姓，只是害怕百姓误解了自己。

天已大亮了，街道两旁的行人惊疑地注视着。我和同伴们没有一点儿自豪感，没有一点儿自信心，一个个低垂着眼皮，不敢侧视两边的市民……

当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悲惨景象：花圈、花篮、白花、标语、横幅、诗词、悼文都被洗劫一空，地面上仅存一片片刚刚清洗过后的水迹。我们站在旗杆下，望着冷冷清清的偌大广场，满目空旷，怅然若失。春天的清晨，加之一场急雨过后，冷风扑面，令人不寒而栗！

上级让我们到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的树林下休息待命。我和两个同伴悄悄地离开了小树林，径直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我环

顾广场四周，树林下到处都是松松散散的人群，不用猜，他们也是前来“待命”的。

5点过后，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个经历了夜间洗劫的目击者向大家诉说了“四人帮”及其打手们在黑暗中践踏民心的滔天罪行：

昨天子夜，广场上大批悼念的人群陆续散去。寒星装饰着清明的夜空，如山似海的花圈在晚风中发出阵阵悲鸣。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几股人流围在纪念碑的东南角，记录着有人朗诵的《大事记》、《请收下》、《清明呐喊》的诗文。

接近12点时，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出现一队军人，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的东南角，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也趁机一齐扑了上来。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先后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个打手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尽管大部分群众已经四处跑散，但还是有57名群众被网进了包围圈。这些人被逐个审查以后，其中7人因抄写诗词和有可疑迹象被抓了起来。

紧接着，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的200辆卡车开进广场，花圈一个个地被推翻、踩扁，然后扔上卡车。镶嵌着周总理遗像的玻璃镜框被砸碎了；挂在灯柱和旗杆上的花篮、挽联被大竹杆打落下来；为了挪动重达千斤的大铁花圈，大吊车开来了；为了扯下高处的花圈，云梯能升能降的进口救火车也开来了。

凌晨4点多钟，2000多个花

圈被洗劫一空。大部分花圈运到了八宝山，小部分运进了中山公园和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内，准备留作“罪证”。

就在中国人民的圣洁感情遭到无情的践踏和蹂躏时，“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前停下了一辆红旗牌轿车，王洪文穿着军大衣满脸杀气地登上小灰楼，他板着面孔对刘传新和“联合指挥部”的其他成员说：“这两天广场实际上被人家占领了。……昨天晚上那个人（按：指朗读《大事记》的那个青年工人）我就主张抓，怕什么？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去年7、8、9月的谣言追查得不彻底。这次要追到谁算谁，就是追到中央、国务院，追到天皇老子，也要追，是我也戴手铐子。”在谈到抓人时，他强调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王洪文坐镇“联合指挥部”，直到天安门广场洗劫一空、防止群众“闹事”的预备队伍布置完毕以后，才溜出了小灰楼。

清晨6点钟左右，北京172中学的20多名学生，举着一个直径约1米多的花圈，从广场的西北角向纪念碑方向走来。广场上立即引起了一阵强烈的骚动，因为这是天安门广场惨遭洗劫以后，重新出现的第一个花圈！它无论是对热爱花圈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对害怕花圈的极少数人，都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人们纷纷向花圈迎去，并自动簇拥在送花圈的学生周围，为他们开路，护卫着他们向纪念碑豪迈地奔去。尽管纪念碑前有人阻止，但这道脆弱的防线根本经不起愤怒人群的冲击。在群众一片“让开”、“冲上去”的呼声中，花圈很快安放到纪念碑的浮雕上

面。学生们在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仪式，在场的群众也都自动地参加了这个仪式。

上午8点左右，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北京市公安局的一辆广播宣传车从纪念碑的西侧由南向北缓慢地驶入广场。广播车的高音喇叭里重弹老调：“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结尾却加上了一句：“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谁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谁在搞破坏活动？被激怒的群众纷纷冲上前去，挡住了广播车的去路，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广播车虽然被群众团团围住，但高音喇叭里仍然在大放“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喊词。一个怒不可遏的青年爬上了车顶，几脚端扁了喇叭。接着，在“一、二、三”的集体口号声中，将广播车一连翻了三个个儿。

这辆广播车是奉刘传新之命开进广场的。我认识车上的两名女播音员，她们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宣传队的演员，一个是演唱的，一个是跳舞的。她们俩在车内随车打了三个滚儿，广播车的轱辘朝天，躺在广场上不动。我从车窗探头往里看，那两个女青年趴在车内抹眼泪。

这时，群众逐渐聚集到人民大会堂的东侧。有人怀疑昨夜的花圈被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于是群众纷纷涌向大会堂的东门前，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

9点钟以后，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及台阶上至少有一万多人，广场上至少有十几万人。“联合指挥部”见形势越来越不妙，立即下达了“要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队配合，把广场南北两面封锁起来”的命令，民兵和警察很快在广场东北角的马克思像与西北角的斯大林像之间排成一列横队，把长安

街和天安门广场分隔开来，企图阻止人们从长安街进入广场。

就在这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群众与值勤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前来增援的数百名佩戴袖章的工人民兵，列队向大会堂东侧的走廊开进，但队伍很快被群众阻割成几段。有人对工人民兵说：“你们也是工人，也曾含着泪水做花圈，也参加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难道你们愿意充当镇压人民的凶手吗？你们上当了，请你们马上摘下袖标，赶快下去！”许多民兵被感动，纷纷摘下自己的袖标，从人们让开的通道中走下台阶；少数与群众对立的人被群众扯下袖标，推下台阶。

接近11点钟时，人群像潮水般地由西向东奔涌而去，“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北面，很快围满了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人群。小灰楼周围一大队负责警戒的民兵，在半导体喇叭的“开导”下，自动交出了阵地。可是，指挥部的门口挤满了解放军战士，人们向小灰楼的两次冲锋都被顶了回来。急了眼的群众将站在外围的一名小战士使劲往外拉，那个战士忍不住红着眼圈对群众说：“你们拉吧，你们打吧！我心里也在怀念周总理啊……你们心里有痛有恨，那就在我身上出吧！”这催人泪下的话语感动了人们，群众立即松开了手。

将近12点钟时，有人宣布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并选出4名代表，要求上小灰楼内谈判。可是指挥部的入口处戒备森严，挤满了战士，代表们无法进去。一个战士真诚地说：“从我们肩上、脑袋上翻过去吧！”代表们深深领会了战士的心意，他们感激地看了一眼这些人民的子弟兵，然后踩上了他们的肩膀，从那厚厚的人墙的头顶上，爬进了小灰楼。

这时，从历史博物馆开出了

一大批解放军战士，群众立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齐声高喊：“人民子弟兵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军队后撤了，稍许，又从指挥部的西侧开来了一大批警察，群众照样挡住了他们，并齐声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后撤了。

12点40分，代表们走出小楼，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12点50分，人们再一次怒吼了！几个青年推翻了小灰楼前的一辆上海牌小汽车。几分钟后，这辆“联合指挥部”的小汽车被点着，冒起了滚滚浓烟。紧接着，分别从南北方向开来的两辆消防车都被群众堵住，其中一辆瘫痪在离燃烧的小汽车不远处，被愤怒的人群用手从历史博物馆西门的南边推到了北边。

下午2点多钟，一辆给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面包车开进广场。群众愤怒地说：“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岂能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于是，面包车里的食物被抛向空中，面包车也被点着了。

几个青年难消心头的怒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指挥部的另外两辆吉普车也点着了！随后，指挥部楼前的自行车也一辆接一辆地投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

天安门广场燃烧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帮”一伙胆战心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其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的楼上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策划“反击”的部署。

他们策划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民兵指挥点，在28中学设立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5万人、警察3千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当天下午，天安门前国旗旗杆往南20来米，从东到西坐着5

排民兵。纪念碑以南的一片松林、人民大会堂的东南路口，全部被警察封锁。

下午6点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回荡在广安门广场上空：

“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广播讲话刚一结束，广场四周围观的人群一度发生骚动，有些人向外边散去。但此时正值下班时间，回家路过或特意赶来看热闹的人群络绎不绝。

广播讲话还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每播完一遍讲话，便插播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

黑夜早已降下了帷幕。广场上大多数人已经散去。剩下一些没有离去和刚刚来的人们还围在纪念碑旁抄写着新贴出来的诗词，还有些人凑在一起交谈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晚8点左右，“联合指挥部”的一个头目乘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指挥部，用电话再三催问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9点左右，纪念碑周围仅有二三百人，纪念碑上安放着一圈不屈的花圈和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周总理遗像。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

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

打手们将陆续抓到的群众带到纪念碑北侧，面对纪念碑站成几排。等到腥风血雨的镇压平静以后，他们对被逮者全身搜查，逐个审问，并作了记录。随后，一个个被押上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这天夜晚，从广场抓走了200多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仍在重复播放，“第五不准打人和骂人……”的歌声在纪念碑上空缭绕，纪念碑周围的地上留下了一滩滩鲜红的血迹……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文职人员”没有派上用场。按上级命令，我们一律不准回家，不准打电话，继续作为预备队休息待命。我们待命的地点由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的树林下迁移到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我们在招待所的一个礼堂里“安营扎寨”。

天刚亮时，我从礼堂出来上厕所，在礼堂门前的过道里，我看到好几十人坐在地上。这些人大多数是十几岁的青年学生，有的女孩肩上还斜背着简朴的学生书包。他们排着几个横排，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一个个都双手抱膝，然后把自己的脑袋搁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从旁边几个看守人员那里得知，这些人都是昨天夜里抓来的。我在他们身边驻足良久，有几个男女学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头搁在膝盖上。我看到他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色灰白，头发蓬乱，精神疲惫不堪。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还是些孩子啊……

按原计划，上级准备让我们这些人“待命”3天；后来可能是策划这次大镇压的人觉得“天下已定”，可以提前解散“预备队伍”，我们只“待命”了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便“班师回营”了。

一场震惊中外的群众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人民暂时沉默了。但是，这种沉默犹如熔岩在地层下潜行、涌动！

“四人帮”害怕他们的血腥镇压不得人心，他们虚张声势，欺世盗名，用行政命令、强制手段组织各单位群众上街游行，然后浓墨重染，大肆报道所谓“首都一百多万军民上街游行的盛况”：“热烈欢呼”、“坚决拥护”、“大快人心”、“扬眉吐气”、“无产阶级专政好得很”、“完全符合人民的心愿”等等，强奸民意，令人发指！

为了混淆视听，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刘传新亲自挂帅，匆匆忙忙炮制出了所谓《关于天安门广场政治事件真相》的宣讲材料。刘传新还亲自出马，到处宣讲。他颠倒是非，贼喊捉贼，把被镇压者说成是“凶手”、“暴徒”，把刽子手说成是“英雄”、“卫士”。他在所谓《真相》中还耸人听闻地捏造说，查出了几十个“反革命集团”，并给它们冠以“裴多菲俱乐部”、“林彪小分队”等罪名。

几天以后，刘传新在公安局又是召开“庆功会”，又是召开“批斗会”。他将“四五”事件中广播宣传车里的两名女青年和在镇压时为他卖命的几个公安干警推上舞台，给他们“记功、授奖”，极力往打手脸上贴金。与此同时，他又从监狱里拉出十几名“四五”事件中的“首恶分子”，作为活靶子在体育馆进行批斗。在那十几名“犯人”中，有一名是宣武分局的警察，“四五”事件刚过，他回老家探亲，他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乡亲们讲述了天安门广场大镇压的实情，不料有人告密，结果被刘传新抓了起来，投入监狱。在批斗大会上，让这名警察同“暴徒”站在一起，无非是“杀鸡给猴看”：谁敢违背刘传新的旨意，这就是他的下场！

“四人帮”亲自策划，发起了

所谓“双追”运动，即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刘传新在公安局干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我的理解是敞开干！”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全力投入镇压活动，调整了局长分工，组成审讯领导小组，成立办事机构，并从全局和公安部抽调80名骨干，充实审讯力量，对“四五”事件的政治犯进行突击审讯。此外还指令公安局的两个处、各分局的两个科集中力量侦破天安门广场的案件。

牢房腾出来了。一时间，警车凄厉，镣铐叮当，公安机关以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诗词等为线索，开始四处抓人。诗词作者、讲演者、送花圈的带头人等“出头鸟”纷纷被定为“反革命”，投入监狱。

北京城里一片白色恐怖，但刘传新仍在穷凶极恶地叫喊：“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对这些人要狠，不要手软！”“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他还秉承“四人帮”要抓“后台”、“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的旨意，对手下人布置说：“对高级干部，对副部长、司局长、军队师以上干部的线索，局、处领导要把关，要专门研究。”他甚至煞有介事地造谣说：“天安门事件那天，邓小平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他表现得很高兴！”硬是要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扯在一起，以迎合“四人帮”抓“后台”和“幕后策划者”的旨意。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公安局在清明节期间偷记的天安门广场上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

文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15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公然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枝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绘制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可以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及其爪牙恶贯满盈，坏事做绝，这就预示着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

10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当人们在洒满阳光的天安门载歌载舞、从内心发出欢呼时，他们没有忘记半年前这里的花山、诗海、人潮，这里的腥风血雨，这里愤怒的呐喊和悲壮的国际歌声，这里泪洒广场、血溅雄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

复仇的怒火在燃烧，人民要向“四人帮”讨还血债！“审判‘四人

帮’的呼声举国上下回荡；“四五奇冤应昭雪”、“四五战士应平反”的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紧接着，大标语、小字报纷纷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彻底昭雪，有人还发出了“邓小平同志应恢复工作”的呼吁。

但是，刘传新对这些正义的呼声却横加污蔑，胡说“这是右倾翻案风的继续”，“敌情比头一年清明还严重”。还叫嚷“不能畏首畏尾，不能手软”，“认准了要抓人，力争一个不漏，一个不丢”。随后在天安门管理处设立了指挥部，指令公安局的三个处加强天安门广场的力量，派出便衣人员六七百名，到广场监视群众，跟踪盯梢，取证抓人。在短短的一周内，获取诗词、大小字报及照片共200多件，从中定为反革命案件的86起，逮捕1人，拘留6人，受到审查的16人。

随着社会上要求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1977年1月，有人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贴出了“庆父不死，鲁乱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的罪行。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市局下属各个处级机关。许多公安干警纷纷赶到市局大楼，他们怀着惊喜的心情在那些令人振奋的大字报前驻足良久。随后，有些处级机关的大院里也相继贴出了质问、揭发、批判刘传新的大字报。人们一反十年来在刘传新的严密控制下忍气吞声的习惯，开始向这个恶魔公开示威、宣战了！

1977年1月27日，经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贯神气十足



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一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年过半百的刘传新把权力和美女都视为他人生

得到满足的象征。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他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多年的平房院落里，整天沉默不语，低头踱步。5月18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声讨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尽管他极力想装出镇定的样子，但在他点燃一支香烟时，双手却神经质地不停颤抖……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的方向翘首观望，等待着刘传新被押上审判台的场面。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

了，互相询问，议论纷纷。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是的，刘传新的确自杀了，他是自缢而死的。在他接到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的那天晚上，他一直没有睡觉，他回想了自己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清楚自己在中国这段历史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害怕见到愤怒的群众，他难以想象昔日威风凛凛的公安局长将要站在被告席上的滋味……他没有勇气再生活下去，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他作威作福的机会。于是在天亮以前，凭借夜幕，他悄悄地在自己院落里的一棵树上，套上了结束他一生的绞索……



# 清代廉吏

公元1684年，位居两江总督要职的于成龙病逝了。据史籍记载：于成龙病逝后，当时江宁（今南京市）的“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哭罢市”，甚至在其出殡的当天，竟出现“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伏地哭，江涛声殆不闻”的动人情景。于成龙何以会受到士民如此厚爱？他的死为什么使人们如此悲哀动情？

经查史料，于成龙原来是清代顺治、康熙年间有“包（拯）孝肃、海（瑞）忠介”之称的著名清官。1684年，康熙在南巡过程中，曾“延访吏治，博采舆论”，对各级官吏进行稽核考察，最后依据调查材料得出结论说：“原任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难怪于成龙死后会受到群众那样的敬仰和爱戴。

于成龙（1617—1684），山西水宁州（今山西离石）人，原是明朝的儒生，崇祯年间曾考取过副榜贡生。清取代明而兴起后，于成龙在顺治十八年授与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了其清正廉明的仕途生涯。此后，他因政绩昭著，屡被擢升，历任四川合州知州、湖北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及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之职。他于各地任职期间，皆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平反冤狱，兴利除弊，政绩斐然。尤其是在封建官场中，贪赃枉法，贿赂

公行，朋比结纳，请托馈送等腐败现象较为流行的情况下，于成龙却严禁馈送行贿，坚拒请托说情，而且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始终如一。

清朝的各级封建官吏，当然也不乏像于成龙这样的操守端严，清正廉明的清官，但大多数却是以升官发财为己任。他们为达到一己之私利，常常是朋比为奸，相互勾结，虐取瓜分。为了求得庇护与升迁，又每每借名冬夏时令，端阳中秋，以及上司的寿诞生辰等，都要巧立名目，钻营馈送，而且是逐级层层上送，州、县官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督抚司道又苛索属员，馈送在京的部院大臣，在京的部院大臣又交相馈送。上下之间辗转因袭，遂使馈送之风，成为陈规陋习。一些督抚大臣竟然明文规定，某州县属上等，某州县属下等，派定数目，按数收受。馈礼数目之巨厚，也十分惊人。如康熙时的大学士徐乾学，因发放其学生李国良为江苏按察使，李国良为感谢“恩师提携”，一次竟馈银一万两，另送“节礼四百两，生日礼一千两”。以致于“大吏腹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而最终受害的仍是下层广大黎民百姓，使得受害群众被盘剥得“脂膏竭尽”。当时，就有人指出：“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

一向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于成龙，对于官吏之间结纳馈送的陋规恶习，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并

采取各种措施，竭力杜绝。他每到一任后，即在官衙前张贴告谕，明令禁止馈送请托。康熙十九年，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直隶巡抚，一到任即戒告州县，且勿在征收百姓钱粮时私加火耗，馈送上官。但大名知县，却不听劝戒，仍因循陋规，向他“呈送中秋节礼”。于成龙不仅严词拒收，而且为此特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大名县知县的所作所为。同时，于成龙还以此为例，转申所属官吏，“嗣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等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宽姑”。可见，于成龙在禁止馈送方面，决不只是放言高论，而是真抓实干，说到做到，从不搞“下不为例”。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又升任两江总督，他到任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利除弊条约》，再次义正词严的斥责了馈送风。《条约》中说：“本部院访得两江官员，自上而下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等差，盈千累百，目为旧规”。他还指出，在此种恶劣风气下，上司对所属官员，不论“官评之贤否，吏治之勤拙”，但凭馈送之多寡，决定升迁贬黜。而馈送之钱财由何而来呢？于成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等馈送，不出于钱粮之加征火耗（按：指在正赋之外，私加之征派），则出于词讼之贪取贓私”，实际上完全是“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结纳”。有鉴于此，

# 于成龙

于成龙严正宣布：自己一定“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

于成龙对自己发布的各种告諭檄文，都躬行实践，对于各种形式的馈送，概严拒收受。顺治十八年，当他首任广西罗城知县时，由于罗城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甚为落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刚上任时，甚至“寄居关夫子庙，安床周仓背后”。后来，县衙也只设在“茅屋三间，四周皆无墙壁”的环境中。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自得其乐，不惧边荒，与当地群众共患难，勤于政事，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劝导百姓发展生产，“宽徭役，疏漕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逐渐使罗城地区，谷穗遍野，牛羊满山，经济复苏，也使当地群众的生活日趋好转。同时，他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当地群众看到于成龙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便向他馈送些油盐柴米，而于成龙则笑谢曰：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

在物质生活困难的条件下，于成龙能做到刻苦自励，自奉甚俭；在物质生活充裕的环境中，于成龙仍然保持清廉的本色。康熙十八年，于成龙由武昌知府升任福建按察使，旋改任布政使。相继管理全省的司法、财政与民政。在某些人看来，这都是捞取钱财的肥缺。然而于成龙却依然一尘不杂。他在藩司大堂上，张贴了对联：“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

替你披枷带索；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福建因地处沿海，自唐宋以来，便与国外通商贸易，于成龙所在的布政使衙门自然经常与外国使团与商船接触，而且每逢“外番贡舶，或有所献”，于成龙照样“屏斥不受”。致使那些外国人都竖起大拇指对译使交口称赞说：“天朝洪福，我济实未见有此清官也”。

馈送和请托是互相联系的，一些官员之所以钻营馈送，目的在于钻空子，拉关系，请托营私，升官发财。于成龙对此亦十分清醒。他对于来自上下左右的请托，都一概拒绝，“虽王公大人也不为少贬”。有时，其“宾客故人”来访，他都热情接待。但是“一语涉私”，他即“正色斥诸”。当时，有些州县乡绅，想托于成龙办事，但私函不便直达，便私自假借官封文书，贿通门衙，请为投递。于成龙一旦察觉后，便晓諭吏属：此后，凡有官封文书，只许封日投递，如有请托私事，可当即开封原书退回。”于成龙这此举措，可谓铁面无私。

身为封疆大吏的于成龙，之所以能以身作则，严拒馈送请托，做到廉洁清正，一则是由于他在生活上从无过高奢侈，一向“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疏食自给”。因此，江南人给他起了外号为“于青菜”，以示景仰。最为可贵的是，他在任何环境中，都始终如一地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由于他恶衣疏

食，从不改前操，跟随他的仆从常为此而发牢骚，于成龙却开导他们说：“前在粤蜀，民物凋残，持廉甚易，今日正须试此”。也就是说，越是在充裕的物质环境中，越是要经得起考验。于成龙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较为自觉地坚持清正廉洁，还在于他看到清朝建国伊始，统一大业未定，后又发生三藩叛乱，加之连年水旱灾荒，国家正如于“民穷财尽之日”，因此，他认为“此时此刻，稍有良心，莫不推膺长叹，尤苦国赋难完，民力难支，又安忍心于正赋之外，敲鸩形鹄面之骨，吸卖儿鬻女之髓”。

正是由于于成龙一生廉洁奉公，操守端严，政绩斐然，才能受到康熙皇帝的褒奖，康熙二十年就曾奖评他是“清官第一”，康熙二十三年，又再次称赞他是“天下廉吏第一”；另外，他也赢得群众的爱戴。早年，当他由广西罗城升任四川合州知州时，罗城百姓便“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康熙二十三年，当其病逝出殡时，又出现本文开头时所述的动人情景。这说明，任何时代，凡是对国家、对人民做出有益事情的人，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开展反腐倡廉的今天，作为人民公仆的各级政府官员，倘能通过于成龙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以明得失，对于清除日益滋长蔓延的各种腐败现象，也许不无裨益。



# “名人与505”征文启事

505神功元气袋，是世界发明家来辉武教授怀着延伸人类生命的美好愿望，在继承祖国悠久的中医药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滋补人身元气的保健产品。

为弘扬祖国医药文化，造福于人民，中国咸阳保健品厂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经过友好协商，拟于1994年度联合举办“名人与505”征文，现将有关征文事宜公布如下：

(一) 应征文章必须是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使用505以后确有疗效的各界知名人士所撰写。

(二) 征文活动的评委会由7人组成，评委会主

任由来辉武教授担任。成员有：徐孔、柳荫、吴泰昌、周明、李南友、杜卫东。

(三) 征文共评出一等奖1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800元；三等奖9名，奖给荣获第14届美国纽约世界发明博览会“国际成果奖”等21项国内外大奖的505神功系列保健品一套。全部获奖名单在1995年第1期刊物上公布。

欢迎各界知名人士踊跃投稿。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  
炎黄春秋杂志社



□  
赵  
青

赵青：驰名中外的中国舞剧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1957年，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1982年后，相继举办赵青舞蹈作品晚会之一、之二、之三，1991年底，又举办了《赵青舞蹈艺术生涯四十年影视展播》。

我从8岁开始学习舞蹈，至今已49年了，可是我如今还能在舞台上转几十圈，需要时，还能跳当年曾被周总理称赞的《长绸舞》。很多朋友问我：“赵青，你怎么显得那么年轻，精力那么充沛，还保持那么好的身材？”我该怎么回答呢：“生命在于运动”，但这仅是一个方面，还需要保养和其他各方面的配合。我的保养配合措施之一是使用505神功元气袋。早些时候，我听朋友们说：“505”确有特效，不仅能治疗多种疾病，而且还能减肥，驻颜轻身，抗衰老。而作为一个舞蹈工作者，最怕发胖，虚衰老化，再说，我因长期舞蹈，胯部受伤，经常疼痛。……在朋友的建议下，我使用了505后，胃部发暖、舒服，胯部疼痛明显减轻，这一两年来，我尽管减少了活动，很少亲自登台舞蹈，但体型没有明显变化，依然感觉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有时转他几十圈，仍然气不喘，也不乏力，真有点“驻颜轻身，抗衰老”的效果，这同我近年来使用505神功元气袋应该说很有关系。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没有明显疾病的人，也可以经常使用505神功元气袋，因为505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再说，使用505神功元气袋，并无什么副作用，对各种年龄的人都适宜。所以，无论是患有各种疾病的人，还是像我这样年纪不轻的艺术工作者也好，对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来辉武历尽千辛万苦，发明这种确有神效的元气袋，都表示深深的敬意。

505

使我身  
轻如燕

炎黄春秋杂  
志社首届理  
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 《炎黄春秋》 欢迎订阅

## 关注上层动态 披露历史谜案 反映社会热点 追踪重大事件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萧克将军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创刊两年以来，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刊发的文章有1/3以上被全国各种报刊竞相转载。本刊内容翔实，格调高雅，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与收藏价值。

1994年，本刊将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公开发行人，每月20日出版。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本刊将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现在各地邮局正在办理本刊订阅手续，邮发代号：82-507。欢迎您在当地邮电局（所）订阅。如在当地邮局漏订，亦可向本社办理邮购。地址：北京西城文津街7号（100802）联系人：郭小姐。

## 中华大学大专函授招生简章

中华大学经湖北省教育委员会鄂高教〔83〕054号文批准成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管理严格，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推荐安排一批待业学员去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等地工作。

学校开办的各专业分别由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主考。学制两年。各门课程及格者，经专业主考大学盖校章，由湖北省高考委（盖钢印）颁发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一、招生对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工人、农民、指战员及城乡待业青年，均可免试参加学习（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残疾青年免收学费）。

二、报名办法：邮汇报名费10元到我校，即寄登记表、简章、学习安排和入学通知书。集体报名，由单位直接来人或来函联系。汇款时，请写清地址、邮编，在汇款单“附言”上写出学习专业。

三、入学手续：填交表格（写上身份证编号）；交脱帽一寸、二寸黑白照片各两张；我部经审定即办理注册手续；学员交纳学费后，即寄发校徽、学生证和学习材料。

四、本学校开办专业、学习课程及收费标准：（每门课程学杂费50元，报考费12元）

专 业	课 程	主考院校
法 律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法 刑法 民事诉讼法	武汉大学
会 计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统计学 会计学原理 企业会计	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企业管理学 技术经济学 经营管理学	中南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组织行为学 行政法学 行政管理学	武汉大学
秘 书	哲学 逻辑学 行政文书学 行政秘书学 行政管理学	湖北大学
中 文	哲学 逻辑学 文学概论 写作 外国文学	湖北大学

五、教学方式：以函授为主进行教学，给学员辅导学习，解答疑难。考试前给学员寄发复习资料，帮助学员取得好成绩。考试不及格者，可免费进行补考。没有条件来我校参加考试的学员，可开卷通讯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我校专业毕业证（盖钢印），证明进修学历水平。

六、考试办法：每学期进行一次考试（考场设在我校内），学员接通知后可凭我校学生证买半价优惠来回火车票。

七、毕业待遇：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享受全日制高等院校大专毕业生的同等待遇。毕业时，由省高考委调发考籍档案给在职学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备案。对待业学员采取自主择业和学校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按照国务院88年3月颁布的《高等教育考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接受单位录用或聘用。

八、报名时间：本期报名截至94年3月31日，逾期报名者转下期学习。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马沧湖路2号 中华大学函授部 邮编：430050 电话：027-443765

# 《炎黄春秋》1993年(1-12期)总目录

## □殒星篇□

- 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93.1 P.28 宋严  
吴晗和他的妻子袁震 93.1 P.36 宋严  
郭沫若朝山 93.1 P.26 任斌武  
班禅大师的圆寂 93.1 P.20 单超  
古籍专家杨伯峻二三事 93.1 P.56 楚泽涵  
第二次国共谈判中的秘密使者 93.2 P.14 尹骐  
我因胡风蹲大狱 93.3 P.24 孙钜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93.5 P.87 王忠瑜 王钟灵

- 候宝林的最后一幕 93.5 P.94 郑晋 王恂  
1959 胡志明庐山密访毛泽东 93.8 P.43 王凡 晓流  
周恩来和他的“能干之臣”93.8 P.53 朱清泽 王椒嵘  
“我丁玲就是丁玲!” 93.7 P.42 杨桂欣  
陈独秀遇盗 93.7 P.41 刘宏伟  
上将许世友的生前死后 93.9 P.40 黎清  
惨遭谋杀的报业巨子史量才 93.8 P.61 耿云志  
张自忠将军之死 93.9 P.46 南友  
为毛泽东与鲁迅架“桥”的冯雪峰 93.11 P.64 辛平  
作家肖军与胡乔木交往轶事 93.11 P.74 王德芬

## □英烈谱□

- 陈云江西蒙难记 93.2 P.8 叶永烈  
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 93.3 P.12 曹士生 成平 王界临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 93.3 P.32 舒云  
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的建国第一重大行动 93.4 P.2 杜卫东  
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 93.4 P.25 权延赤  
世界屋脊有一群军人 93.5 P.32 窦孝鹏  
蒋介石高参“通共”记实 93.5 P.43 毕永畅  
报界宗师张季鸾 93.5 P.68 高向明  
陈毅军长和一个文艺兵的故事 93.6 P.40 顾工  
北戴河:毛泽东急召叶飞上将密谈 93.7 P.48 陈敦德  
毛泽东请救兵——南汉宸 93.8 P.18 邓加荣  
从民族资本家到国家副主席 93.9 P.16 李彦春  
毛泽东为何在重庆与美国大兵合影 93.10 P.20 张彦  
张震将军与长江三峡 93.11 P.19 卢江林  
李立三夫人再谈李立三 93.11 P.22 李思慎

- 杨成武将军和女儿易生 93.12 P.62 叶运均  
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93.12 P.65 萧凯  
潇洒莫如毛泽东 93.12 P.4 王凡 刘连平  
“激进派教师”作客中南海 93.12 P.9 王先睿  
毛泽东在“远方”指挥琼州渡海作战 93.12 P.15 杨肇林  
毛泽东与续范亭将军 93.12 P.17 穆欣

## □春秋笔□

- 刘伯承元帅少年时期的轶闻趣事 93.1 P.12 丁隆炎  
和将军、部长斗酒记 93.1 P.42 水静  
齐越的话筒生涯 93.1 P.86 刘淮  
发生在古城西安的第二次兵谏 93.2 P.83 张士杰  
1954:班禅、达赖进京写真 93.2 P.24 李威海  
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 93.3 P.4 靳树鹏  
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93.3 P.75 杨闻宇  
蒋介石身旁的日本间谍 93.4 P.36 徐刚  
我参与“丁、陈反党集团”案处理始末 93.5 P.10 李之珪  
中国海军泣血远东 93.5 P.18 周宏冰  
政治风浪中的胡乔木 93.6 P.20 叶永烈  
再谈王实味冤案 93.6 P.70 温济泽  
“江青”出笼的台前与幕后 93.6 P.70 晓高  
毛泽东为刘胡兰两次题词的前后 93.6 P.16 马明  
从战犯到和平战士 93.6 P.64 李文达  
与历史同行 93.6 P.76 何志云  
大汉奸汪精卫死因之谜 93.6 P.59 李影、子江  
1930年毛泽东为何批林彪 93.8 P.25 萧克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93.8 P.6 张玉凤  
风靡全国全球的《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 93.8 P.10 韦梅雅  
陈光功“罪”录 93.8 P.47 历秋  
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 93.7 P.14 莫文骅  
康生智司令蒙冤 93.7 P.29 宅巍 德英  
来自中国最高家庭的经济报告 93.9 P.4 江建高  
华国锋“钦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 93.9 P.12 张凯  
谢富治: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 93.10 P.24 古阳木  
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 93.10 P.33 晓高  
汪伪政权十大汉奸的下场 93.10 P.46 雷舟子



“剿共名将”张辉瓒的“辉煌”与哀伤

93.11 P.80 冯都  
我在巴黎通电起义始末 93.11 P.91 凌其翰  
退居台湾：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93.12 P.21 叶永烈  
杨虎城和蒋介石 93.12 P.29 杨闻宇  
国民党也有个双枪老太婆 93.12 P.31 刘备鑫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与沉浮 93.12 P.34 孙孟英  
大顺“王朝”最后的42天 93.12 P.38 王宏志

□人海浪□

储安平你在哪里？ 93.1 P.38 逸馥 邓加  
我和张艺谋 93.1 P.58 肖华  
“文革”中的外交部夺权动乱 93.2 P.64 司任  
与刘晓庆交往十二年 93.2 P.34 傅溪鹏  
梦回北大荒 93.3 P.62 王正  
纪登奎下野之后 93.4 P.63 王灵书  
动乱中的乱动 93.4 P.71 柳萌  
向苗地兄索画记趣 93.4 P.94 姜德明  
遭人嫉恨的林芳兵 93.4 P.22 张维国  
“小家族”冤案20年 93.5 P.62 杜高  
共患难的二YU夫妇 93.5 P.92 罗网  
一本英雄书，一场生死劫 93.5 P.73 许国荣  
外国监狱里的中国女犯 93.6 P.90 徐京利  
攻克“白病”有克星 93.6 P.69 张细阳  
矗立人生 93.6 P.78 张建术  
一个诗人的欢歌与恋曲 93.8 P.32 顾工  
“文革”小品：“囚类分子”生活记“趣”93.8 P.28 鲁甸  
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的扭曲人生 93.8 P.39 李占才  
画家傅小石的“三重奏”93.8 P.64 赵绍龙 秦继兵  
伟人之女李敏的近情往事 93.7 P.52 王桂苒  
“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93.7 P.68 靳树鹏  
大陆：“人蛇”出洞秘闻录 93.7 P.63 向群  
我在周恩来专机上做空姐 93.9 P.20 马鸿杰  
中央电视台的明星与“保镖” 93.9 P.28 苏殿远  
留得齐璜翰墨魂 93.9 P.38 牧青  
从公主到平民 93.10 P.58 洗济华  
丁素兰和她的“一贴灵” 93.10 P.70 孙洪涛  
她为男性追回青春 93.10 P.71 吉文  
女兵楼的故事 93.10 P.67 舒云  
范曾的辞国、回归与婚变 93.11 P.30 南友  
国门内外的“倒爷”们 93.11 P.36 德  
天桥杂趣 93.11 P.39 新风霞  
北京101中学校长王一知和她的学生们 93.11 P.42 徐然  
总政“右派”当了麻疯病医生 93.12 P.68 吴戈  
上海股市大悲剧 93.12 P.74 孙孟英

□求实篇□

郭沫若解放后锐气为何不及当年，郭老晚年二三事

93.4 P.52 王朝柱 郭汉英

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 93.4 P.84 师哲  
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 93.9 P.58 晓高  
国际特快专列在边陲小镇被截 93.9 P.80 卢丹 里德  
“重庆号”巡洋舰的最后秘密 93.9 P.94 竹繁  
张思德是怎样死的 93.10 P.17 刘树林 康仙舟  
“江青挨打”真相 93.10 P.54 沈默  
“迎春晚会事件”披露内情 93.11 P.26 刘天鸣  
瞿秋白是怎样被置于死地的 93.12 P.45 立之  
郑三发子与蒋介石 93.12 P.50 王晓华  
三峡工程的一场唇枪舌剑 93.12 P.54 陈绍台等

□专稿□

要找寻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93.1 P.85 胡厚宣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93.1 P.12  
新春命笔 共著华章 93.3 P.12 萧克  
江总书记“探亲”小记 93.4 P.23 卢弘  
毛泽东与科学规划 93.4 P.2 于光远  
南昌起义亲历记 93.8 P.2 萧克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有进步的 93.7 P.2 毛泽东  
从庐山会议到9.13事件的若干回忆 93.11 P.4 李德生

以史为镜 防止腐败 93.10 P.18 薄一波  
中南海干预的纪凯夫案件 93.10 P.4 李之璠

□时代风□

世界发明家来辉武 93.2 P.50 茆苒 晓寒 方美  
四访大邱庆 93.3 P.27 永革  
京城大学生打工潮 93.5 P.82 刘一达  
叶利钦、海部、贝克……和香格里拉的公关小姐 93.5 P.152 东平  
李政道名述 93.5 P.77 张瑞龄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93.6 P.2 倪振良  
游说于现代商战中的神秘女性 93.6 P.44 李程骅  
今日中国陆军“窗口” 93.8 P.70 顾亦兵  
都市新画商发迹记 93.8 P.74 李程骅  
一个女人的乡村都市梦 93.7 P.84 东平 王凡  
上海滩的外婚介绍所 93.7 P.90 孙孟英  
从零开始的中国潜艇部队 93.10 P.72 王健娃

□法制苑□

西南边地吸毒贩毒透视 93.1 P.78 徐剑  
中国首例特大泄毒案 93.2 P.78 田浩  
总参谋部派来的“大校” 93.4 P.90 田浩  
势所必然的悲剧——禹作敏受审前前后后 93.10 P.80 罗光明

开国第一假药案 93.11 P.47 马先明  
浓浓的人血不是水 93.12 P.41 张建平

□神州光□

钓鱼台的国宾卫士 93.1 P.69 陈淀国

来辉武与“红兜肚” 93.3 P.89 茝苒 晓寒 方美  
 当代武松何广位 93.5 P.25 徐凤桐  
 蓝天上的一家人 93.5 P.78 宿聚生  
 分界截肢与不截肢的报告 93.5 P.59 王浩然  
 炎黄文化一绝—璇玑图 93.7 P.34 窦孝鹏 窦红梅  
 红火的炎帝节 欢腾的古陈仓 93.10 P.57 卢弘

□古镜台□  
 轩辕治国 93.1 P.92 蔡柏顺  
 炎黄历历明(诗) 93.1 P.84 魏传统  
 千古冤寇:袁崇焕之死 93.2 P.192 张德信  
 老子故乡话老子 93.3 P.68 朱秀海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 93.4 P.20 刘跃进  
 千古冤魂说韩信 93.6 P.84 兰殿君 兰婧  
 徐福东渡史迹新证 93.8 P.79 左录  
 祸起萧墙:皇权之痼疾 93.9 P.50 田惠刚  
 “医中之圣”李时珍 93.9 P.52 温济泽  
 宋仁宗和他的台谏官们 93.10 P.92 朱秀海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93.11 P.78 孔茂山  
 大英帝国与东方睡狮的初次碰撞 93.11 P.87 葛承雍

□争鸣录□  
 《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 93.7 P.19 凌云  
 中华几多“黄帝陵”? 93.8 P.89 兰草  
 何为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 93.8 P.92 党军  
 不该开的“天窗” 93.7 P.82 贺星寒

□轶闻录□  
 柳亚子以诗换酒 93.1 P.25 刘宏伟  
 康有为茅山庐墓 93.1 P.50 朱亮  
 冯玉祥轶事三则 93.1 P.95 刘作忠  
 陈立夫与丁小路的乡谊 93.1 P.96 江辉 寇丹  
 陈立夫为访台大陆记者题辞 93.1 封三  
 新年新语 93.1 P.95  
 金川岛的秘密 93.3 P.79 竹繁  
 泸沽湖有个神秘的土司夫人 93.3 P.83 字心  
 陈香梅在初恋时 93.3 P.71 杨耀健  
 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 93.5 P.4 舒云  
 中缅军队联合攻打金三角 93.5 P.56 万元 万红艳  
 蒋介石抹去的婚恋日记 93.7 P.22 毛晓桦 陈兴唐

□访谈记□  
 当代女高僧—隆莲 93.5 P.70 赵世富

□赤子心□  
 东南亚名商唐裕 93.2 P.31 永志  
 周奇勋和他的“阶梯行动” 93.4 P.86 于源  
 骆明先生的战略眼光 93.5 P.90 黄浪华  
 我所结识的驻外记者 93.6 P.86 石英

台籍画家黄正襄素描 93.6 P.88 蔡志翔  
 东方“神仙”西方“显灵”记 93.8 P.85 胡智锋  
 第一个拥抱奥斯卡金像的炎黄子孙 93.11 P.62 爱真  
 域外华人世界的香火 93.12 P.59 段向群

□同根结□  
 包玉刚在香港的股市大战 93.1 P.51 傅桃生  
 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大验纪实 93.1 P.72 宅嵬 德英  
 拜谒台北胡适墓 93.9 P.56 叶维力  
 朝祖团参拜神农节 93.9 P.27 刘永国  
 “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王洛宾 93.12 P.79 刘烈娃

□古今谈□  
 明朝的宦官专权 93.2 P.86 晓乔  
 湘江战役中的白崇禧 93.3 P.94 黄汉星  
 中国殡葬 93.3 P.51 谭中英 夏玮  
 奕诉在晚清政坛三起三落 93.3 P.40 杨益茂  
 借东风 华人 华文与新加坡 93.4 P.35 黄孟文 P.57 林斤澜  
 鸳鸯蝴蝶派的江南三作家 93.5 P.80 俞小红  
 从“大款”斗富说起 93.8 P.88 霜晓  
 赵陀归汉与民族统一 93.7 P.7 张克明  
 “中东路事件”与莫德惠 93.7 P.95 刘作忠  
 特区人的衣食住行 93.12 P.84 张正隆  
 吴祖光答国贸商场云 93.12 P.88 吴祖光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93.12 P.92 静文

□文荟苑□  
 紧箍中的回旋—当代杂文史钩沉 93.3 P.54 蓝翎  
 敬礼,伟大的奶奶们! 93.3 P.23 侯岱  
 努力办好刊物 适应新的形势 93.3 P.70  
 本刊中南发行部在湖北成立 93.3 P.22 邢耀章  
 注评陈独秀诗《挽大姊》 93.12 P.94 靳树鹏  
 李宝光诗词十三首 93.12 P.95  
 李鸿章是美食家 93.12 P.93 石林 瞿书志  
 蒋经国的墨竹画 93.12 P.64 石林 瞿书志  
 四大名旦的竞争与友谊 93.12 P.53 刘宏伟

□他山石□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人 93.3 P.56 张彦  
 赛珍珠的中国心 93.3 P.42 刘宏伟

□神州景□  
 烟赋 93.1 P.54 汪曾祺  
 5000年前的秘密王国 93.2 P.45 昭文  
 价值千金的唐墓壁画 93.4 P.76 王兆麟  
 三峡绝景备忘录 93.5 P.48 闻宇  
 抢救秦文的人们 93.5 P.24 武勤英  
 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是谁设计的? 93.7 P.37 舒云

# 炎黄春秋



我驾机秘密护送张学良夫妇去台

京城神秘炒房人

济南车站血案

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刺

潘代廉妻于成龙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